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2018 年第 1 期 (总第 163 期)

编辑委员会

顾问 毛昭晰

主任 叶 菁

委员 (按姓氏笔画排序)

孙建军 仲建忠 刘晓清 汪东波 陈 红

吴建中 李国新 柯 平 胡海荣 徐益波

章云兰 鲁东明 程焕文 褚树青

主 编 褚树青

副主编 刘晓清(常务) 邓咏秋 潘杏梅 赵继海

陈益君 池晓波

编辑部

主 任 朱小燕

编 辑 李 芳 郑秀花 王晓琳

编 务 茅珍艳

英文编译 孙正芳

刊名题字 沙孟海

封面设计 黄海晶

主管单位 浙江省文化厅

主办单位 浙江图书馆

协办单位 浙江省图书馆学会

浙江省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

编辑出版 《图书馆研究与工作》编辑部

地 址 杭州市曙光路73号

邮 编 310007

电 话 (0571) 87988086

在线投稿 <http://bjb.zjlib.cn>

投稿邮箱 lsrw@zjlib.cn

刊 号 ISSN2096-2363
CN33-1398/G2

定 价 22元

印 刷 杭州长命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8-1-10

图书馆研究

(月刊)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目录 2018年第1期(总第163期)

本期责编 郑秀花

■ 专题 口述文献整理与研究

- 口述历史编目 Nancy Mackay 5
- 作家口述档案库建设研究 尹培丽 13
- 藏族口述文献述略* 冯 云 19
- 影音文献与行业人个体记忆的视听纪录
- 电影人口述史作为标本的交叉视点 张 锦 26
- 女性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关系辨析 李慧波 34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SWOT分析的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 马祥涛 41
- 欧盟出版物和研究数据的管理及开放获取制度研究
- 以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为例 翟中会 石 蕾 47
- 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内涵及评价体系探析* 周 兵 51

■ 阅读文化

- 公共图书馆构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策略研究
- 基于深圳“In Library”与北京特色阅读空间的比较分析 刘 艳 55

城乡结合区域公共图书馆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构建探索*

谭 博 熊 伟 王 锦 60

“互联网+”时代下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探讨

张蔚然 65

■ 工作研究

基于实践的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建设探析

肖 铮 刘海伟 黄国凡 69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现状调查与分析*

易 红 王宁远 75

嘉兴市图书馆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实践研究*

程玉芳 董强 81

■ 文献学研究

《大正藏》与《嘉兴藏》中国佛教著述收录差异比较研究

王 蕾 84

《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疑误辨析

龙坡涛 88

古书香盈邑,人文称地灵*

——杭州、嘉兴、台州三地藏书史专著述评

蔡思明 93

本刊载文已被中国知网系列数据库、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超星学术期刊“域出版”平台收录,凡作者向本刊投稿并同意发表论文,均视为作者将该文著作权授予本刊,其文章著作权使用费不再另行支付。如作者不同意文章被收录,请在来稿时向本刊声明。

LIBRARY SCIENCE RESEARCH & WORK

CONTENTS

No.1 2018 (Serial No.163) Monthly

Cataloguing Oral Histories	Nancy Mackay 5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riters Oral Archives	Yin Peili 13
Brief Introduction of Tibetan Oral Literature	Feng Yun 19
Audio-visual Document and Audio-visual Record of Individual Memory of Profession Insiders: Intersectional Viewpoint of Oral History of Filmmakers as a Specimen	Zhang Jin 26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Oral History, Female Oral History and Feminist Oral History	Li Huibo 34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Library Participating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Ma Xiangtao 41
Research on the EU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Data's Management and Open Access System: Taking EU Horizon 2020 Projects as an Example	Zhai Zhonghui, Shi Lei 47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University Teachers' Data Literacy in Big Data Era	Zhou Bing 51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of Public Lib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Shenzhen "In Library" and Beijing Characteristic Reading Space	Liu Yan 55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Reading Promo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Urban-Rural Fringe	Tan Bo, Xiong Wei, Wang Jin 60
Discussion o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Internet Plus Era: Take Hangzhou Public Library as an Example	Zhang Weiran 65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Technical Department Based on Practice	Xiao Zheng, Liu Haiwei, Huang Guofan 69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Public Libraries	Yi Hong, Wang Ningyuan 75
Research on Service Practice for Children with Dyslexia in Jiaxing Municipal Library	Cheng Yufang, Dong Shiqiang 81
Comparative Study of Cited Differences of Chinese Buddhist Writings Between <i>Taisho Canon</i> and <i>JiaXing Zang</i>	Wang Lei 84
Discriminate the Suspected Error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Long Potao 88
Ancient Book Full of the city, A Remarkable Place Producing Outstanding People: A Review of Monographs on Book Collecting History in Hangzhou, Jiaxing and Taizhou	Cai Siming 93

· 专题 口述文献整理与研究 ·

口述历史编目

Nancy Mackay

(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信息学院 加利福尼亚州圣荷西 95192)

摘要: 编目是使信息资源具有可用性的必要步骤。由于口述历史属于存储介质复杂的智力资源,因此其编目比普通资料的编目更为复杂。编目员必须借鉴书本、手稿和视听资料的标准来恰当地描述这些重要的资源。文章分析了口述历史的编目过程,并指出了其特殊考虑之处。此外,还提供了可适用于个别机构的实用编目技巧。尽管编目的总体原则是全球通用的,但本文所描述的标准和做法是基于作者在美国的计算机环境下作为口述历史学家和编目员的经验而形成的,不过它们可以很容易地被应用于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

关键词: 口述历史;资源编目;图书馆;档案馆

中图分类号: G254.3 **文献标识码:** A

Cataloguing Oral Histories

Abstract Cataloging is an essential step in making information resources available for use. Since oral histories are complex physical and intellectual resources, cataloging oral histories is more complicated than cataloging ordinary materials. Catalogers must draw on standards for books, manuscripts, and audiovisual materials to describe these important resources properly. This paper breaks down the process of cataloging oral histories and addresses the special considerations that are necessary to do a good job. In addition, it offers practical tips for cataloging that can be adapted to individual institutions. Though cataloging principles are universal, the standards and practices described here are based on the author's experience as an oral historian and cataloger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 computerized environment. They can easily be adapted to libraries and archives around the world.

Key words oral history; resource cataloging; library; archive

1 背景

一个访谈只有当它被记录下来,以某种方式处理,并可在图书馆、档案馆或其他收藏机构中获取,或以对应文字稿的形式出版时,才能称之为口述历史。有效用于学术研究、重新解释和验证其他类型资料,赋予口述历史新的内涵。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第3版)

美国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Ritchie)的上述表述提醒口述历史学家和编目员,口述历史记录(包括访谈记录和相关资料)是服务于历史研究目的而创造的历史文献。口述历史是历史学家用来理解

过去的许多证据之一。口述历史应当与其他相关文献(信件、政府文件和作为历史证据的其他文件)和作为补充资料的二次文献(学者分析历史证据的书籍和文章等)一并归入图书馆和档案馆。

尽管访谈记录依然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基础,但目前的最佳实践已将注意力从访谈转向更广阔的视域,其中记录访谈只是口述历史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步骤。口述历史生命周期的新模型由四部分组成,如图1所示:计划、访谈、管理和利用(PLAN, INTERVIEW, CURATE and USE)。在这个模型中,编目员应当参与项目设计,并为技术和元数据规范提供指导。

第一步,计划:是指制定一个项目方案,包括通过访谈所要探究的问题,以及项目的大小和形式、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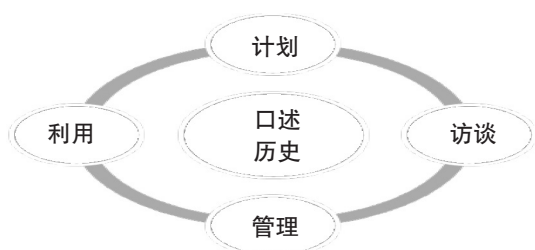


图1 口述历史生命周期

会接受采访、访谈如何归档、记录的技术规格以及描述性元数据的采集等细节；第二步，采访：是指访谈实施，这一直是口述历史的基础工作；第三步，管理：是指图书馆和档案馆在保存和提供利用方面的职责；第四步，使用：指的是口述历史被研究者发现和利用的途径。这里所描述的生命周期方法，通过让编目员参与口述历史项目规划，提高其在口述历史方法论中的作用，并确保由口述历史学家提供给编目员的元数据信息完整而充分，足以进行良好的编目工作。



图2 口述历史资料管理

图2进一步拆分了图1中所述的管理步骤。这些步骤，包括在图书馆和档案馆所进行的加工、编目和保管等工作。第一步，加工：是指图书馆或档案馆为口述历史永久保存所作的必要的物理上的处理以及记录保存等工作；第二步，编目：是指资源描述及其工作流程，这是本文的重点；第三步，保管：是指为确保口述历史资料的长期保存而采取的所有措施。图1和图2为图书馆员理解编目工作如何适应口述历史编目的独特需要提供了背景。

2 概念辨析

理解口述历史学家和信息专业人员在使用概念方面的细微差别也是至关重要的。下面对文中所涉及的可能引起误解的一些概念进行辨析。

档案馆和图书馆都是着眼于文献的机构，其目的

是服务于研究。尽管二者功能存在重叠，但是它们的目标却存在巨大的差异，编目实践也不同。图书馆通常收藏已出版的资料，如书籍、期刊和缩微胶片等。它通常在物品层次上对馆藏进行编目，这意味着每一本书（通过书名来体现）或每个口述历史都有一个单独的条目。档案馆通常收集一些不可替代的资料，如照片和信件等。档案资料往往在大的工作语境中凸显其重要意义，其资料的组织方式通常基于来源，因此档案资料的编目方式是以收藏为单位（称作收藏级编目）。例如，在一个口述历史项目中所收集的某位名人的所有文件或一系列口述历史访谈，应当作为一个条目编入馆藏。

编目和元数据有着相似的含义，它们经常互换使用，但术语的用法和起源有差异。编目与图书馆一样古老，传统上由列表或卡片系统来定位图书馆的实物和文件，后来逐渐将工作扩展到资源描述和定向获取。元数据这个术语在计算机时代变得很重要，它指的是在计算机环境中使用结构化数据和语言来组织和改进对信息资源的访问与获取。元数据通常被描述为“关于信息的信息”。编目和元数据具备相同的功能，都是通过对信息资源的描述和提供主题检索等增加文献获取的可能性。

在本文中，我使用“访谈员形成元数据”^[1]一词来描述口述历史采访的细节信息，如讲述者的姓名、访谈日期和对讨论主题的描述等，这些都是由采访者提供的。这些信息可以记录在表格上，并随同口述历史资料一起进入图书馆。访谈员形成的元数据是编目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描述性信息是由最熟知访谈情况和内容的访谈员提供的。

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员和编目员是信息专业人员。在较大的机构，二者的工作是不同的，但在较小的机构，他们可能会重叠或合并。管理员对馆藏资源的收藏、开发、编目、保存和使用负有行政责任。编目人员则需要有很强的技术能力和组织能力，能够熟练地运用本文所述的工具创建高质量的编目记录。在探讨编目这一口述历史生命周期的重要阶段，我将交替使用到上述这些术语。口述历史学家和访谈员是收集口述历史的专业人员。同样地，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员和编目员则投身于口述历史资料的管理。口述历史学家通常都接受过口述历史方法论和现代史的训练；访谈员则受过录音技术、沟通技巧和面试技

巧的培训。大多数情况下,口述历史学家和访谈员由同一人担任。在讨论口述历史生命周期中的访谈阶段时,我使用了这些术语。

一项口述历史访谈由访谈员的提问与讲述者(也称为被访者)的回答构成。据口述历史的最佳实践,讲述者被认为是口述历史的主要作者。

2.1 口述历史:图书馆员需要知道的

2.1.1 口述历史

口述历史是通过亲历者的原始讲述来记录新近历史的一种方法^[2]。访谈记录是口述历史的核心内容,也是将口述历史方法区别于其他方法的关键要素。下面一些例子表现了口述历史是如何使用的:

- 记录濒临消失的语言、文化以及艺术传统;
- 讲述某个社群或者某些特殊兴趣组群的故事;
- 记录某个职业群体或某个机构的历史;
- 展示某一事件的不同视角。

德克萨斯图书馆员兼口述历史学家Elinor Maze保守地坦言:“对于图书馆员而言,口述历史是复杂的”^[3]。一些证明她观点的证据如下:

(1) 技术细节。口述历史通常以音频、视频或者二者混合的形式呈现。这些音(视)频通常是模拟或者数字格式或者二者兼具。录制的格式和媒介可能与存储的格式和媒介不同。所有这些细节都必须体现在编目记录中。

(2) 口述历史的组成。尽管访谈记录被认为是主要文献信息源,但完整的口述历史可能包括抄本、照片、事件发生时间表等附属资料。图书馆和档案馆通常按照资料物理属性的不同分散储藏:即印刷资料存放在一个区域;多媒体资料则存放在另一个区域。这种人为的隔离影响了口述历史的完整性。

(3) 关联性。单个的口述历史可能是口述历史项目的一部分;也可能是图书馆中已有收藏对象和资源的有效补充;还可能是个人或机构所收藏文件的一部分。了解这些关系,有助于提高口述历史的研究价值。编目时必须确定是否描述以及如何描述和链接这些关系。

2.1.2 抄本

对研究人员和编目员而言,将口头语言逐字逐句转换成文字的抄本有着诸多用途。相对于聆听一段长时间的录音而言,研究人员更喜欢阅读抄本。抄本还有一个优点,就是能够澄清访谈记录中难以理解的

部分;提供正确的个人、组织和地名等的拼写,并且在访谈中使用的多种语言提供翻译。

但抄本转录是最昂贵的步骤之一,因此经常被省略掉。有时接收口述历史资料的图书馆或档案馆会承担转录抄本的任务,但最好的做法是让那些与访谈最接近的人(访谈员或口述历史学家)来进行。对编目员而言,抄本是访谈材料元数据缺失的情况下校验日期和拼写等非常有价值的信息源。

2.2 关于编目

一般人不太考虑如何系统地组织和描述信息,他们只是希望信息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触手可及。图书馆员则不然。我们每个人都有找不到珍贵文件的经历,因此我们本能地知道,单纯地储存文档并不能使人在需要时就能找到它们。我们需要一个系统来组织文档,能告知文档所在的位置以及它包含的信息。信息收集越大、越复杂,我们就越依赖一个系统来了解它的内容。这就是编目工作的切入点。

2.2.1 定义

编目是一个组织和描述信息资源使其易于被发现的过程。

以下是对口述历史编目的8个充分理由:

(1) 编目根据物理格式、主题、项目名称、机构、地理位置、叙述者的姓名及其他指代类别来组织信息。

(2) 编目可以提供多条检索路径,使用户能够通过讲述者的名字、主题、口述历史项目或任何其他路径找到口述历史。

(3) 编目可以为个人姓名、地理指示物、照片或任何其他指定信息创建链接。

(4) 编目通过唯一标识符(电话号码、登录号、DOI或URL)将用户引导至实际资源。

(5) 编目描述口述历史的物理特质,包括媒介、格式和抄本等细节。

(6) 编目通过关键词、人名以及访谈内容的描述和叙述者的个人履历等揭示口述历史访谈的知识内容。

(7) 编目可以记录重要的管理信息,如捐赠者的姓名、入藏日期、使用限制、副本数量和位置以及引用许可说明等。

(8) 编目可以跨机构共享信息,共享编目允许用户通过单一搜索访问来自于链接机构的编目信息。

2.2.2 编目系统

编目工作须从组织待编目信息的一个系统开始。编目系统包括一个容器,即目录本身(通常是数据库的形式)以及相关的规则、标准和信息输入指南。大多数图书馆和档案馆都使用嵌入到图书馆管理系统(Library Management System, LMS)的编目模块。在较大型的收藏机构(图书馆和档案馆),编目程序已经完善到位,编目员则需调整本机构的编目实践以适应口述历史资料的编目。较小的图书馆可能需要从头开始建立自己的编目系统。本文提供的编目建议可以很容易地适应电子表格、独立数据库以及文件归档系统等。

小贴士(TIP):无论编目系统如何,编目最核心的职能是准确、完整地记录描述性数据,并尽可能在访谈完成后及时著录。在英语中,我们用助记符来表达这个原则:一致性(Consistency)、客观性(Objectivity)、准确性(Accuracy)和及时性(Timeliness)。

共享编目是互联网时代的绝妙礼物。它指图书馆能够浏览和套用其他图书馆编目记录,从而节省各个馆独立编目的时间,并使编目标准更好地得以遵循。由于口述历史是独一无二的资源,所以它们很少能从共享编目中获得直接利益。但是通过在大型平台上共享编目有利于口述历史资料的访问和获取。WorldCat^[4]是世界各地图书馆馆藏的国际数据库,是最大的平台。它还共享编目提供了国家和区域选择。

2.2.3 结构化数据

如图3所示,无论编目系统大小或者繁简,它都是由三个层级组成的分层结构。最高级别是目录本身,即各部件的存放的容器。下一个层次由记录组成,每个单元对应一条记录,通常称为编目条目。第三级由每个记录域中的子单元组成,称为字段。此图演示了项目级和收藏级的记录和字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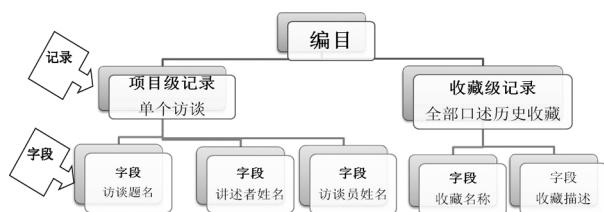


图3 编目结构

2.2.4 元数据标准

元数据的广义为“信息的信息”——是指那些描述、跟踪和管理信息资源的数据。元数据标准由数

据类目或字段以及与之关联的条目规则组成,它由专业群体设计,从而能够跟踪他们所需要的信息。这里是图书馆和信息科学领域的一些例子:编码档案著录EAD(Encoded Archival Description),用于描述档案收藏;机读目录MARC(Machine-Readable Cataloging),专为描述书籍设计;DC(Dublin Core),主要用于描述电子资源。虽然各个标准有其独特的适应性,但一个标准可以映射到另一个标准,因此编目数据可以在机构和专业团体之间轻松共享。遗憾的是,目前没有专门描述口述历史的元数据标准。

2.3 口述历史编目:基础知识

口述历史对编目人员而言往往是一个挑战。口述历史的某些特质,如格式复杂和物理元素多元等,都是与生俱来的。这些特质往往令编目员束手无策。而其他方面,如内容标准和元数据主题分析等,却可以通过编目人员与口述历史学家的良好沟通得以改进。

几乎每个口述历史都有一些需要编目人员运用专业技能和判断力来综合解决的独特问题。此外,如果没有抄本或访谈员形成的元数据,编目员必须花时间听取采访,以便编目。目前编目人员必须综合采用书籍、手稿和视听资料等元数据规范来实现对口述历史的有效编目。

弱化编目挑战的最佳方式是在访谈开始之前由口述历史学家和编目员达成一个编目协议。他们应该根据本文最后一个例子指定一份访谈员形成的元数据工作表(见下文表3),在该表中列明双方一致认为应当在目录条目中体现的信息。这一方案使得访谈员有责任确保所有信息被正确而一致地记录下来。

小贴士(TIP):使用访谈员形成的元数据是确保编目准确性和一致性的最佳方式,它不仅能节省编目人员的时间,而且减轻了他们的痛苦。

2.3.1 编目单元

我们一致认为,一本书是由封面和封底之间的内容定义的,但口述历史又该如何定义呢?口述历史是由一个个单独的采访组成的吗?所有的访谈是同一个讲述者关于同一个主题的吗?是只有抄本还是跟录音一起?事实上,何为口述历史编目单元,目前尚没有统一的标准定义,可以存在多种选择。

编目员的首要任务是确定口述历史编目单元,即明确以什么作为一个编目条目。以下是我认为最常见也最有用的界定方式:

定义(DEFINITION):口述历史单元由针对特定讲述者的一个或多个访谈以及相应的抄本和附加材料组成,其目的是讲述一个单一的故事。

口述历史编目分为项目级别(一个口述访谈)或收藏级别(一组访谈的集合)。项目级编目为每个口述历史提供一个目录条目。这种方法提供了更多的细节,是条件允许情况下的首选。收藏级编目将相关口述历史的集合定义为一个编目单元。这种方法可以强调口述历史之间的关系,而且能更快速地完成,但问题是缺乏详细的描述。收藏越复杂,这种方法的效果就越差。

图3显示了口述历史编目的项目级和收藏级。左边的示例说明了项目级编目,每一个编目条目对应于单个口述历史。右边的示例说明了收藏级编目,其编目记录描述了相关口述历史的集合,比如口述历史项目中的所有访谈。在这种情况下,整个收藏将被描述为单个实体。

2.3.2 描述性元数据

下一个编目步骤是确定在数据字段中记录哪些信息。定义数据字段是口述历史编目的重要内容之一。字段的选择可以根据项目的需要和访谈的内容而有所不同。下面是口述历史编目中常用的数据元素列表:

(1) 关于项目:

项目名称

项目发起单位

(2) 关于访谈:

访谈标题

叙述者姓名

访谈员姓名

访谈日期

访谈地点

音频或视频

记录格式

存储介质

录制说明

采访笔记

(3) 访谈内容:

人物简介

访谈摘要

主题—话题

主题—地名

主题—人名

主题—机构名称

2.3.3 受控词表

受控词表由人工生成的词汇列表和表格组成,用于补偿语言(或多种语言)的自然变体。受控词表对人类和计算机都有好处,在计算机环境中可以实现无缝操作,从而提高研究人员的搜索效果。此外,它还引导编目员在输入数据时减少随意性,从而保持数据一致。受控词表分为3个日益复杂的类别:清单、表格和叙词表。清单由一些术语或名称组成,如下面的葡萄酒清单。这样的清单有助于编目员使用准确的术语,确保拼写正确和粒度级别选取恰当。这样的清单经常在互联网上以下拉菜单选项的形式出现。

夏敦埃酒(Chardonnay)

黑比诺(Pinot Noir)

梅洛(Merlot)

雷司令(Riesling)

长相思(Sauvignon Blanc)

表格指定了术语使用的一一对应关系,编目机构可以据此确定要使用哪种变体,如表1中的机场代码^[5]。在本例中,用户可以输入机场代码、机场名称或机场城市,都会得出相同的结果。

表1 各城市飞机场名称代码表

飞机场代码	JFK	PEK	PVG	LAX	HKG
飞机场名称	肯尼迪国际机场	北京国际机场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洛杉矶国际机场	香港国际机场
所在城市	美国纽约	中国北京	中国上海	美国洛杉矶	中国香港

词库可以定义术语之间的复杂关系——同义词、广义词、狭义词或反义词。叙词表在计算机系统中非常有效,因为它能通过关联术语扩展检索结果。如果将词库嵌入编目系统中,那么用户可通过输入任意关联术语获得检索结果,如下例:

单一家庭住宅(SINGLE FAMILY DWELLINGS)

广义词:居住类建筑(Domestic Architecture)

狭义词:住宅房屋(Tract Houses)

关联词:连栋住宅(Duplexes)

关联词:公寓(Condominiums)

关联词:公共住宅(Apartment Houses)

2.3.4 本地受控词表

不同的领域有其特定的受控词表的标准,如美国信息科学专业人员经常使用的国会图书馆规范、盖蒂艺术和建筑主题词表以及ERIC叙词主题词表等^[6-8]。但是由于口述历史大多涉及未被文字记录的生活领域:其中的地名有可能是地图上没有的;人名或者机构名也可能是印刷品中不曾出现过的,这些术语在标准的受控词表中是找不到的。

图书馆、档案馆和口述历史项目组通常需要通过制定自己的词汇表来实现词汇控制,或者通过开发本地词汇表来指定口述历史访谈中所描述的人名、地名、组织和事件的拼写和格式等以补充标准词汇表。一个精心设计的本地受控词表能保持在整个口述收藏中编目的一致性,并有效弥合访谈中口语术语和研究者可能最熟悉的语言之间的差距。

小贴士(TIP):受控词表仅用于编目;访谈或抄本中的术语永远不能改动。

3 编目流程

从口述历史保护角度,口述历史资料从收藏者(访谈员等)转移到管理者(图书馆员和档案工作者等)的过程中是最具风险的。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者们深入地参与了口述历史项目并熟悉讲述者,访谈员可以清楚地回忆起访谈的细节以及提及的名字和日期。所有访谈员能回忆起的信息都将有助于编目工作。不同的编目员有着不同的兴趣点。他们的工作是使用数据结构和受控词表等编目工具来创建从口述历史资料到用户的链接。只有具备精确的数据,编目工作才能做到最好。本节描述了对访谈员和编目员最有利的编目工作流程。

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原则与最佳实践》对口述历史项目的前期规划工作有指导意义。“访谈员应当与有能力存储口述历史资料的机构取得联系,并确保公众对资料的获取权。”^[9]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它有助于确保口述历史资料有一个安全而稳定的存储场所,并且为口述历史从收集者到管理者的转移过程中签订合作协议创造了可能。文中建议的工作流程是基于一个前提假设:即口述历史项目组与图书馆或档案馆关于利用访谈员产生的元数据已经达成一致。

访谈员须使用一张表格来记录元数据,这可以

有效避免编目员追踪编目信息的不清楚或不一致的现象发生。一般而言,访谈员与讲述者关系最为密切,负责在《访谈员形成元数据表》(见表3)上记录描述性元数据并验证相关的事实和拼写。这样就为编目员提供了精确、完善、及时和一致的可靠数据。其结果是不仅节省了编目时间,而且提高了编目质量。表2总结了编目工作的主要任务。

表2 编目主要任务

编目设置
1. 学习机构实践:熟悉本机构的编目系统和编目实践以及元数据标准;在机构框架内制定编目计划。
2. 拟订编目方案,包括以下内容: ①口述历史的编目层级(收藏级还是项目级); ②编目记录所包含的字段; ③受控主题词表对应字段的设置。
3. 设置编目格式及包含的工作流程: ①《访谈员形成元数据表》(表3),供访谈员记录访谈信息。 ②《口述历史编目指南》(表4),编目员的使用工具,用于解释编目工作的目的以及每个字段的使用规则。 ③根据本机构工作标准,确立编目记录输入计算机系统所用的工作模板。
单个口述历史编目
1. 核实物理材料(录音录像、抄本以及附属材料)是否与《访谈员形成元数据表》所记录的信息相对应。
2. 在计算机编目系统中输入数据。
3. 进行必要的词汇控制。

表3提供了在访谈员形成元数据表中使用包含在口述历史编目(元数据)中常见各类信息的范例。所列举的信息可以根据项目需要和任何机构工作指南进行调整。

表3 访谈员形成元数据表

访谈员形成元数据表	
讲述者姓名:	访谈员姓名:
访谈日期:	访谈地点:
项目名称:	项目发起机构:
录制格式(.wav, .mp3, .m4a, etc.)	
选项: _____ 音频 _____ 视频	
存储媒介(disc, digital file, etc.)	
录制说明:	
访谈注释:	
讲述者传记摘要:	
访谈概要:	
主题词—话题:	
主题词—地名:	
主题词—人名:	
主题词—机构名称:	
填表人:	日期:

《口述历史编目指南》(见表4),为各个领域的口述历史编目提供规范和指引。字段与采访者生成的元数据工作表中的各部分相匹配。该指南对保持编目一致性至关重要。与《访谈员产生的元数据工作表》一起使用将确保编目团队能够准确、一致、相对快速地输入数据。

4 口述历史作为研究工具

口述历史学家Donald Ritchie提醒我们,“口述历史访谈是口述历史过程的开始,而不是结束。”^[10]口述历史的主要目的向来是通过个人证词记录一段历史,

并与其他记录历史的来源并肩存在。如果不谨慎保存,所收集到的叙述者的故事和证词就会丢失。编目是保存和获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缺失它,口述历史的益处就大大减少了。

21世纪为世界各地的学术研究提升了国际视野。美国历史学家和社区成员对中国同行的想法很感兴趣,同样某国的学生对10 000英里以外的同龄人的日常生活感到好奇。老年人可以记录他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以便地球另一端的人能更好地理解这段历史。所有这些机会都可以借助口述历史实现,并且能够通过图书馆和档案馆的最佳实践来分享。但是,没有良好的编目,这一切都难以实现。

表4 口述历史编目指南

字段名	注释	规则	字段名	注释	规则
	来源: 条目规则: 举例:	是否必备? 是否可重复? 是否编入索引? 词汇控制		来源: 条目规则: 举例:	是否必备? 是否可重复? 是否编入索引? 词汇控制
项目名称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如表中所示 举例:世界舞蹈联盟口述历史项目	必备(可获得的情况下) 不可重复 术语和语词索引 无受控词汇	存储介质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从工作表中调取 例如:数字格式	必备 如果适用便可重复 术语索引 本地受控词表
项目发起机构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如表中所示 举例:世界舞蹈联盟	必备(可获得的情况下) 不可重复 术语和语词索引 标准受控词汇	录制说明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自由文本,可从工作表中复制或提取。 例如:讲述者时而说话轻柔,街道噪音不时中断访谈。	不必备 不可重复 语词索引 无词汇控制
访谈题名	来源:由编目员提供 条目规则:遵循机构工作指南 举例:John A. Mosley 口述历史	必备 不可重复 术语和语词索引 无受控词汇	访谈注释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自由文本,可从工作表中复制或提取。 举例:讲述者的女儿一直在场,讲述者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讲述,其女儿负责翻译。	不必备 不可重复 语词索引 无词汇控制
讲述者姓名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根据受控词表 举例: Mosley, John Albert	必备 不可重复 术语索引 本地受控词表	传记摘要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自由文本,可从工作表中复制或提取。 举例: John Mosley was born 1954 年生于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	不必备 不可重复 语词索引 无词汇控制
访谈员姓名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根据受控词表 举例: Chen, Alexander.	必备 不可重复 术语索引 本地受控词表	访谈摘要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自由文本,可从工作表中复制或提取。 举例: Mosley 先生讨论了他童年在奥斯汀贫困街区的生活、他的第一次舞蹈课等。	不必备 不可重复 语词索引 无词汇控制
访谈日期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月/日/年 例如: 08.02.2017	必备(可获得的情况下) 只有在多个访谈情况下可重复 无索引 无词汇控制	主题词-话题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依据标准受控词表 例如: 现代舞—访谈	不必备 可重复 术语和语词索引 标准受控词汇
访谈地点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根据受控词表 例如: 奥斯汀, 德克萨斯, 美国	必备(可获得的情况下) 不可重复 术语和语词索引 标准受控词汇	主题词-地名	同上 例如: 奥斯汀(德克萨斯)	同上
音频/视频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音频或者视频 例如: 音频	必备 如果适用便可重复 语词索引 无词汇控制	主题词-人名	同上 例如: Mosley, John Albert	同上
录制格式	来源:元数据工作表 条目规则:输入标准格式类型 例如: .wav	必备 不可重复 术语和语词索引 标准受控词汇	主题词-机构名	同上 例如: 美国纽约城市芭蕾舞团	同上

5 有用资源

下面的英文资源将对口述历史学家和编目员大有裨益。

(1) MacKay, Nancy. *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 2nd. ed. Oxford: Routledge, 2016.

南希·麦凯. 口述历史管理: 从访谈到归档 (第2版). 牛津: 劳特利奇出版社, 2016.

这是口述历史编目管理方面最综合、最全面的印刷资源, 本文就是在该书基础上写成的。它专门为图书馆员和档案管理者编写, 其中有多章节与编目有关。

(2) Oral History Metadata Synchronizer (OHMS), <<http://www.oralhistoryonline.org/>>.

口述历史同步元数据处理 (OHMS)。这是一个免费、开源的口述历史索引系统, 由肯塔基大学Nunn口述历史中心的Doug Boyd研发。OHMS在美国被广泛用作转录抄本的一种节省型替代工具。

(3)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OHA), <<http://www.oralhistory.org/>>.

www.oralhistory.org/>.

美国口述历史协会 (OHA) 是世界上最活跃的专业口述历史协会, 其“原则与最佳实践”部分在指导口述历史实践方面特别有益 (<http://www.oralhistory.org/about/principles-and-practices/>); 而“元数据工作组”对口述历史元数据的产生和运用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4) 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OHDA), <<http://ohda.matrix.msu.edu/>>.

数字时代的口述历史 (OHDA), 是2012年以来口述历史新观点和案例研究的出版平台。尤为重要, 其下拉选项“curating”, 详见<http://ohda.matrix.msu.edu/essays/curating/>。

(5)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SAA). Oral History Section, <<https://www2.archivists.org/groups/oral-history-section/>>.

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 口述历史组, 该小组积极参与包括编目和元数据在内的口述历史管理方面的各种讨论。

(本文特邀中国现代文学馆尹培丽博士翻译)

参考文献:

- [1] BOYD D A. “Case Study: Interviewer–Generated Metadata,” in *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2012[EB/OL].[2017–10–13]. <http://ohda.matrix.msu.edu/2012/06/interviewer-generated-metadata/>.
- [2] NANCY M. *Curating Oral Histories: From Interview to Archive*[M]. 2nd. ed. Oxford: Routledge, 2016.
- [3] MAZÉ, ELINOR A. “Metadata: Best Practices for Oral History Access and Preservation,” in *Oral History in the Digital Age*. Washington, D.C.: Institute of Museum and Library Services, 2012[EB/OL].[2017–10–13]. <http://ohda.matrix.msu.edu/2012/06/metadata/>.
- [4] WorldCat[EB/OL].[2017–10–02]. <https://www.oclc.org/en/worldcat/inside-worldcat.html>.
- [5] Adapted from “IATA Airport Codes” [EB/OL].[2017–10–13]. https://en.wikipedia.org/wiki/IATA_airport_code.
- [6] Library of Congress Authorities[EB/OL].[2017–10–13]. <http://authorities.loc.gov/>.
- [7] The Art & Architecture Thesaurus[EB/OL].[2017–10–13]. <http://www.getty.edu/research/tools/vocabularies/aat/>.
- [8] ERIC Thesaurus of Descriptors is developed and maintained by the U.S. Dept. of Education intended for its own collection with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EB/OL].[2017–10–13]. <https://eric.ed.gov/>.
- [9] Oral History Association. Principles and Best Practices[EB/OL].[2017–10–13]. <http://www.oralhistory.org/about/principles-and-practices/>. See Pre-interview, item #1.
- [10] DONALD A. Ritchie, *Doing Oral History*[M]. 3r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作者简介: Nancy Mackay, 女, 硕士, 美国圣荷西州立大学信息学院口述历史和图书馆学讲师, 在图书馆学与口述历史跨学科领域工作了30余年, 是该领域的世界级专家。

收稿日期: 2017–11–06

· 专题 口述文献整理与研究 ·

作家口述档案库建设研究

尹培丽

(中国现代文学馆 北京 100029)

摘要:口述档案能够全面立体地呈现作家的人生和创作全貌,可以有效弥补以往对作家研究囿于其作品和评论等文字资料的局限,使研究资料更加充分、研究角度更加多元,因此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作家口述档案的采集整理工作已经在美国、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口头文化异常繁荣的非洲国家得以普遍开展,中国大陆近几年也有诸多机构和个人从事作家口述访谈工作,但大多呈现“各自作战”的分散状态,因此建立全国性的“作家口述档案库”,实现资源共建共享是大势所趋。文章还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重采集挖掘,轻管理利用”的现状,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比如编目工作前置、网络环境下的限制获取等。

关键词:作家;口述档案;口述历史;资源建设

中图分类号:G270.7

文献标识码:A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Writers Oral Archives

Abstract Oral Archives can comprehensively present the whole life and creation process of writers, therefore it can make up for the limitation that the research on writers is limited to their works and comments, and make the research material more sufficient and the research viewpoint more diversified, and therefore have a very positive significance. The collection and collation of the writers oral archives have already been very popular in United States, United Kingdom, Ireland, Canada, Australia and some African countries where the oral tradition has its long history. In recent years, many institutions and individual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engaged in oral interviews with writers. However, their operations are mostly in decentralized state, therefore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o establish a national Writers Oral Archives to achieve co-construction and sharing of resources. Meanwhile, the feasible solutions to the situation of “focusing on collecting and ignoring the management and utilization” were put forward, for example the up-front cataloging and the restriction of access under the network environment.

Key words writer; oral archives; oral history; resource construction

1 作家口述档案库建设的意义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口述历史在世界范围内取得了蓬勃发展,并被广泛应用于各个学科领域,在推动跨学科研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口述历史的跨学科性,不仅仅体现在历史学、社会学、图书馆学等领域,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拓展到全部的社会科学。作为人类文化和文明重要指征的文学,其与口述历史的胶合实属必然,可以说,“口述离不开文学,文学离

不开口述”^[1]。从表现形式上看,文学和口述的融合主要体现为两种形态:一是口头文学和纪实文学等,即口述历史成为文学创作的源头、参与文学创作过程或者作为最终形态加以呈现;二是作家口述档案,即运用口述历史方法对作家进行访谈,最终形成录音、录像、文字等原始档案资料。

作家口述档案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作家本人的口述自传、访谈员整理出版的作家访谈录等,但还有更大一部分是没有出版甚至是设置了保密期限的口述档案,其价值不容小觑。口述档案能够全面立体地呈

现作家的人生和创作全貌,有效弥补以往对作家研究囿于其作品和评论等文字资料的局限,使研究资料更加充分、研究角度更加多元。因此,整合各地、各类作家口述档案资源,建设全国统一的“现当代作家口述档案库”,并逐步形成从采集到整理、保管和提供利用的完整体系,能够扭转目前“重口述访谈、轻资料管理”的作家口述档案工作现状。借助共享平台而建立起各口述访谈项目机构或个人之间的良好合作关系,可以有效避免“分头作战,重复访谈”所造成的浪费,并最终实现资源共建共享的共赢模式。作家口述档案不仅能够为文学研究者提供独特视角的原始资料,丰富文学史的研究内容,而且对于保存人类记忆、推动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也有着重要意义。

2 作家口述档案库建设现状

作家群体作为特殊的文化表征,其个人成长、教育经历以及创作历程等能够代表性地反映时代的发展和文明的演进,加之作家文学作品的影响力比较易于在普通民众中产生联动效应,因此20世纪40年代口述历史在美国复兴(以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中心的成立为标志)后不久,世界各国就纷纷开展了作家口述档案的采集和整理工作。

2.1 英美国家和港台地区概况

作家口述档案的采集整理工作已经在美国、英国、爱尔兰、加拿大、澳大利亚以及口头文化异常繁荣的非洲国家得以普遍开展。以英美为例,英国大英图书馆的“濒危档案”(Endangered Archives)收藏中,颇具影响力的就是“英国作家口述历史”资料,目前这些资料已经实现了网上获取。此外,“英国第二代作家写作生涯和出身背景口述项目”(Writers and their Milieu: An Oral History of Second Generation Writers in English)也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

在口述历史发源地的美国,作家协会基金会(Writers Guild Foundation)在作家口述资料挖掘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该基金会每年拨出专款对杰出作家进行一系列口述访谈,内容涉及其生平、履历以及个人生活和业务实践等各个方面。这些口述作品不仅保存在图书馆里,而且在微博和YouTube等网络工具上展示和传播。该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总统时期(Franklin D. Roosevelt),当时的事业发展部(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开展了卓有成效的“联邦作家口述历史项目”(Federal Writers' Project)^[3]。目前,作家口述资料已成为美国许多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的重要收藏,例如肯塔基大学图书馆的“肯塔基作家口述历史项目”(Kentucky Writers Oral History Project)和“农民作家口述历史项目”(Agrarian Writers Oral History Project)等,他们还依据访谈资料出版了图书《与肯塔基作家对话》(Conversations with Kentucky Writers)^[4]。

香港和台湾地区的作家口述工作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香港岭南大学的“中国当代作家口述历史计划”通过互联网分享作家创作的心路历程。资料库现存20多位作家的资料,包括白先勇、余光中,以及内地的王安忆、格非等,内容涉及作家口述的影音资料、短片摘要、作家小传、作家著作、作品及创作评论、手稿与其他相关资料等,并对作家的文字、口述以及实物资料进行了全面立体的呈现^[5]。在台湾,口述历史的理论与实践不仅起步较早,而且比较注重普通人的生活 and 生命经历,口述历史中专门有一类是关于作家的口述史或者访谈录,出现了一批较高质量的著作。如由庄紫蓉采访整理的《面对作家——台湾文学家访谈录》,共3部,收录了作者于1997—2006年9年期间对24位颇具影响力的文学家进行口述访谈的内容。另外还有张守真的《口述历史台湾文学耆硕——叶石涛先生访问纪录》、李宗慈的《吴漫沙的风与夜》等。

2.2 中国大陆作家口述工作概要

中国大陆近几年也有诸多机构和个人从事作家口述访谈工作。如国家图书馆的“中国记忆项目组”对冯其庸进行口述访谈,并出版图书《风雨平生——冯其庸口述自传》;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除了自己组织团队进行部分作家的口述访谈外,还广泛征集散落在民间的社会各界开发的作家口述资源,并努力打造成中国最大的记忆库,成为国内外数十个口述历史项目的资料存储基地。作家洪炉也将其采集的口述历史资料备份捐入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资料库。国内从事作家口述历史工作最早的学者傅光明也将其对冰心、巴金等作家的口述访谈资料捐献给该中心;而集文学资料中心、文学展览中心、文学交流中心和文学研究中心等功能于一身的中国现代文学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作家口述访谈资料的采集和整理工作,在

其官方主页的“视频档案资料”和“音频档案资料”中能检索到老舍、丁玲、冰心、臧克家、周而复、刘白羽、赵家璧、萧乾等作家的音视频档案资料,其中早期的还是盒式录音带形式保管,目前正在进行数码化和深度整理揭示工作^[6]。

值得关注的是,口述历史还引起了相关文学专业协会的关注,为作家口述档案工作的进一步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2013年“5·18”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确定为:“博物馆(记忆+创造力)=社会变革”。中国博物馆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于5月18日与天津曹禺故居纪念馆、天津市历史学会艺术史专业委员会联袂,在曹禺故居纪念馆共同主办了“口述史与文学博物馆的记忆和创造力”的主题展览及学术研讨会。这无疑为作家口述历史工作起到了巨大的点燃和推动作用。

从出版的著作来看,过去几十年中涌现了大量的作家口述访谈录。例如,傅光明整理的《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郑实、傅光明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张英的《文学人生(作家访谈录)》;胡野秋的《六零派文学对话录》;王安忆、张新颖的《谈话录(新版)——我的文学人生》;赵庆庆的《枫语心香:加拿大华裔作家访谈录》等。此外,还出版了大量的作家口述系列图书,如傅光明的《命运与现实》以及《生命与创作》等;王尧的《莫言王尧对话录》《韩少功王尧对话录》等;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还出版了莫言心声系列丛书,包括《莫言对话新录》,其中收录了莫言与多位记者、编辑的口述访谈实录。2014年,由臧杰主编的《龙凤伟口述:当作家不能视而不见》等青岛作家口述系列荣获山东省宣传部组织评选的全省文艺评论专项最高奖“第七届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作家口述自传有《季羡林口述自传》《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以及李辉主编的大象人物自述文丛系列丛书等。由于中国的多民族现状,少数民族作家的口述档案工作有着特别的意义,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傅光明揭示满族作家老舍之死谜团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谁为老舍收尸》《老舍之死采访实录》;张春梅编著的《新疆当代多民族作家访谈录》;另外还有一些与其他作家访谈收录进同一本图书的少数民族作家访谈录,比如藏族作家阿来、回族作家张承志等。基于地域和籍贯特征的作家群体的口述工作也得以开展。

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的口述访谈,不仅阐释了口述档案的独特价值,而且对于口述资料的可信度、口述档案与文字档案的相互佐证等进行了详尽的说明,使传记文学和纪实文学的写作者能够利用丰富的口述档案,让历史的过往变得鲜活,让纪实文学因突显细节而变得生动^[7]。

2.3 典型案例——老舍之死口述实录

1966年8月23日,“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时任文联主席的老舍投湖自杀,他临终前究竟经历了什么?他的自杀是屈原式的舍生取义?还是对悲观现实的消极妥协?抑或是巴金先生在1979年的《怀念老舍同志》中所说:“日本朋友和日本作家似乎比我们更重视老舍同志的悲剧的死亡,他们似乎比我们更痛惜这个巨大的损失。……虽然到今天我还没有弄明白,老舍同志的结局是自杀还是被杀,是含恨投湖还是受迫害致死,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人亡壶全,他把最好的东西留下来了。”^[8]关于老舍之死,季羡林、汪曾祺、萧乾、严家炎、钱理群等都有着不同的论断。但历史的真相是怎样的呢?傅光明带着种种疑问,借助口述历史的方式,追踪访谈了老舍先生生前所在单位北京文联遭受红卫兵批斗相关的亲历者、见证人,试图揭开覆盖在“老舍之死”这一历史事件上的神秘面纱,逼近历史真相。从1993年开始,历经11年,录制了几十盘录音带,留下了大量鲜活的口述资料。

随着访谈人数的增加和对事件细节的“穷究式”追问,对诸如老舍当天是怎么去的文联,公共汽车还是专车?他投湖时穿的衣服,是白衬衫还是灰衬衫?老舍脖子上的牌子是他举起来砸向了红卫兵还是草绳断了掉到了红卫兵脚上等,不同的讲述人给出了“相互矛盾”的答案。这让傅光明陷入了对口述历史、对文字史甚至对整个人类记忆与表达的哲学反思。他确信历时11年的访谈成果具有独一无二的史料价值,但他同时又深感“历史是一只精致的瓷瓶,发生的瞬间就打碎了”^[9]。

在2009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里,傅光明完整地呈现了每一位被访者的访谈原貌,他还拍摄了纪录片《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完整地保留了多位被访者不能相互佐证的矛盾表达。这一方面是对口述历史操作规范的遵守,另一方面以一种被动的“无奈”向后人传达着历史的凝重,引发人们对“历史究竟是什么”的无限遐想。“历

史是一个任由人打扮的小姑娘”“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起来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等中外思想家关于历史和回忆的论断仿佛都能在老舍之死口述实录里得到印证^[10]。

除了出版有关老舍之死的系列口述著作和拍摄纪录片之外,傅光明还在其博客上撰写《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系列,共有10个篇章,分别是: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一);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二):历史是当代人的叙事;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三):口述史的罗生门;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四):真相与细节;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五):追忆还是实录;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六):一个真相,两个叙事版本;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七):小细节足以撼动史学价值;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八):历史的神话与现实;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九):口述史的采集没有尽头;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十):闪烁其词在口述史的价值^[11]。同时,老舍之死的口述研究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2012年4月15日,傅光明应北美作家协会华府分会之邀,作了题为《口述史里的作家与写作》的演讲,演讲的全部内容在北美作家协会网站上发布。

3 作家口述档案库未来发展路向

综合目前有关作家口述档案工作的研究成果和工作实践可以看出,该领域正在得到史学界、文学界以及图书情报与档案学界的重视。但不得不面对的现实是:作家口述档案的采集缺乏统一组织和协调,呈现出“各自作战”的无序状态;机构和个人受口述历史之风渐热的影响,纷纷开展作家口述工作,但往往处于“重采集轻管理”的状态,导致好多“抢救”来的口述资料因为保管不当或者没有及时编目等而处于损坏或者无序状态;且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对相关伦理问题的漠视所导致的权属不清和利用风险等也为资料的传播和开发利用埋下隐患,等等,使得作家口述档案收藏工作规范化、组织协调化等“顶层设计”工作迫在眉睫。因此,建议由中国现代文学馆牵头,以中国作家协会为依托,建立全国性的“作家口述档案库”,借鉴其他领域口述历史工作的成熟经验,制定明确的业务规范,注重档案资料的编目和保藏工作,签

署法律协议,明确权利归属,为资料的传播和开发利用扫清障碍。

3.1 建设全国性的“作家口述档案库”

在信息网络时代,资源共建共享是大势所趋。与文字资料的统一编目馆际互借以及数据库共享一样,口述档案也需要一个全国性乃至跨国界的世界性统一架构,作家口述档案也不例外。而相对于其他行业领域而言,作家群体在我国有中国作家协会和各地方作家协会的清晰建制,更容易搭建口述档案资源网络。因此,建议以作家协会为依托,由其下属单位现代文学馆牵头,建设全国统一的“作家口述档案库”,在此基础上重点建设少数民族作家、女性作家以及农民作家等特色子库。以期与文学馆的现有馆藏即图书、手稿、书信等文字资料以及办公用品和家居等实物资料形成相互链接、相互补充和印证的三位一体的完整资料体系。

从档案采集角度,除了组建工作团队,亲自制定方案实施口述档案的挖掘外,还可以采取与专业拍摄机构合作以及接受海内外和社会各界捐赠的方式,不断丰富作家口述档案资源。尤为重要的是,作家口述档案收藏机构应积极开展与其他口述历史机构的合作与交流。如崔永元口述历史中心、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口述历史项目组以及中国女性图书馆“女性口述史”项目组等,都有珍贵的作家口述档案。通过协作的方式将分散的作家口述档案纳入统一管理网络,实现资源共建共享,不仅可以有效避免口述档案采集的重复和浪费,而且有利于用户在统一平台上实现资源的检索与利用。

诚然,共建共享的前提是规范化、标准化。这也是目前困扰口述档案收藏的重要瓶颈之一。因此,需要从访谈前的准备开始,分步骤规范化口述历史访谈流程,制定和完善“从访谈前准备到访谈执行直至访谈后资料的编目整理”这一完整过程的成文化的工作规范。可以参照美国口述历史协会的《口述历史评估指南》^[12]并依据中国实际作出相应的调整。

3.2 注重作家口述档案的保藏和整理

口述档案由于存储介质的特殊性,在保藏方面比传统档案有着更高的要求。由于缺乏相应的知识和经验,许多早期的口述档案出现了保存不当的问题。比如,有些录音、录像没有及时备份和数字化,或者不符合环境条件,导致受损甚至彻底不能读取;缺乏编

目工作意识,导致资料挤压而不得不安排专人重新浏览录音、录像资料而提取编目信息,等等。因此,从项目伊始就应当为将来口述档案的保藏和编目整理工作做好准备。比如“编目工作前置”,即把口述资料著录所需的基本信息(如时间、地点、被访者基本信息、是否涉密、法律授权情况等)以表格形式固定,让访谈员在访谈结束后及时填写完整。

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主管罗纳德·格雷(Ronald J. Grele)认为:口述历史的质量受到访谈者和受访者的个人知识、阅历、情绪等的影响,而且由于是谈话交流的结果,其中间的停顿、解释、迟疑等都会让历史的叙述变得缺乏逻辑。因此,在口述资料生产阶段,需要充分预设研究者对资料的可能用途,以全面地挖掘被访者的记忆资源。同时我们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口述资料跟其他类型的资料一样,都有其历史局限性。在其创建过程中,是不可能预设到几年甚至几十年后研究者的使用目的^[13]。这同时也阐明了口述资料“前端控制”的重要性和局限性。

在信息时代特别需要关注的是口述档案的数字化和网络存储,其优势在于不仅突破了时空的局限,为任何地域的用户提供了获取的可能,而且可以实现关键词检索,并提供文本、照片、图表等的链接。但缺点在于,口述历史访谈的利用会打破资料管理者的“清规戒律”,不受任何限制。许多口述历史工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的国家声音资料馆(NGSW)、美国国会图书馆的“美国记忆”(American Memory)和“阿拉斯加州费尔班克斯大学自动点唱机项目”(University of Alaska-Fairbanks's Jukebox)等,在声像档案的数字化存储方面提供了很好的范例。

关乎作家口述档案资料整理的核心工作——编目,却是最大难点所在。因为口述档案资料既不同于传统的印刷资源,又有别于电子音像资源,它有着“既非鱼也非鸟”的独特性,因此美国的研究者认为,“口述资料的编目对习惯于印刷资料编目的图书馆而言是一个巨大挑战。随着数字媒介的不断发展,口述历史的保存和编目工作将变得更加昂贵且困难。”^[14]因此,在口述档案编目层级设置,编目参考规范与标准,元数据嵌入、保存以及编码转换等技术方面需要进行深入的研究,并结合中国用户的需求探索出具有可操作性和能适应长远发展需求的编目细则。

3.3 促进作家口述档案的综合开发与利用

正如阮冈纳赞在《图书馆学五定律》中所云:“书是为了读的”^[15],延伸到口述档案资料也同样适用——“作家口述档案的采集和挖掘,最终是为了利用”。只有通过利用,资料的价值才得以发挥。

与传统档案资料不同的是,口述档案在表现形式上往往是文字、音频和视频的综合体,因此在提供利用方面有着自身的显著特征,它可以便捷地实现多媒体集中呈现。在公共文化服务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口述档案与非遗等的结合,可以为收藏机构提供新的“读者服务契合点”,从而更好地发挥其公共文化空间作用。比如,作家口述档案中儿童文学作家专题,可以利用寒暑假为孩子们滚动播放口述访谈音频、视频,同时在播放场所摆放该作家的所有作品、对其作品的评论文章等,这在全民阅读时代会起到极好的阅读推广作用。

在作家口述档案利用过程中,由于作家的个人影响力等原因,尤其应当注意法律与伦理问题。要严格法律程序,拟订好各种《权利让渡协议书》,力争使保管单位获得完整的著作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等合法权益,为资料的提供利用扫除障碍。对于涉及敏感话题的口述访谈,可以设置一定的保密期限,例如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他于1910年4月辞世,死前留下了长达5 000页的口述自传手稿,但由于其中包含对当局政治的尖锐批评,他特立遗言——“身后100年内不得出版”。于是,在马克·吐温去世100年后,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于2010年11月正式出版了这本完整版自传《马克·吐温自传》。2012年,该书的中文版面世^[16]。

在网络环境下,为了避免传播失控,需做到以下几点:(1)在作品数字化之前取得合法的授权,对于没有授权的作品一律不得收入数据库内,有授权的要分清楚授权的内容,有些访谈内容涉及到个人隐私以及道德伦理方面的问题,作者并不想让太多人知道,我们在提供时需要作出特别说明和处理。(2)数据库的管理者需要通过技术手段对相关资源作出一定的限制,对访谈作品的内容进行控制,如采取试用、部分浏览等方式,对访问的人数也可以进行适当控制,避免造成信息失控。(3)通过提供数据库资源获得的报酬需支付一部分给受访者,具体的分配比例可以通过合同约定。

4 结语

作家口述档案能够突破文字资料的局限,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价值。作家鲁迅曾言:“正史涂饰太厚,废说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大摆史官的架子”^[17]。不仅如此,由于作家群体的特殊文化表征,透过对作家个体的口述访谈,能够洞察中国厚重的历史人文。正如采访过众多作家的郑实在《浩然口述自传》新版后记《读懂浩然》中所说,“我关注的是通过一个个体的经历撩拨开中国历史沉重的帷幕。但是当

它突然逼真地呈现出哪怕仅仅一角时,我才发现我们其实一直身在其中,是无可逃避的它的一部分。而空泛的叙事和貌似恢弘的视角往往离历史和人更远。”^[18]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意识到,任何档案资料都有其局限性,尽管我们竭力通过口述访谈和传统的文字、实物资料来无限接近历史的真实。但是历史永远不可能被还原,西方有史学家强调,在历史发生的瞬间,已发生的历史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历史永远不可能和它见证者的口吻相一致。对于作家这一独特群体的口述档案收藏,我们须抱以审慎而客观的态度,力争为后人留下宝贵的历史记忆,那也是属于整个人类的宝贵文化财富。

参考文献:

- [1] 李飞,辛志凤.口述与书写间的对话:作家口述史研究综述[J].民族艺林,2013(8):32-35.
- [2] The Endangered Archives Programme[EB/OL].[2017-06-20].<http://eap.bl.uk/pages/about.html>.
- [3] American Life Histories: Manuscripts from the Federal Writers' Project, 1936 to 1940[EB/OL].[2017-06-11].<https://www.loc.gov/collections/federal-writers-project/about-this-collection/>.
- [4] Conservations with Kentucky Writers[EB/OL].[2017-06-13].http://uknowledge.uky.edu/upk_english_language_and_literature_north_america/39/F.
- [5] 香港岭南大学中国当代作家口述历史计划[EB/OL].[2016-10-10].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2e72da010001u7.html.
- [6] 中国现代文学馆[EB/OL].[2017-01-14].<http://www.wxg.org.cn/gctd/spdazl/index.shtml>.
- [7] 秦维宪.口述历史:史学研究方法的重大变革——纪实文学作家叶永烈教授访谈录[J].探索与争鸣,2006(10):2-5.
- [8] 巴金.巴金随想录[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324.
- [9] 傅光明.口述历史下的老舍之死[EB/OL].[2017-01-14].<http://www.xici.net/d233005330.htm>.
- [10] 傅光明.老舍之死口述实录[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 [11] 傅光明.傅光明博客[EB/OL].[2013-01-18].http://blog.sina.com.cn/s/blog_4adc338c0101gzqt.html.
- [12] 美国口述历史协会.原则与实践总结[EB/OL].[2016-10-19].<http://www.oralhistory.org/about/principles-and-practices/>.
- [13] GRELE R J. On Using Oral History Collections: An Introduction[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1987, 74(2): 570-578.
- [14] SUSAN C. Wynne (2009): Cataloging Oral Histories: Creating MARC Records for Individual Oral History Interviews[J]. Cataloging & Classification Quarterly, 2009, 47(6): 561-582.
- [15] 阮冈纳赞.图书馆学五定律[M].夏云,王先林,郑挺,等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8:337.
- [16] 陈谋.马克·吐温口述自传面世自曝与秘书的风流往事[EB/OL].[2016-10-08].http://www.cdsb.com/html/2012-10/08/content_353044.htm.
- [17] 鲁迅.华盖集[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79.
- [18] 浩然.浩然口述自传[M].郑实,采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311.

作者简介: 尹培丽(1976—),女,博士,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 2017-11-06

· 专题 口述文献整理与研究 ·

藏族口述文献述略^{*}

冯 云

(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 陕西咸阳 712082)

摘 要: 拥有悠久口述传统的藏族在历史的发展长河中积淀了内容丰富、数量浩瀚的口述文献,当前对藏族口述文献的抢救、整理与保护极为紧迫。文章在厘清口述文献概念与类型的基础上,对藏族口述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出版进行了回顾与总结,以期当前藏族口述文献的收集与整理、藏族文化传承与保护提供参考。

关键词: 藏族;口述文献;收集与保护

中图分类号: G255.9

文献标识码: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ibetan Oral Literature

Abstract The Tibetan, with its long history of oral tradition, has accumulated rich content and vast amount of oral literature in the long cours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t present, it is urgent to rescue, organize and protect Tibetan oral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concept and types of oral literature, the paper reviews and summarizes the situation of collection, col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Tibetan oral literature,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llection, collation of current Tibetan oral literature and the inheritance and prote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Key words Tibetan; oral literature; collection and protection

1 引言

人类知识传承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口头传承;二是书面传承。在历史的长河中,口头传承在文化传递与延续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尤其对于无文字民族来说,口头传承对其文化繁衍与更替的作用甚至影响至今。藏族是中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口述传统由来已久。在开启书面记录之前,藏族文化以口传为典型特征,可以说,在藏文尚未创制之前,藏族历史记忆、信仰传承与文艺创造等大都保存在口头传承之中。学界通常将6世纪以前的藏族史称之为传说时代。直到7世纪藏族著名的智者吞米·桑布扎(Thonmi Sambhota)创制藏文^[1],口述传统逐渐被书面记录所代替,至此,书面文化在西藏开始兴起。口

述传统在上古时期极为受到崇拜,甚至成为藏族统治者治政的主要方式。据《西藏王臣记》记载,在松赞干布以前,藏族王族二十七代统治年间,“其在位时,咸以苯、仲、德乌三法治理王政”^[2]。而在民间,不计其数的说唱艺人以西藏特殊的生存环境、审美观念和宗教信仰,创作了丰富多彩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传说等。这些民间说唱艺人被称为“仲师”或“仲肯”,他们是藏族历史文化记忆的承载者与传递者。西藏史籍《藏域春秋》中生动记载了“仲师”的职责:“专门熟记祖先的世系、重要的事件、人物、法规等等,并代代相传。”^[3]千百年来,这些口述传统世代传承,并以文献的形式记载下来,使藏族文化繁衍至今。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以及外来文化的入侵,藏族口述文化,特别是珍贵的口头文化遗产正面临着严重的失传危机。一方面,许多口述文化传承人

^{*} 本文为西藏民族大学2016年“青年学人培育计划”资助项目“图书馆藏族口述文献收藏研究”(项目编号:16MYQP03)的成果之一。

大多年事已高,随着他们的相继辞世,承载在他们身上的宝贵文化记忆也随之泯灭;另一方面,现代化发展使得藏族原有文化传承秩序受到干扰,操持母语者数量下降,新一代的年轻人不再热衷于以农耕、游牧为主的传统文化生活,而是更痴迷于由书面文化以及各种新兴媒体带来的现代文化感官盛宴。口述文献遗产是极其重要的文化遗产,当前对藏族口述文献的收集、整理与保护极为重要。本文旨在厘清藏族口述文献的概念、类型的基础上,对西藏当前口述文献整理、出版等情况作简要介绍,以期提高学界对藏族口述文献的重视,并为藏族口述文献的科学收集、整理与保护实践提供理论借鉴。

2 藏族口述文献的概念与类型

2.1 藏族口述文献的概念

口述文献作为文献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因其独特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日益受到学者关注。关于“口述文献”的定义,当前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韩卫红认为,口述文献是不以文字而以口语来表现的过去的记录,是对人们特殊记忆、回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是将储存在当事人记忆中各个时期历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表达方式,通过笔录、录音、录影等现代技术手段的采访,记述下来的人们口述所得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4]。苏明强认为,当把口述内容以图画、符号、文字等方式固化在石头、简策、缣帛、胶片、纸张,或者磁性以及数字媒介上时,就形成了口述文献^[5]。据青春认为,口述文献是一种把口述史料固定在各种物质介质上形成的具有历史记忆价值的特殊类型的文献^[6]。虽然当前研究者对口述文献的理解不同,但从已有定义可以总结出口述文献的基本特征:一是表达形式上属于“口述”,即是用口头的方式记录信息;二是符合文献的一般特征,即固化在一定形式的载体上。然而,在“口述文献”的概念中,由于对“口述”二字的理解不同,导致了“口述文献”内涵与外延的差异。“口述(Oral)”本身含有非书面的和口头的双重意义,一般包含两种含义:一是具有历史意义上的“口述传统”,亦指“口头传统(Oral Tradition)”;二是指现代意义上的“口述历史(Oral History)”。口述传统是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上无文字阶段的人类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通常被视作了解过

去无文字历史的一条线索。历史学家将口述传统定义为“从过去传到现在的口头信息”。口头传统有广义和狭义两个定义,广义的口头传统是指人类用声音交流的一切形式,狭义的口头传统特指在传统社会的语言艺术,如歌谣、故事、史诗、叙事诗等^[7]。即使在今天,口耳相传仍然是无文字社会传播思想、传递信息的主要途径。如果说口头传统是古代与近代的“口述”,那么现代信息技术的发明则使传统口述具备了“现代性”,导致了现代意义上口述历史的产生。按照美国口述历史学家唐纳德·里奇(Donald A. Ritchie)的理解,口述历史是指“以录音访谈(interview)的方式搜集口传记忆以及具有历史的个人观点。”^[8]“录音访谈”最早借助的是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的新式录音设备,由此催生了现代意义上口述历史的产生。1948年,由新闻界转行的历史学家艾伦·内文斯(Allen Nevins)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创立口述历史研究室,成为现代意义上口述历史产生的标志^[9]。

根据以上分析,口述文献既包含口述传统文献,又包含口述历史文献,两者都应成为口述文献收集的主要来源。从文化遗产的角度来讲,口述传统是对文化的历时记录,而口述历史是对文化的追溯,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达到文化遗产的完整性。从这个角度上讲,所谓藏族口述文献是指以口述传统形式以及现代化技术手段开展口述访谈所搜集的藏族口述记忆而产生的一切文献资料,它既包含口述传统文献,即藏族文字创制后对先民口传文化记忆的原始记录,也包含现代口述历史文献即与藏族社会历史发展有关的一切口述历史资料。

2.2 藏族口述文献的类型

2.2.1 藏族口述传统文献

藏族口述传统是藏民族文化记忆表达的根。口述传统文献记录了藏族丰富的文化生活,同时也是现阶段藏族文学、民俗、宗教、社会生活、医药、天文地理等方面的重要研究资料。总体来讲,藏族口述传统文献可分为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歌谣、寓言、谚语、谜语等。

(1) 神话。据藏文史籍记载,从聂赤赞普至拉脱脱日年赞王共历年27代,期间已产生了大量的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从口传藏族神话来说,大致分为3种类型。一是关于大自然的神话,如《天和地是怎样来的》《大地和庄稼的由来》等。二是族源神话,诸如

《藏族的起源》《猕猴与罗刹女》等神话故事,均详细不同地记录了“猕猴生人”的神话,认为藏族是由古猕猴与岩罗刹女结合所生的后代演变而来。三是关于生产生活的的神话,如反映牧业的神话《马和野马本一家》以及反映谷物起源的神话《青稞种子的来历》《种子的起源》《取树种的故事》等^[10]。藏族神话充分表达了藏族先民对大自然的奥秘和社会生活现象的探索精神以及强烈的求知欲望,这些神话故事以口述的方式记录了藏族的思想意识、宗教信仰和道德观念等,提供了藏族尚无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的人类发展情况的宝贵资料。

(2) 传说。在我国各种民间口述文学体裁中,当以传说流传最为广泛,藏族也不例外。丰富多彩的生产生活为藏族提供了丰硕的口述创作题材,民间传说始终在藏族人民的生产与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传说故事与西藏历史紧密结合,为雪域高原的历史添加了浓重的神秘色彩,同时也积淀了丰富而独特的民间文化遗存。藏族民间传说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人物传说,如藏王松赞干布、文成公主、莲花生大师、商人罗布桑布、铁索桥修架者唐东杰等历史人物的记载,有《聂赤赞普和他的子孙》《直贡赞普埋葬在人间》《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医圣玉妥·云登贡布的传说》《唐东杰布修加嘎铁索桥》《商人罗布桑布的传说》《莲花生降服额上有眼的女魔》《格萨尔王与说唱艺人》等^{[11]27-133}。二是历史传说,如关于西藏雪域第一个部落形成的《一个王的传说》、关于活佛转世的传说等。三是地方传说。在西藏,每一处山川河流都有一个美丽的传说。如《纳木那尼峰的传说》《“曲拉”山名的来历》《羊卓雍湖的传说》《纳木错的传说》《阿尼玛卿雪山传说》等。四是动植物传说,如《熊丢了尾巴》《猫吃老鼠的原因》《狐狸、猴子和兔子》《青稞的来历》等。五是风俗传说,如《吉祥天女节》《贡布十月初一过大年》《祭龙节》《沐浴节的由来》等。流传至今的藏族历史传说和人物传说较为完整,从雅隆部落第一代首领到吐蕃王朝末代赞普被弑,从文成公主进藏到沟通藏汉商贸关系的罗布桑布,从神医玉妥·云旦贡布到铁索桥活佛唐东杰布,从著名高僧扎戈然绛巴到没落贵族吉苏拉,这些传说串缀成一部完整的藏族历史巨著^{[11]6}。

(3) 民间故事。藏族民间故事通常由老一辈口述者通过讲述的方式传给下一代,故事内容从浩瀚宇

宙到普罗众生无所不包,口述艺术形式丰富多样。在西藏民间流传着许多口头方式创作和传述的优秀故事作品,它们具有极高的文化价值与历史价值,并成为藏族民众日常文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是机智人物故事以此作为题材的故事如阿古顿巴的故事(又称“阿古登巴”的故事)、江拉和结拉的故事、聂局桑布的故事等。其中,家喻户晓的阿古顿巴是藏族民间流传最为广泛的故事,以此作为题材的故事如《阿古顿巴的宝物》《以卓还卓》《兔子顶债》《分饼子》等,充分体现了阿古顿巴的聪明才智^{[11]10}。二是爱情故事。通常讲述男女主人公相遇相爱,遭到重重阻挠,经过曲折斗争,最终取得圆满结局的故事,如《斑竹姑娘》《橘子姑娘》《青蛙骑手》《盐和茶的故事》等。三是动物故事。雪域藏图自古就是野生动物的乐园,为藏族人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通常通过动物之间的矛盾斗争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人际交往关系,如《兔子和狐狸、獐子和狼》《狡猾的红狐狸》《狮子和兔子》《兔子和乌龟》《老虎与毛驴》等。这些故事都有一定的社会内涵,兔子在故事家族中占有无可争议的首席地位,代表着正直、善良与智慧,而老虎、狮子等动物形象往往代表着黑暗势力。这些民间故事反映了当时藏族人民曲折社会生活的经历,同时受藏传佛教信仰和政教合一制度的影响,民间故事常常带有浓厚的宗教观念和因果报应思想。

(4) 歌谣。歌谣是藏族民间口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歌善舞的藏族人民以聪明才智与纯朴情感创作了大量的民间歌谣作品。这些民间歌谣语言纯朴优美、生动活泼,内容丰富多彩,真实地描绘了藏族先民对世界形成的认识,对自然现象、各种动物的理解及其劳动生活,反映出藏族先民对自然的崇拜、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以及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探索精神。一是歌颂党和人民领袖和社会主义的颂赞歌,如《升起了金色的太阳》《饮水的恩人》《献给领袖毛主席》等;二是表现藏族民间生活场景的生活歌谣,如《月亮白云总会相会》《在那吉祥的福山上》《来自故乡的朋友》《来自山顶的清泉》等;三是咏叹封建统治和黑暗社会的悲歌,如《雀儿山再高也有顶》《心中痛苦的话语》《请孔雀不要悲伤》《辛酸的岁月》等;四是诅咒封建婚姻制度、表达男女之情的情歌,如《唱起动人的歌》《心上的人儿》《鲜花与蜜蜂》《格桑花的戒指》等;五是各种劳动歌,如《洗衣歌》《挤奶歌》

《打墙耗子》等^[12]。这些民间歌谣反映了藏族勤劳、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可以说是融合了藏族的历史文化、风俗习惯、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等诸多宝贵资料。

(5) 寓言、谚语、谜语等。寓言、谚语也是长期在藏族聚居地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化瑰宝,大多充满着智慧、浓厚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典型的寓言故事有《格玛树与郭郎树》《三个猎人》《厨房里的故事》《炖萝卜》等^{[11]992-995}。谚语是藏族文化中极为独特的语言艺术,是藏族社会日常生活中启蒙开智和休闲娱乐的方式。一位能言善辩的老人在求亲、做公证人或者商榷某件事情时,其所有言辞都以谚语形式来表达,对方也会以谚语形式予以答复。通过这种古老久远的交流方式,使整件事情得以顺利解决。藏族谚语内容丰富,集说教、哲理、赞颂、讥讽、诉白和暗语等为一体。谜语是藏族口传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般采用将暗射之物的形状、颜色、声音、气味、行为、习性、环境、来源、行动等特点,通过其他事物或象征物,以隐晦的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引导人们分析、判断、推理、联想,准确地揭示所隐事物,内容无所不包,涉及到自然现象类、动物类、植物类、生活用品类、人体器官类、饮食类、生产生活类、物品类等各个方面^[13]。

2.2.2 藏族口述历史文献

口述历史的精髓在于“保留即将逝去的声音”,而藏族口述历史记忆传达了来自雪域高原的声音。现代口述历史的兴起充实了藏族口述文献的内容,再次引起人们对藏族口述历史文化的重视。藏族口述历史文献是人们对藏族历史的特殊记忆和生活经历的一种记录,即将储存在当事人记忆中的关于藏族历史发展各个时期、各个历史事件、自己或他人的各种表达方式,通过笔录、录音、录像等现代技术手段进行采访并记录下来所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原始资料。口述历史的意义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凭证作用。特别是口述历史作为新史学研究方法,将历史研究的着眼点集中于社会底层等在历史上长期丧失话语权的沉默群体,颠覆了以往上层历史和精英历史的研究范式。将口述历史运用于藏族历史的研究,通过搜集藏族普通民众的个人经历和社会记忆,能够将藏族历史还原于历史的真实面目。藏族口述历史文献作为一种历史凭证,通过让牧民、老人、妇女等历史

上的沉默群体发声,多维度地还原藏族社会发展变化的真实图景,打破以往藏族历史叙述的一元性和垄断性,有助于弥补官方记录的不足,为藏族历史研究提供更为真实而丰富的一手资料^[14]。二是促进文化多样性。藏族口述历史是藏族族群社会记忆的集中表达,承载了藏族历史文化的精髓,彰显着藏族的民族精神的个性,镌刻着藏民族独特的基因密码,而这种独特性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是促进民族社会认同。在藏族社会发展中,口述历史记忆在塑造民族身份的伟大工程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藏族族源神话《猕猴与岩罗刹女繁衍人类》《姐弟成亲》诉说了藏族的来历,而《格萨尔》长期以来都被视作藏族人民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史诗所传达的自强不息和英雄主义,以及“真”“善”“美”的理念不断塑造着藏族人民善良、英勇果敢的形象。藏族口述历史记忆可以增强藏民族族群内部的凝聚力,有利于形成藏民族共同的价值观、共同的民族心理,在维护民族身份认同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14]。藏族口述历史文献涉及到藏族历史的方方面面,口述历史文献主要涉及到藏族妇女史、藏传佛教史、十八军进藏口述史、非遗传承人口述史、藏族骨系姓氏口述史等。

3 藏族口述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出版

3.1 藏族口述文献的收集

20世纪50年代,西藏实行民主改革后,藏族口述文献逐渐得到人们的重视,在党中央和国家对藏族文化保护与传承的重视之下,藏族口述文献得到有效的收集、整理与出版。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发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力量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民间歌谣集成》《中国民间谚语集成》(简称“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通知》指出:“一些仅存的老歌手、老故事家都已年届高龄,抢救、搜集工作迫在眉睫,如不抓紧,这笔仅存于人们口头上的文化财富就会继续泯灭而失传,因此也必须通过一个广泛的、有计划的搜集活动的编纂工作,使这份文化财富得以保存,使民族传统文化得以继承和发

扬。”^[15]1987年1月,西藏自治区文化厅、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民间文艺家协会共同研究决定,在全区范围内组织力量,对西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进行普查、编辑并出版;同年6月,西藏自治区发出“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西藏卷》安排意见的通知”(文厅发〔87〕40号文件),提出在全区范围内开展此项工作的具体步骤和要点;同年8月,在经过培训授课和指导后,在全区各地、市、县成立编委会和办公室,西藏民间口头文化遗产普查、采录工作在藏区蓬勃开展。民间文学工作者、文化专干、业余爱好者等纷纷投身于西藏民间口传文化的抢救活动之中,民间故事讲述家、民间歌手、农人、牧民、渔夫、猎户、寺庙僧尼、上层人士等口述者积极配合,将自己所熟知、珍藏的民间故事、歌谣、谚语等采用口述的方式进行保存。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民间口传文化遗产抢救活动中,共采访民间故事口述者235人,结集资料本54册,文字累计总量达1 100多万字^{[11][1043]}。

在对《格萨尔》的收集与保护方面,1959年以后,国家首先对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进行了抢救式保护,配合专业人员对《格萨尔》史诗进行抢救收集工作。1980年,设立了西藏有史以来首个《格萨尔王传》抢救领导小组和抢救办事机构,即西藏自治区《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在西藏师范学院成立了专门的《格萨尔王传》抢救小组;在那曲、阿里、昌都等史诗流传较广的地区,由当地文化局相继设立了《格萨尔王传》抢救点。自治区《格萨尔王传》抢救办公室先后派专人到那曲、阿里、昌都等地区,对史诗及说唱艺人进行了全方位的普查,先后寻访到能够说唱10部以上的说唱艺人40名,并对每个艺人最具特色的典型说唱本进行录音,并开展笔录工作^[16]。作为格萨尔传播的重点区域,从2013年开始,那曲文化馆将71位格萨尔说唱艺人聚集起来,成立了一支专业的“格萨尔队伍”,对每一位说唱艺人进行资料登记,建立一整套完整档案。从21世纪初开始,西藏重点抢救格萨尔艺人说唱,《〈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藏文)已出版45部,一些艺人独家说唱的《〈格萨尔〉艺人独家说唱本》丛书已经出版了10本^[17]。

3.2 藏族口述文献的整理

在民间口述文献的整理方面,1999年3月10日,西藏文联召开了《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审稿会,一并通过自治区级复审与终审,正式定稿;同年5月,

在成都召开了西藏自治区文艺集成志书编纂工作会议,决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于1999年10月完成补充与分类调整送交总编委会初审,并在北京修改后完成终审^[18]。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发展,藏族口述文献数字化整理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为了推进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整理与保护,西藏自治区启动了格萨尔说唱数字化保护项目,完成必要的前期培训与编目,着手将格萨尔制作成音频、视频并以数据库的方式进行存储,并对传承人进行了大量抢救性记录工作^[19]。从2008年开始,国家有关部门通过影视媒体的数字化技术对《格萨尔》进行大规模的整体保护与分类整理,对著名说唱艺人和传承人录制了超过5 000小时的影像资料,建立《格萨尔王》影音数据库,进行网络展示与传播,实现了《格萨尔王》的永久性保存、资源共享与再开发利用^[20]。为保护和传承藏族歌舞文化,2011年4月,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正式启动了音乐歌舞数据库建设工作,通过采访老一辈藏族人关于歌舞的口述回忆,及时抢救康巴藏族传统歌舞文化,分阶段、分县级收录有关藏族歌舞的口述文献^[21]。数据库包含5个子数据库,分别为巴塘弦子库、山歌库、锅庄库、藏戏库以及综合库,每个子数据库又分为词库、曲库、音频库、高清视频库、图片库,活态记录并全方位展示康巴地区的非遗歌舞。截至2014年,已录制藏族民歌1 000多首,舞蹈600多种^[22]。

3.3 藏族口述文献的出版

将口述文献进行出版成为保存和传承民族口述文化的有效方式。随着藏族口述文献的收集、整理工作的持续深入开展,出版工作也日益提上议事日程。经过艰苦卓越的挖掘与整理,关于藏族口述文献的著作相继面世。

3.3.1 藏族民间文学的出版

《西藏民间故事集》(第一集)是藏汉民间口头文学工作者共同采录翻译的一个范例,曾在第一届民间文学作品评奖中荣获一等奖。经过西藏各民族民间故事口述者、采访者、翻译者和编辑者的共同努力,《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中国民间谚语集成·西藏卷》《中国民间民歌集成·西藏卷》《中国戏曲集成·西藏卷》等志书也已完成。

3.3.2 《格萨尔》的抢救与出版

藏族代表性口述文化《格萨尔王》的整理与出版

取得了较大成效。近年来,西藏《格萨尔》旧版本及实物登记与抢救取得了较大突破。据了解,自《格萨尔》抢救性保护工作开展以来,西藏自治区先后搜集和发掘50多种与《格萨尔》史诗有关的民间人物传说和10件实物,搜集到74部55种《格萨尔》史诗旧的版本和旧手抄本,整理出版《格萨尔》旧版本32部^[23]。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西藏社会科学院合作启动整理、出版艺人说唱史诗,先后发现民间说唱艺人150多人,累计艺人说唱录音超过了5 000小时,出版藏文《格萨尔》120余部^[24]。据有关资料显示,截至2015年,经过几代藏学研究工作者的努力,《格萨尔王》被拍摄成30集电视系列片《话说格萨尔》,使长期以来这一零散的口头说唱艺术得以永久性地系统传承。鉴于一直以来所出版的《格萨尔》多以藏文为主,不利于民族文化交流,2013年12月,西藏自治区正式启动了重大文化工程《格萨尔》藏译汉项目,总投资766万元,项目由自治区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牵头并具体实施,集聚了西藏、甘肃、青海及北京等地近50名《格萨尔》专家学者参与,计划对30部《〈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内容进行翻译。2017年4月,《格萨尔》藏译汉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选取的《〈格萨尔〉艺人桑珠说唱本》首批《天界篇》《木岭之战》《丹玛青稞宗》《百热山羊宗》《其日珊瑚宗》5部译本正式出版^[25]。《格萨尔》的藏译汉,使更多的人听到来自青藏高原史诗的传唱声音,对国内各民族的文化交流、研究以及少数民族的弘扬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3.3.3 藏族民间口传文化的出版

为了抢救藏族口传文化遗产,兰州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民族学研究院洲塔教授主持了“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项目,对甘肃、青海和四川三大藏区的藏族口传文化进行系统地挖掘、搜集与整理,并形成研究成果。藏族民间文学类大型丛书《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第一辑)于2014年7月由甘肃文化出版社正式出版。该出版项目先后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和“国家‘十二五’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出版规划项目”。该项目组成员均为长期生活在藏区的藏族学者、专家,精通藏汉双语;并深入当地藏民生活,参加当地风俗活动,从活动中挖掘鲜活丰富的文化资料;针对文化的地方性特点,对藏区的农区、牧区、散杂地区、城镇等进行调查搜集,最大可能地收集当地口传文化资料,为今后研究提供完备的参考资料^[26]。该

项目成果首次全面抢救甘、川、青、滇、藏五大省区藏族民间故事、歌谣、谚语、谜语、传说等一手藏族口传文化资料,全书分为13大类,60册,从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史科学等多个角度,全方位展现数千年藏族民间文化遗产的全貌和丰厚蕴涵。其中,民间故事类4册,斯巴问答歌3册,斯巴长歌1册,叙事诗8册,颂辞9册,拉伊10册,对歌8册,赞歌2册,酒歌2册,情歌3册,果谐1册,谚语8册,谜语1册。出版采取汉藏双语形式,以扩大该书在国内外的受众及影响面,彰显藏文化乃至中华文化的魅力^[27]。

3.3.4 藏族口述历史研究著作的出版

近年来,随着口述历史在藏学研究中的渗透与运用,有关藏族口述历史的著作相继面世。《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是由张健飞、杨念群对邢肃芝(洛桑珍珠)老人的口述实录。口述访谈始于1998年,长达20余次,形成录音带40余盘。他们将录音初步整理成文字,再进一步通过采访对历史细节进行补充,最后参照相关历史文献,对口述文字与原有的游记、日记以及大量的珍贵照片进行合理穿插编排,使得口述记录与历史文献达到相得益彰的互证效果。邢肃芝老人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大动荡年代历史中藏汉历史的主要见证者,也是第一位获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拉然巴格西的汉人。他的一生横跨藏汉两地,涵盖僧俗二界,以独特的多重身份对藏汉关系通过口述进行了内涵丰富的历史解读,对于研究旧西藏政教合一政治体制、官吏制度、贵族生活、藏汉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外国势力对西藏的渗透以及国民党政府治藏政策的得失等各个层面,他都提供了大量真实细节性的记述,有效地弥补了正史的不足^[28]。杨恩洪的《藏族妇女口述史》则主要运用口述历史的方法,收集并记录了西藏妇女在解放前后的地位变迁、参政和就业情况等历史记忆,打破了一直以来藏族历史研究中“女性的沉默”,使藏族口述历史记忆融入了女性的声音^[29]。为了全面反映西藏近100多年来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自2008年以来,先后在拉萨、日喀则、林芝、成都、北京、上海等地,对200余名群众、干部和专家学者开展口述访谈,整理出版了“西藏口述史丛书”,目前《口述西藏百年历程》(上、下)、《口述当代西藏第一》《口述西藏十大家族》等成果已经结集出版。《口述西藏百年历程》以新旧西藏为分界线,通过对旧西藏贵族及

其后代、专家学者等人的口述记录,涉及内容有宗教、重大历史事件回顾、社会事业发展、民俗文化等多个方面,通过口述史的亲历性、年代的贴近性以及口述者之间的相互印证补充,再现了旧西藏的社会真实面貌;同时,通过对大量新西藏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的口述访谈,展现了新西藏的发展面貌。《口述当代西藏第一》对新西藏历史上第一位藏族飞行员、西藏大学第一任校长、西藏第一位工程院院士等开展了口述访谈,再现了新西藏发展的历史^[30]。《口述西藏十大家族》对西藏桑珠颇章、拉鲁家族、朗顿家族、热噶厦家族、帕拉家族等十大家族后人的口述访谈与翻译,再现了旧西藏的贵族生活。卢小飞主编的《西藏的女儿:60年60人口述实录》^[31]于2011年由中国驻藏学出版社正式出版,通过对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藏族女性的口述采访,以女性的视角来见证西藏和平解放60年的西藏主权归属、西藏人权进步等问题,同时也是一部当代西藏妇女发展史。2017年5月8日,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新旧西藏对比宣传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编辑的《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口述

史》图书(藏、汉文)正式出版发行,填补了西藏自治区翻身农奴口述史领域的空白。该书编写历经半年时间,对西藏自治区7市地200多名翻身农奴进行了口述采访,重点选编了30位口述者集结成册,以口述亲身经历、重要事件、新旧变化,真实再现社会主义新西藏的历史进程^[32]。

4 结语

人类文明的赓续须臾离不开口头文化在代际和族群之间生生不息的传承,海量的民间知识和民众智慧是人类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文化因子^[33]。对藏族口述文献进行科学有效的整理与保护,不单是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将藏族文化记忆永续保存、为藏族文化留下延续的根脉。加强对藏族口述文献的重视与保护,积极探索藏族口述文献收集与保护方法与实践,不仅有利于藏族文化的传承与保护,也将进一步增强民族认同感,促进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交融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丹珠昂奔.藏族文化发展史[M].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01:539-543.
- [2] 五世达赖喇嘛.西藏王臣记[M].刘立千,译注.拉萨:西藏人民出版社,1992:11.
- [3] 才旺瑙乳.才让.藏域春秋:上[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8:191.
- [4] 韩卫红.藏族口述文献资源的开发与永久保存研究[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2(7):96-98.
- [5] 苏明强.口述文献资源建设和开发利用中的著作权问题研究[J].情报探索,2013(7):19-21.
- [6] 琚青春.图书馆口述文献工作中的著作权管理问题探讨[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3(8):4-7.
- [7] 朝戈金.口头传统概说[J].民族艺术,2013(6):17-19,24.
- [8] 唐纳德·里奇.大家来做口述历史实务指南[M].2版.王芝芝,姚力,译.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2.
- [9] 冯云.我国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综述[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5(2):21-24.
- [10] 佟锦华.藏族文学研究[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2:401-405.
- [11] 《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全国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编辑委员会.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M].北京:中国ISBN中心,2001.
- [12] 宋兴富.藏族民间歌谣[M].成都:巴蜀书社,2004:167.
- [13] 《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第一辑(全60册)[EB/OL].(2015-11-16)[2017-09-10].http://www.gswenhua.cn/htm/201511/11_1879_p2.htm.
- [14] 冯云,孔繁秀.藏族口述历史记忆浅析[J].兰台世界,2015(5):6-7.
- [15] 关于编辑出版《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通知[M]//贾芝.新中国民间文学五十年.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4:93.

(下转第40页)

· 专题 口述文献整理与研究 ·

影音文献与行业人个体记忆的视听纪录

——电影人口述史作为标本的交叉视点

张 锦

(中国电影资料馆 北京 100082)

摘 要:口述历史实践具有人群特征,其中与公共史学关系密切的行业人口述历史虽然是现代口述历史的主要类型之一,但却缺乏足够的公众与学术关注。作为行业人口述历史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不仅有着与总体同步的历程,也拥有相对其行业体量的重大影响,在口述历史总体的网状结构中由于实践各方作为视听文献与文化创造者的行业特性而处于突出的交叉视点位置,从而在当下诸多突出的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问题上具有独特的多重视角,进而成为探讨这些问题的良好标本。

关键词:口述历史;电影人;行业人口述历史;影音文献

中图分类号:G255.9

文献标识码:A

Audio-visual Document and Audio-visual Record of Individual Memory of Profession Insiders: Intersectional Viewpoint of Oral History of Filmmakers as a Specimen

Abstract Oral history practice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rouping, among which practice for specific professionals that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public history is one of the main types of modern oral history, however it lacks of adequate public and academic attention. However, oral history practice of filmmakers in China, having a significant impact relative to the size of the industry, is in a prominent position of intersectional viewpoint within the net structure of oral history as whole, due to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involved parties as the creators of audio-visual document and culture, and has a unique multiple perspectives on the present critical problems of oral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making it a good specimen for discussing those questions.

Key Words oral history; filmmakers; profession insiders' oral history; audio-visual document

1 口述历史人群特征与行业人口述历史

现代口述历史实践是基于对具体个人的记忆,通过访谈进行采集及其后续流程的一种社会实践——即便是集体访谈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这一判断。尽管如此,这些具体的个人也并非社会中散碎的沙粒,他们总是扮演着不同的社会角色,并因着这些角色与其他的社会成员之间建立各种或明或暗的关联,从而形成各类特定人群。绝大多数口述历史实践都不是单一

的,总有一些采集目的与人群划分的标准,即便是单一个体的访谈项目,放在整个社会口述历史实践的大背景及其文献网络中来看,也同样是可凝聚成群的。

口述历史的人群特征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基于采访人的访谈实践往往具有某种群体记忆采集的目的,无论是采集的产生还是采集过程中的对话都能体现这一身份预设;一个是基于口述人或受访人的口述实践或口述文本往往可能具有多重的群体取向,不同的群体取向之间具有各种交叉与联系,形成一个复杂的网状结构——如学者受访人也可能另一个身份是女

性,工人受访人也可能包括少数民族,等等。无论是哪一个层面,这种群体性都是我们把握从个体记忆、集体记忆到社会记忆之间关联与互动的必要媒介,是个性与共性之间的中介。同时,对于基于采访主体访谈实践的群体取向及其基于这种群体取向的实践所产生问题的考察——例如什么人在进行这一人群的口述历史采集、什么因素导致这一实践以及哪些主体因素对口述历史实践构成了哪些影响、这些实践在整个口述历史领域的位置等,也是对口述历史运动规律的把握,进而有助于整个口述史学的发展。

在中外现代口述历史实践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群体划分标准:性别(如女性口述史)、种族(如南非黑人口述史)、民族(如少数民族口述史)、阶级(如英国工人阶级口述史)、知识层次(如著名学者口述史)、地域来源(如世界温州人口述史)、特定经历(如“9·11事件”亲历者口述史或大屠杀幸存者口述史)等。在这些划分标准中,有一种标准通常没有像上述标准那样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进而缺乏较多社会与学术界的关注,但在中外口述历史实践中却并非处于非主流的地位,那就是行业人口述史,也包括特定职业人口述史。

追溯现代口述史的历史可以发现,行业人口述史甚至居于相对更主流的地位。被一般口述史学公认为肇始于1948年的现代口述历史的开创者——哥伦比亚大学巴特勒图书馆口述历史研究室的艾伦·内文斯(Allan Nevins),其主要访谈对象——政界人物便可以视为一种行业人,尽管政界人物我们也可以视为传统历史叙述或史料中的历史人物,但内文斯所访谈的现当代一般政治人物显然已超越历史人物的范围。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的现代口述历史启蒙阶段,对行业人的访谈可以说是最为主流的项目,其中尤为引人注意的是特定机构的口述历史,例如笔者曾在拙作《电影作为档案》^[1]的口述历史文章中专门提到《美国档案工作者》(*The American Archivist*)杂志最早对口述历史名词的述及,是1952年报道福特公司档案馆建立的口述历史部门及其口述历史项目^[2]。由于机构本身所具有的行业属性,无论对于这个机构中何种岗位人员的访谈,其属性都从属于这一行业,例如福特公司中无论是公司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员、普通工人乃至辅助人员,都是汽车制造行业的一部分。

事实上,在美国,基于机构口述历史的行业人口

述历史一直是一种居于主流的项目,无论是大型机构本身建立的以保存自身历史资料的档案史料机构还是规模较小的机构委托历史学者所进行的关于机构自身历史的个体记忆调查都是如此,而这也成为美国新兴“公共史学”发展的主要领域之一。

不过,在各种行业人口述历史中,有一种行业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那就是电影人口述历史,从整个社会总体口述历史的谱系来看,其主要特征在笔者看来是其可以作为标本的交叉视点。

2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概述

对电影人的口述历史采集在世界上是非常突出的一种实践,例如国际电影资料馆联合会(FIAF)众多的成员馆均广泛地开展着电影人口述历史,甚至其中为数不少的机构开展此项工作的历史相当悠久,而这还仅仅只是作为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官方行为”的一部分。

在中国大陆,电影人口述历史在各种行业人口述历史中,也是非常显眼的一支。本文中“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这一术语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维度各自的两层含义:其一,基于采访人或机构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工作实践以及基于受访对象或口述主体的中国电影人所进行的口述活动或口述文本;其二,对中国电影人所进行的一般口述历史实践(或发生在中国的针对电影人所进行的口述历史实践)以及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频道所进行的特定口述历史项目——“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实践”项目。本文以作为项目的这一概念为主要阐述对象,仅仅是因为笔者的熟悉。

如同其他领域的口述历史一样,对电影人的口述历史采集也经历了一个发展的过程。在对这个过程进行追溯时可能会存在对于口述历史界定的模糊之处,我们可以将其边界扩大为个体记忆的专门采集。

2.1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口头与个人记忆史料征集

对中国电影人的个体记忆较为系统的采集,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电影史的书写活动。特别是程季华牵头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官方历史书写项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对中国电影自身的发展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系统的梳理,《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的编著本身只是这一梳理中的一项成果。我们以负责这一项工作总体安排的程季华的两篇回忆^[3-4]为主要

根据来查看他们的史料搜集与使用情况。

项目主要的史料来源有三：影片资料，报刊的报道、广告和分析文章，对电影人个体记忆的主动采集。很显然，个体记忆的主动采集对于这一历史书写项目来说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主要方式也有3种：①主动访问老电影工作者并做4位艺术家的“口述实录”，这里的“口述实录”仅仅是程季华在2009—2012年口述历史实践已经在国内全面兴起之后对其当年的实践的一种回溯性命名，但查阅相关原始文献，当初并没有这样的意识（下面的“老电影人口述史”同）；②组织老电影工作者写回忆录，具体的形式是《中国电影》杂志“昨日银幕”栏目刊载“老影人口述史”；③电影人主动上门提供情况。

按照程季华的说法，项目的业务组织机构也是3个部分：电影史写作梯队（负责电影通史也即《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书写）、“口述实录”梯队（负责电影艺术史书写）、电影史话写作梯队。尽管这一说法值得怀疑，但仍然体现出个体记忆采集在项目史料搜集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最接近现代口述历史的实践正是“口述实录”梯队对4位电影艺术家由专人负责访谈所进行的工作，尽管这里的电影艺术史书写最终并没有完成，但作为通史的《中国电影发展史》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电影艺术史。

这些史料尽管最终体现在了《中国电影发展史》这部巨著之中——此后的中国电影史著严格说大多是这部著作的某种变种，但对于史料的利用程度很难说充分与科学，而史料的保存也可说是一大遗憾。在所谓“口述实录”方面，成果的主要体现方式是单行图书的出版，但最终在“文革”后实际出版的只有赵丹和郑君里（这些回忆最终看起来仍然是一种第一人称的书面回忆录形式）。关于蔡楚生的书稿据说在政治运动中遗失，而沈浮的回忆录尽管访谈基本完成，但原始记录因采访人赴美而不知所踪。此外，“昨日银幕”栏目刊载的老电影人书写的回忆录则在“文革”后以一些代表性人物为单元出版。原始记录方面（从有限的资源判断，其记录方式基本为笔录）则与其他搜集到的主要史料一起下落不明。

2.2 电影人个体记忆史料的零散采集

《中国电影发展史》之后，关于中国电影的个体记忆史料的零散采集始终存在。根据不完全统计，其中主要有3种情况：

（1）官方所进行的其他人群系统的个体记忆采集实践中零散的电影人回忆，如各地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史料征集工作，这是建国以后非常重要的官方活动。那些电影活动比较集中、特别是与中国共产党相关电影活动关系密切的区域，如上海和长春，有较多的电影人回忆文章以公开或内部出版物的方式书面呈现。

（2）关于电影史的媒体访谈。这一活动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电影发展的早期，其形式也多种多样，文字、声音乃至影像都有，而这些存留文字或影音具有更强的传播目的而不是史料保存乃至历史书写目的。

（3）学者研究活动中的口头史料收集。这些收集活动特别是到了后期已属于很明确的口述历史范畴，这是从电影史研究中对缺失史料或难有原始文字史料的中国电影史进行探究努力的结果。例如，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郑洞天在《中国电影导演史》之前曾策划过对中国电影导演进行系统口述历史的采集计划。

2.3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老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

崔永元口述历史研究中心（以下简称“崔中心”）的老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具有非常独特的地位。它首先始于上述关于中国电影史的媒体访谈活动之一，即为制作电视系列片《电影传奇》而生，其背景同样是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百年纪念的相关活动，访谈以做视听节目为基本目的，并围绕影片组织相关人员访谈，甚至不限于电影人。项目性质的转折点，根据项目负责人之一赵一工的说法，是在做节目之中和之后发现编辑访谈影像的历史价值，因此产生了系统保存这些个体记忆的想法。而这最终促成崔中心的成立，并将主题延展到其他人群，如抗战老兵、知青、改革开放人物等，形成综合性的口述历史收藏体系，同时也开始如同其他视听文献保存机构的一贯做法那样——收藏或代为保存社会上其他人群访谈的口述历史影像。

崔中心尽管挂靠在中国传媒大学，却有其独立性，基本定位于一个基于民间背景的口述历史记录中心。就已知情况而言，这个机构是目前大陆口述历史记录最大的收藏体和采集体，甚至是目前唯一主要以口述历史为基本使命的独立机构（据中心副主任林卉提供的情况，中心工作人员约50人左右）。同时也因其丰富多彩的相关口述历史活动，成为当下中国大陆地区口述历史运动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与此相应，这

个机构也在大陆地区首次形成了一整套较为完备的口述历史访谈、保存与利用工作的规范与管理体制。

仅就其老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而言,截至2012年,通过8~10年的艰辛努力,访谈电影老人超过1 000人,采集口述历史影像超过3 000小时,是中国第二大电影人口述历史收藏。这些老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原始影音记录除了作为素材用于《电影传奇》之外,记录本身也作为独立的视听文献提供利用。2016年,崔中心将所收藏资源的一套拷贝捐赠给南京艺术学院用于电影史研究。

2.4 中国电影资料馆及其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

中国国家电影档案馆——中国电影资料馆的机构属性,长期以来存在非常模糊的认识和绝然的分歧,从其机构内部工作人员乃至整个电影行业来看,其作为电影行业档案馆的定位甚至是一种主流的观点,尽管这在相当程度上与国际电影资料馆界的主流观点不一致。这一观念也集中体现在该机构的“宪法”——《电影艺术档案管理规定》之中。相反的观点则以笔者为代表,《电影作为档案》一书对此进行了集中的阐述,将其定位为以电影(活动影像胶片)为媒介的国家档案馆。实际上,20世纪80年代国家档案系统曾有过以此机构为基础筹建中国国家声像档案馆的计划。这一定位之争在口述历史这一视听记录方面也得到集中的体现。

中国电影资料馆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本身的动因与“电影行业档案馆”的定位有关,即搜集保存关于中国电影行业的一切历史资料,当然也与这个机构的另一块牌子“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有关,甚至后者是更为直接的动因,即作为国家级电影艺术研究机构,重写中国电影史宏大目标中的一个前置项目。

中国电影资料馆曾进行过多次电影人个体记忆的采集活动。几乎在程季华受命书写《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同时,中国电影资料馆1958年创建之后,馆员赵素行等人即同样开展了对一些老电影人的访谈活动,目的是为了系统地书写中国电影史,但这一活动因没有得到当时政府电影主管领导的支持而不具官方地位,甚至书写工作本身也没能进行下去。1979年中国电影资料馆自“文革”中并入中国电影公司之后复馆,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也曾进行过以录音的方式对电影老人的访谈,其目的则主要是资料收集或为资料收集工作服务。80年代后期,作为全国范围的党史资料

征集工作的一部分,所属电影局党史征集办的核心项目是大型工具书《中国电影编年纪事》的编制,为此目的也曾对老电影人进行过大量的访谈,包括承担各自机构编年纪事的各电影机构在编写过程中对自身机构所属电影人的访谈。就党史办直接组织的访谈来说,主要以录音为记录方式。原始记录加以一定程度的保存,但主要目标还是工具书的编制。

作为一个项目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申请于2006年,通过于2007年,正式形成于2008年,国家广电总局立项,中国电影资料馆与电影频道公共承担,而主要的具体执行机构为馆所属电影研究室。研究室此前也曾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出版过一套电影史的丛书,但却并没有专门的口述历史采集活动。尽管如此,后继历史项目的宏大目标——“重写中国电影史”针对的对象则是前述程季华主持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隐含着大幅度脱离“程季华体系”的动机。这种不满意主要体现在“程体系”3方面的问题:历史事实缺乏足够考证,历史叙述集中于艺术领域而非通史,以及过多的意识形态色彩。

项目很自然地迅速定位为通过视听手段对电影人个体记忆的系统存留并不排斥公共传播,从总体规划到微观访谈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结构性规划,并且长期进行下去进而成为日常程序性工作的意图非常突出。目前项目第二期正在进行中,两期共计访谈电影老人近400人,口述影像超过4 000个小时,已为迄今中国最大的电影人口述历史收藏,很可能也是中国最大的行业人口述历史采集与收藏实践,进而成为当下中国大陆最具影响力的口述历史项目之一。与崔中心的老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不同的是,项目以电影人而不是影片为中心,访谈对象的边界明确为中国(或在中国)的电影从业者及其亲友,尽管也曾将目标投向影迷,广义地说影迷也可属于电影行业人的一部分,但最终没能实现。实际上,项目名称经历过从“中国电影口述历史”到“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转变,更主要的目的还在于强化受访人而不是历史事件。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的影响力不仅仅在于其系统的大规模访谈,也在于成果较早、较系统地公共呈现。几乎从项目一开始,访谈录就在《当代电影》《电影文学》等刊物上同步长期连续刊出。2011年经由民族出版社出版“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丛书”第

一期共计4部,2012年获得国家出版基金资助30部第二期出版计划,截止到2016年底,经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已出版9部。无论是刊物还是丛书,虽然大多是摘录性质,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项目访谈的全貌。原始记录目前尚未提供直接的公共利用,这首先在于项目的档案性质所决定的大量保密内容的存在,使得工作人员的整理成为公开利用的必经路径;其次也在于原始记录的保存因工作交接至今仍处临时状态。

项目的另一影响力来源于口述历史采集实践与研究的并重,这一点在当下的中国大陆地区甚为罕见。当然,这里的“研究”是指将口述历史作为本体对象进行研究,研究口述历史实践本身的理论与实践。换句话说,不同于国内众多口述历史团队对口述历史实践的关注着重于在本领域的应用进而涉及方法,项目团队基本上是将其作为独立于电影学的单独领域进行研究,电影史本身的问题最多是作为例证而出现(本文是团队论著中首篇关于自身领域口述史的研究文章)。在项目的第一期和第二期分别有一个国家社会科学重点课题伴随访谈实践,而第二期的课题采用的基本形式是一连串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小型论坛,汇集众多领域的杰出人士连续进行交流,形成较大的社会影响。作为一个团队,其主要成员均有相关论著问世,由于长期密切的交流,相互之间既有观点的激烈冲突也有共同的理论特征,在整体上将中国大陆地区的口述历史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与研究伴随的,还有口述历史研究生课程的开设。

3 电影行业人口述历史的交叉视点

行业人口述历史总体上并不是一个很吸引大众或学术舆论关注的领域,电影人口述历史——特别是本文所关注的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在其中却是少有的例外。考虑到电影行业较小的规模,这种例外就更加引人思考。尽管其中诸多侧面值得探究,这里仅概述其在各种群体口述历史中所处的独特的交叉视点位置以及由此产生的对理论与实践的影响。

3.1 中国电影人口述史与一般口述史的发展历程

笔者曾将现代口述历史诞生以来中国大陆地区的个体记忆采集与口述史实践大致分为3个阶段:①20世纪50年代的笔录时代,尽管这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或现代口述历史,但建国之后的确形成了

一个个体记忆征集的高潮,首先是各地文史资料工作的开展,就刚刚结束的革命战争年代的亲历者展开记忆的系统存留,以书面公开或内部出版为主要形式,这更接近传统的文献档案活动——实际上事件后的当事人补充记述本身是传统的入档范围。其次是更接近现代口述历史的针对历次农民起义如太平天国、捻军以及义和团等的亲历者或其亲属的主动访谈调查。两个方面基本上均由官方主导,主要的成果以史料编纂为主,原始记录的保存总体不受重视。②20世纪80—90年代的录音时代,已经有很明确的现代口述历史意识,主要体现为集中的政治运动结束后对相关人群的口述历史访谈,主要对象包括政界人士以及政治运动牵连较深的人群(如知青等),采集者以知识精英或社会活动家为主,主要的成果呈现形式是口述文字出版与研究成果。③21世纪的(活动影像)视听纪录时代,主要表现是口述历史采集者与针对人群的双向全民化。

尽管此划分标准是记录方式,而背后的各种社会因素却非常复杂,但记录方式的确与其背后的这些社会因素的变化具有一定同构性和极为密切的关系。笔者曾有个核心论述,即现代口述历史作为一种实践,是传统档案活动在现代视听记录时代应对社会关注范围的扩散而形成的对传统档案记录覆盖面的补充与扩充^[5]。上述3个阶段很明显地显示出这一点,首先是传统档案记录与历史关注点的延续,如官方对政治、军事等传统领域亲历者的文史资料征集,其次是建国后意识形态的巨变导致对农民起义历史的重新定义,而这部分面临着传统档案记录的严重缺失以及意识形态的对立。随着记录手段的视听化——亦即档案记录手段的平民化,采集者与访谈对象也从政治、军事精英走向平民化,与之伴随的也同样包含意识形态的变迁。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发展经历了类似的3个同步阶段,但也兼有其特异性。官方主导、笔录为主要形式的50年代,电影人个体记忆的采集首先同样与官方系统修史的目标直接相关,也同样与官方修史的意识形态性直接相关。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电影因其对大众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而居于相当核心的地位,也是重塑意识形态最重要的工具之一,那么对其历史的梳理也就顺理成章。电影人个体记忆采集受到关注的另一个原因也在于电影的大众性,其在人们

日常舆论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事实上我们看到程季华团队特别关注的访谈对象主要限于那些著名的电影艺术家或公众人物,这种知名度并不亚于传统历史中的政治人物,而这在各个行业中并不多见。

与传统历史书写的联系并不意味着对个体记忆的依赖。电影史的书写面临着更加缺乏传统档案记录的困境,尽管电影史并不一定就是行业史,但的确对于行业相关档案存在依赖,特别是艺术领域,因为仅凭影片文本以及相关的新闻报道很难弄清楚其创作的过程以及相关要素。事实上,电影艺术档案与其他艺术档案的概念一样,基本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如同其他行业一样,电影行业的内部档案也大大滞后于公共档案。

笔录是否属于现代口述历史的范围一直存在着争议,笔者倾向于原则上以现代视听记录手段作为区分标准,但也并非严格限定表面上的记录方式差异,而强调其内在的证据化、文献化的实质。不过无论如何,笔录作为一种转折与过渡,很能说明现代口述历史源于传统档案实践覆盖范围扩大的看法。电影人一方面作为行业人具有不得不依赖口述史来研究的特点,同时也具有与传统历史关注范围以及大众关注范围之间的直接联系,因而能在20世纪50年代表现出独特的历史书写景观。不过,在录音时代,电影人口述史的表现相对并不突出,反而在(活动影像)视听时代突然大放异彩,甚至引领整个口述历史事业的全面普及,直接的原因正是在于这是一个视听行业。

3.2 电影行业受访人的交叉视点

在国际口述历史领域存在着档案型口述历史与社会历史型口述历史的区分,笔者曾论述过这是两种类型而不是部分学者认为的两个阶段,即在他们看来是从史料的数据搜集发展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过程,也是从精英历史走向草根历史的过程,而后者在国际上开始于20世纪60—70年代,的确晚于40—50年代的所谓档案型口述历史。不过,在中国大陆80—90年代以录音为基本记录方式的口述历史潮流中,电影人的确相对不太显眼,这跟前一阶段的电影人个体记忆呈现的主要成分是艺术精英有关,但也存在着其他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电影人这个群体本质上是基于活动影像的视听文化人群。

起始于19世纪的录音术、摄影术和活动影像技术开创了人类的视听记录时代,视听技术成为人类历

史上第一次能唯一与文字记录并驾齐驱的记录方式,特点是将占人类信息接收绝大部分的视觉与听觉信息机械复原并固化,这其中又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有声电影的成熟为首个最全面的视听集成技术并开创了人类的视听文化。实际上,后来的各种视听文化理论大多渊源于对电影的研究,正因如此,笔者在创建电影档案(文献)学理论的时候,也声称实质就是创建视听档案(文献)学的基础理论,而口述史这一视听社会的产物正是影音文献的一部分。录音记录时代从根本上说是由于那个时期录音技术的廉价与活动影像技术的昂贵,活动影像技术平民化之后,口述历史便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得到普及。这在理论上可以视为口述历史的访谈现场性,活动影像能将这种还原的现场提供给利用者,至少比录音记录多了一个活动影像的维度,而受众很多是普通公众而非学界精英。

尽管严格的现代口述史几乎没有用胶片记录的案例,但从影音文献的角度来说,20世纪60年代电视记录成熟之前,电影一直是主流的视听文献载体,甚至唯一的活动影像记录载体,电影人是影音文献及其文化的主要制造者。这意味着两个方面的联系:这个行业的成员习惯于用影像与声音而不是文字书写;即便那些之前也用文字传达自身生命故事的艺术精英,其生命故事的最佳呈现方式还是活动影像。这就是《电影传奇》选择电影人并将这些访谈最终发展为一般口述历史事业的深层原因。实际上,即便是学术界,对于将电影类同于其他艺术特别是文学的研究方法已经过时,电影即便是作为艺术,其工业化的集体创作的特征也使得各种社会与非社会的因素都会对其文本的最终形态构成或大或小的影响。

这样一来,电影人口述历史涉及到的一个交叉点就在于电影人身份的双重性,他们首先是作为电影行业的职业人,其次是作为社会历史中的普通人——这取决于采集者的目标取向,但至少存在双重的可能性。中国电影资料馆的项目很好地体现了这一点,以人为中心,进而确定了职业史、社会史、个人心灵史的三维视角。即便是作为职业人,笔者也明确做电影人口述历史的基本思路是做电影人的民族志,也是社会结构特别是行业的一个缩影。电影人同其他人群一样,具有其自身内部人际与社会行为规范惯例的传承,而这种职业人也使得他们在作为普通人的时候具

有一种独特性或职业的双重视角,他们作为影音文献与文化的创造者,也是一般历史、特别是传统主流历史的见证者。

一旦电影背后的故事通过影像的方式讲述出来,这种历史陈述的主体很大程度上也就摆脱了艺术精英对话语权利的垄断。不同于传统文字媒介中集中于编导演的电影史述,我们看到在《电影传奇》中围绕一部影片对众多电影人,包括摄录美乃至服化道人员的访谈。对于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来说,其以人为中心的目标更进一步延伸到电影创作(制作)之外的其他领域,从中去寻找全面反映整个行业人的典型。那么这种结构化的呈现,也就既包括了精英人群,也包括了行业中的草根阶层,例如笔者曾访谈过制片厂的木工、洗印工人,农村放映队的基层放映员等。其职业网状结构的交叉性在此有同样的表现,如电影研究者之于一般研究工作者、电影政府官员之于一般政界人士等,甚至还包括对于口述历史事业尤为重要的档案馆、图书馆行业人。根据现有的资料,项目对于中国电影资料馆人的访谈可能是在中国大陆最早对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行业人进行系统口述历史采集的实践。这一点尤为引人关注与疑惑之处在于:图书馆、档案馆人本身就是国际上现代口述历史实践的主要主体,甚至没有之一,但却少有实践把口述史采集目标投向自身行业从而表现得与电影人不同。

3.3 电影人口述历史采集实践主体的交叉视点

虽然电影人口述历史广受关注,但就采集者来说,主要还是电影行业或相近乃至本质上相同的行业如电视等——自己内部具体操作,尽管直接目的为电视片的个体记忆访谈我们并不视为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历史。不过口述历史项目的交叉视点也从这些人和机构体现出来。在口述历史全民化之前,口述历史实践的操作者主要集中为3种类型:新闻(媒体)人、学者以及图书馆、档案馆人。有趣的是,被尊为现代口述历史开创者的艾伦·内文斯一人兼有这3种身份:从采访政界人士的新闻记者到研究政治历史的学者,最终为巴特勒图书馆操作口述历史项目。与此相应,电影行业也同样包括这3种身份的从业者,但他们跟其采集对象一样有一种特殊的共同身份:他们本就是影音文献及其文化的直接创造者。甚至对于普通的行业人,他们也有利用视听技术记录自己的惯例优势,这

是其他人群大多不具备的,后者不得不依赖研究其人群的学者,否则很容易陷入自说自话而缺乏社会影响力。

电影行业的新闻人、媒体人首先是将电影本身作为一种新闻媒介的职业工作者,在电视新闻风行之前,电影是主要的视听新闻媒介,而电视新闻实质上是电影新闻的继续,其间实际只有物质载体的区别。如果考虑到国内区分不清的纪录片与新闻片概念(笔者一直认为纪录片不同于新闻片,在于其是以做档案、文献为基本目标的影片片种),以新闻纪录电影为核心延续下来的对活动影像记录历史的精神可以集中体现在《电影传奇》中。实际上,早在80年代的录音记录时代,就曾有诸多电影人参与过不多的针对退休政界人士口述历史的活动影像记录。电影行业的新闻媒体人其次是行业内部报道本行业的工作者,他们在关于电影的视听新闻方面产生交叉,但即便文字新闻工作者也同样关注电影人的个体记忆。相对来说,媒体人参与的口述历史往往注重其传播性而忽视其历时性的保存,但对于以视听为手段的大众传媒来说,对非虚构影像的长期保存从来就是一个重要传统,因此也并不奇怪《电影传奇》团队能发展为以长期保存为目的的口述历史研究中心。

电影史的学者在这里也包括电影机构的史志工作者,后者常常更认同历史书写与研究而不是资料工作——他们往往也是公共媒介上关于艺术家生命故事的主要撰稿者,正如前述在历史书写与研究中相对于传统主流历史往往不得不更多依赖个体记忆史料,特别是笔录时代,因为他们面临着既有文字文献的匮乏问题。而且笔录时代的电影史对于公共媒介上的新闻报道常常会遇到失实问题,因为这些新闻报道更多的目的是出于对影片的宣传而非客观的信息提供,甚至娱乐新闻的不可靠性在各类新闻中也是比较突出的。不过,当他们面对口头访谈史料的时候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那些从艺术家的访谈获得生命故事的实践对访谈双方来说都有一种将其当作艺术创作的职业倾向。电影史书写与研究长期存在对史实考证不严谨的问题,加上电影本身的意识形态性,电影史家往往会在历史研究的严谨性以及精英与草根的矛盾史观等问题上表现出更加紊乱的多重视角——理论上这些问题都体现为关于档案型口述历史与社会史家型口述历史之间的争执,与此同时,也提供了对于

亲历者确证乃至对亲历者口述的可靠性加以反思的需求。

对于电影行业内的图书馆人、档案馆人来说,上述多重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存在,即便排除那些具体机构内的资料工作者,这一群体也可以说是整个电影行业的史志工作者。不过,国家电影资料馆还有着更多侧面的多重视角,例如集行业记忆的保存者与以视听媒介为工具的国家与民族记忆的保存者身份于一身,而在其他的电影人那里基本上却是两个人群——后者的典型代表是纪录电影工作者,是更靠近口述历史的社会史家的那部分人群。笔者曾多次强调中国电影资料馆作为国家视听档案机构的定位衍生出在口述历史领域的国家个体记忆记录综合收藏中心的定位,尽管这一理想没能实现,但在项目内部,却的确将电影人作为一段社会历史的亲历者进行访谈而不同于关于电影的历史,受访人选择上也以其人群的网状结构特性为主要的样本选择标准。再如几乎贯穿国际电影资料馆事业的一个理论纠缠——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的机构属性之争,对口述历史来说也同样提供了一个多重视角的机会,因为图书馆与档案馆在主导口述历史实践的时候也同样面临不同的理论逻辑。

对于作为具体操作者的机构与个人来说,源于行业特征的自身因素也可能产生多重视角的侧面。例如口述历史实践是从采集、整理、编目、典藏到传播、利用的一整套流程,但与媒体人、学者为主体的口述历史实践不重视原始记录保存相反,在国内的图书馆、档案馆领域,对于采集或访谈工作是否属于自己工作

范围一直存在争议,因为按照某种理论思维,这部分工作是“创造文献”,应该属于研究者或媒体工作者。尽管笔者一直主张,至少就档案工作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将非文献信息文献化的过程,而影音记录工具是一种低成本的文献化工具,因而用影音工具记录口述历史就是一个对个体记忆存档的过程,但中国电影资料馆特有的一个机构两块牌子(电影资料与电影研究)无疑是更主要促成这一没有太大争议的实践的原因。而且,尽管两块牌子之间有着传统的矛盾,但也正因为这种矛盾,一些企图弥合这种矛盾的研究者会从中得到独特的多重视角思考的机会。正因为这样,以基本身份为资料馆中的学者主导的口述史实践能产生完备的保密与解密年限制度。对于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组来说,多重视角表现得更明显,包含了上述三类人员,特别是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的还有纪录片制作者与研究者。因此,无论是项目实践还是基于项目的理论思考,都表现出全流程的多重视角、多元观点但又能统一起来形成共同的理论风格的平台。例如,陈墨的多学科视角以及作为基础的“人类个体记忆库”的立论便体现了这一点^[6]。

电影行业人口述历史形成与总体的口述历史之间网状结构似的联系,尽管这种网状结构存在于所有的口述历史实践之中,但电影人口述史却处在一个突出的节点上,透过这一视点可以一窥口述历史领域的更多风景,也是一个良好的标本,而不仅仅是影音文献工作者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尽管“先得月”也是其多重视角的一部分。

参考文献:

- [1] 张锦.电影作为档案[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
- [2] Edmunds HE. The Ford Motor Company Archives[J]. American Archivist, 1952, 15(2): 99-104.
- [3] 程季华, 刘小磊. 病中答客问——有关《中国电影发展史》及其他[J]. 电影艺术, 2009(5): 108-117.
- [4] 程季华, 朱天纬. 病中再答客问——关于《中国电影发展史》[J]. 当代电影, 2012(10): 4-8.
- [5] 张锦. 再论作为视听档案实践的口述历史本体[C]// 载林卉, 刘英力. 口述历史在中国: 第一辑, 多元化视角与应用.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12-27.
- [6] 陈墨. 口述史学研究: 多学科视角[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5.

作者简介: 张锦(1967—), 男, 中国电影资料馆暨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电影人口述历史项目专家组组长, 研究方向为电影档案与纪录片、外国电影、中国电影史、电影创作与媒介理论等。

收稿日期: 2017-11-06

· 专题 口述文献整理与研究 ·

女性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关系辨析

李慧波

(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 北京 100101)

摘要: 学界对妇女口述历史的认识存在一定的差异。“女性口述历史”比“妇女口述历史”更能涵盖全面。女性口述历史包括两个方面,即作为口述史子集的女性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后者涉及两个层面,一是以女性主义者为主体的历史;二是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口述历史。通过对关注的主体、认识的视角、研究的内容等方面对作为口述史子集的女性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比较,可以进一步明确二者的区别与联系,从而为妇女口述历史的收集和研究作出努力。

关键词: 妇女口述史; 女性主义口述史; 女性口述史

中图分类号: G251

文献标识码: A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among Female Oral History and Feminist Oral History

Abstract There are some differences in the understanding of women's oral history in the academic circle. The female oral history is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the women's oral history. The female oral history includes two aspects, that is, feminist oral history and female oral history that is as a subset of oral history. The former involves two aspects, one is the history of the feminist as the main body and the other is oral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eminism. Through comparing feminist oral history and female oral history that is as a subset of oral history from the main subject of attention, the perspective of understanding, the content of the research, etc., we can further clarify their differences and connections, so as to make efforts for the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the women's oral history.

Key words women's oral history; feminist oral history; female oral history

1 问题缘起

在口述历史蔚然成风的今天,妇女口述历史也悄然兴起,且得到不少人的青睐。从目前出版的妇女口述史著作来看,地域上涉及中原到边疆;族类上涉及汉族到少数民族;群体上涉及女童、少女、女工、女行政人员、女专业技术人员、女战士、妇女干部、妇女活动家、女性教育工作者、女新闻工作者、山区妇女、农村妇女、女知青等;体裁上涉及生命历程型也涉及主题型,如生育、受暴、文化艺术等。从作者姓名及相关信息推断,除了一部分作者如杨立文、定宜庄、程郁等出身于传统史学界之外,也有如社会学学者潘毅、文学学者刘文菊、民族学学者何钟华、民俗学学

者杨洪恩、人类学学者张晓等人参与,其中还包括女性/社会性别领域的研究者如杜芳琴、张晓、和钟华、李小江、宋美娅、魏国英、张李玺等。但目前或多或少仍存在“妇女口述史属于妇女”现象,有些女性主义/女权主义学者对于这些虽以妇女为主体,但充溢着男性主体意识的口述历史成果进行了批判。如定宜庄曾说:“《最后的记忆》出版之后,美国就有个研究妇女史的学者提出,我这书里虽然做的是女性,却没有表现出自觉的女性意识。”^[1]在中华女子学院中国女性图书馆历年举办的妇女口述史研讨会上,也不断有学者指出,某些发言者的发言内容“没有或不具有社会性别意识”。这就涉及到妇女口述史应具备什么特点,女性主义意识是否是妇女口述史的确立的必不可少的要素?探讨它的特点,有助于我们理解妇女口

述史的价值并对其进行正确使用。

2 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什么是“妇女口述历史”学界没有专门的论述,但从一些研究性文章中可以看到一些学者对妇女口述历史的理解。如李小红认为“妇女史与口述史具有天然的盟友关系。”她还认为,“妇女口述历史在今天社会中兼有政治的和学术的双重使命。找回和重建女人的历史,不仅是史学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确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2]李洁认为,“口述史与女性主义视角在研究主体、研究内容、研究的真实性和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等方面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口述历史可以帮助我们从小对日常生活的讲述中挽救和建构妇女史。”^[3]李文芬认为,

“就关注弱势群体、挑战权威而言,口述史与女权主义有着天然的亲缘关系或战友关系。”“但是,就批判性别压迫、促进性别平等而言,两者的战友关系并非如此‘天然’合一。”“口述史未必就能促进性别平等,能否促进性别平等取决于做口述史时是否贯彻了女权主义精神。”^[4]“女权主义口述史是贯彻女权主义精神的口述史”“女权主义口述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女性及其性别经验,研究者(不仅仅是访谈员)必须具备性别意识和性别视角,能够站在女性的立场。”^[4]杨祥银认为,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唯一可能的是如何在女性口述历史过程中更好地体现女性主义视角……建立访谈者与受访者之间的平等互动关系,通过让女性(所有弱势群体)自己发言,挑战现存的包括性别、阶级、种族等在内的所有不平等观念与现象,真正实现个人自由、民族自决与社会平等。”^[5]魏开琼认为,“广义上,如果从事口述研究的学者在确立自己的研究主题和对象时针对的是女性,即便没有明确的女性主义意识,但其关注女性的立场同样属于妇女口述史的范畴;狭义上说,妇女口述史当是结合了女性主义理论与新社会史理论后形成的具有明确女性自觉意识和社会性别视角的收集史料与治史方法的结合。”^[6]从这些学者的表达中可以看出,妇女口述历史与口述史、妇女史和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等术语密切相关。其中,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称谓都是对英文单词feminism的中文翻译,“如果仅仅是从对同一个英文单词feminism的中文翻译来说,女权主义与

女性主义其实没有区别。”^[7]而在当下,女性主义一词要比女权主义一词用得更为广泛。

3 女性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史在概念范畴及功能方面的比较

3.1 作为口述史变项的女性口述历史(妇女口述历史)

“妇女”与“女性”这两个词在汉语系统中具有一定的区别。尽管《刑法》对于妇女的定义是明确的,即满14周岁的女性,但在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妇女”习惯上指成年女子。现实生活中,常指已婚已育的女性。“女性”的称谓,表示与男性相对的生物学上的性别划分,与“妇女”相比,其指代的范围更为广泛,特别是那些引领时尚潮流的年轻女性,更不希望自己被称作“妇女”。由此,“妇女口述历史”的称谓有可能会遗漏非“妇女”的范畴,可能会使人认为女童、青少年女性等群体不属于“妇女口述历史”的范畴。所以,笔者认为,将“妇女口述历史”改称为“女性口述历史”似乎更能涵盖全面。

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研究中的精英取向受到批判与反思,社会史倡导的对底层人群/弱势群体加以关注的呼声越来越高。弱势群体是社会学流行的一个主流概念。“社会弱势群体是一个社会分层基础上的概念,它指的是由于自然与社会的、先天与后天的、人为与非人为因素的影响,在社会地位、财富分配、政治权力行使、法律权利享有方面处于相对不利地位,以及在发展方面潜力相对匮乏的人群”。他们无力掌握社会组织资源,难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在表达自己利益方面处于绝对边缘化的地位^[8]。而口述史却可以发掘沉默的人群(如妇女、少数民族、社会底层)和人们沉默的声音(关于私人情感、生命体验等),使得史学有可能更完整地记录“人”的历史。因此,很多人一直在积极地推动着口述史发展。

正如没有其他边缘群体的历史是不完整的历史一样,没有女性的历史也是不完整的历史。然而,书写方式记载的女性史料如此之少,这就使得人们借助于口述历史的方法去拓展女性的口述历史资料的收集。这种收集方式,不仅令历史的包容面更广,而且摆脱精英化的局限,更能兼顾一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女界琐事”和个人感受,正如Gluck和Patai所言“口述史能令妇女在历史上变得‘可见可闻’,不再是无

声、无息、无史的一群。”^[9]

在这里,女性口述历史的主体为女性,它对应于以男性为主体的口述历史。最常见的就是以女性为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的口述史的收集,如女工口述史、女知识分子口述史、家庭妇女口述史等。实际上这些都是与口述史相关的子项,其目的摆脱历史记载精英化的局限,填补历史的空白,为口述史的收集开辟了更广阔的领域。如图1所示的集合B(作为口述史子项的妇女口述史)与集合A(口述史)的关系。因此,作为口述史子项的妇女口述史,仅是以填补历史空白和摆脱历史记载精英化为目的,把女性作为口述主体而进行的访谈/记录/研究的行为。它与访谈者的性别、立场和价值观无直接关联,访谈者可能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也可能不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甚至可能是反对社会性别平等的人,其收集和研究方法有可能是以父权制的价值观或男性史学的标准来进行的。



图1 女性口述历史(B)与口述史(A)的关系

3.2 女性主义口述史

女性主义口述史是随着性别研究的拓展发展而来的。我们知道,女性主义是从反抗性别歧视的斗争中产生的。很多女性主义学者也一直积极地推动口述史的发展。与社会史的倡导者一样,他们也认为,“口述史可以把被主流社会忽视的女性群体带入学术和公众视野。”^[4]在此基础上,“他们吸纳口述史搜集、整理、分析史料的方法和理论,以妇女口述史的系统性、真实性和深刻性更有效地让妇女及其经验可见,让女权主义观念、理论和行动更具说服力和感染力”^[4]。可见,女性主义口述历史与一般口述史不同,它不仅具有批判的特征,而且还要赋权于妇女,改变性别不平等状况。所以,笔者认为,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可以分为两个层面来理解,既可理解为以女性主义者为主体的口述史,即女性主义者本人口述的历史;也可以理解为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口述史,即女性主义者通过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来进行口述史的收集和研究行为。

3.2.1 以女性主义者为主体的口述史

这类口述史的受访者全部为具有性别平等意识

的女性主义者,如《记录她们20年的行动足迹——北京+20妇女活动家卷》(第7—9卷)和《妇女口述历史丛书》(第6卷)中的受访者。书中访谈员提到的问题和受访者的回答都是围绕推动社会性别平等运动来展开的,带有明显性别意识。这类口述史的受访者不仅是生理性别为女性的女性主义者,也有生理性别为男性,却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者,即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男性,如受访者方刚、李明舜、李树茁、张开宁等。

3.2.2 女性主义视角下的口述史

这类口述史的受访者的回答尽管没有社会性别意识,但是访谈员提问的问题却带有明确的社会性别意识,如《倾听与发现:妇女口述历史丛书》(第1—5卷)和《妇女口述历史丛书:女新闻工作者卷》中的访谈内容皆是如此。访谈员不仅关注女性个体在时代社会大背景下的际遇,还关注“制度性或结构性的社会和文化对女性自我发展的制约性压迫和对自我决定的阻碍支配因素”,同时还关注女性“在社会性别制度制约与空间中的主体性”^[10]。甚至通过访谈,去分析、批判并改变不平等的性别权力关系。也就是说“女权主义口述史的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性别敏感度和分析能力,以及具备建设性批判与行动的能力。”^[4]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具有以下特点:

(1) 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除了与口述历史一样,女性主义口述历史鼓励普通人发声,挑战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外,还对一般口述史可能存在的性别盲视进行批判。正如有学者所言,“女权主义向口述史的注入,显然可以帮助它反思可能存在的性别盲视,甚至性别歧视,从而形成更强大的批判力。”^[4]

(2) 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方法,为人文社会科学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某种程度上,女性主义口述史可以看作是妇女研究的一个子项。女性主义口述史有助于促进妇女研究的跨学科(如历史学、人类学、交际学、语言学、民俗学、文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及跨领域(性、婚姻、家庭等)的发展。正如格拉克与达芬尼·帕特主编的《女性的话语:口述历史的女性主义实践》一书中提到的,“传统的口述历史方法已经不能很好地满足女性口述历史的兴趣,我们必须利用跨学科视角,只有如此才能更为深刻地理解女性主义口述历史的复杂性。”^[5]

(3)是一种政治手段。女性主义口述史具有明确的为妇女发声,“并最终改善和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参与”^[3]的目的。即实现琼·凯利-加多(Joan Kelly-Gadol)“将女性还原到历史中去,为女性重建女性历史的理想”^[11],以挑战、改变不平等的性别关系。

(4)具有行动导向。女性主义口述史不仅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种方法,同时具有明确的行动导向,是女权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如《记录她们20年的行动足迹——北京+20妇女活动家卷》(第7—9卷)和《妇女口述历史丛书》(第6卷)的编写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通过年轻的访谈员与妇女活动家对话来梳理和总结近20年来中国妇女发展的路径,也希望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精神在青年一代群体中得到传承。年轻的访谈员在后记中写下了:“我向所有兢兢业业为社会性别平等事业默默付出的前辈们表达深切的敬意,你们就是我们青年一代前进的指明灯,是我们奋斗的风向标。我会把这次访谈所吸取到的正能量传递给更多身边的人,希望我们每一个参与者都能尽自己最大努力为性别平等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推动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在我国早日实现”^[12]。可见,女性主义口述历史“与一般的口述史不同,其批判精神与行动导向超出纯粹学术研究的领域,与社会生活、社会运动直接挂钩,用学术行动及其他衍生行动直接推动性别平等和妇女权益的发展。”^[4]

3.2.3 口述史、作为口述史子项的妇女口述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史的比较

由以上叙述可见,口述史、作为口述史子项的女性口述史及女性主义口述史之间有联系也有差异,其中的关系如表1所示。三者都具有批判的特征,但前两者主要是为底层人群/弱势群体(包括女性)发声,但女性主义口述史的目标是,使得女性得到社会的承认和肯定,并建立一种两性平等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实现男女两性的共同进步和协调发展。它不只在将受访者看作资料收集的工具,也不仅是作为一种研究手段,其原动力或追求的目标是以妇女为出发点,以性别公正为目标,以口述史作为手段,使妇女状况得以改变,使理想的性别公正得以实现。

作为口述史子项的妇女口述史中的受访对象虽然是女性,但访谈员也许并不具备从性别角度进行分析的意识和能力。而女性主义口述历史虽然与受访者

和访谈员的性别无关,但其立场和价值观一定是具有社会性别意识的女性主义视角,即女性主义口述史的访谈员必须具备从性别角度进行分析的意识和能力。当然,三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分开,当我们以女性为研究对象或访谈对象时,不管是否具有社会性别意识,不能不注意女性的立场、观点及生存状况。而且,女性口述历史也会涉及到对两性关系的研究,因为两个性别世界的关系,如家务劳动与外出工作、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关系等都“超越了将女性作为单一性别群体的历史考察。”^[11]

4 妇女口述史的收集方法

4.1 既要关注精英女性,也要关注普通女性

历史是延续的,口述史的价值在于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作为被遗忘的大多数的女性群体而言,她们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独特且有价值的,每一个女性的人生故事都能折射出时代的光辉。只有倾听她们的叙述,“才能追寻捕捉她们的经历,追寻她们的历史,提供史学知识的生产。更重要的是,对妇女的这段经历已经作为过去为今天提供的珍贵史料和精神遗产而赋予教育、启示的价值。”^[10]不仅如此,“中国妇女地位的变迁,与我国的政治、经济变革关系相当密切,如果将众多的第一手资料收集起来,对研究妇女运动史将有很大意义。”^[13]即使一些女性仅担家庭角色,也应该看到其价值。家庭主妇付出的艰辛绝不低于职业女性。她们对于家庭的照顾以及对孩子的爱护和教育,绝不比外出工作的母亲少,对优良家风的构建与和谐家庭的建设起着良好的作用。所以,家庭主妇的力量和作用不可忽视,她们和职业女性同样为社会和国家奉献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她们的社会地位和价值理应得到肯定。

4.2 既要关注女性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贡献,也要关注私人领域里被忽视的议题

在制度性、结构性的社会性别建构下,要建立对女性生命事件的敏感,既要关注女性在宏大历史叙事中的贡献,也要关注那些非偶然性的又被视为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具有性别特征的生命事件。在传统性别制度中,女性承受着职业和家庭责任的双重负担和压力,需在3种角色(女孩、妻子、母亲)中尽责,才可能被称为“完整女人”“好女人”。作为女孩需要乖巧、

表1 口述史、女性口述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史的比较

	对比项目	口述史	女性口述史	
			作为口述史变项的女性口述史	女性主义口述史
异	目的	批判主流历史，为底层人群/弱势群体发声。	批判主流历史，使妇女作为社会人回归社会。	批判主流历史，并以女性批判的眼光看待历史中的两性。
	受访者类型	男性或女性	女性	女性主义者(男性或女性)
	受访者特点	可能不具备社会性别意识	可能不具备社会性别意识	可能不具备社会性别意识 具备社会性别意识
	对访谈员的要求	具备口述史的相关知识，但可能不具备从性别角度进行分析的意识和能力。	具备口述史相关知识，但可能不具备从性别角度进行分析的意识和能力。	具备从性别角度进行分析的意识和能力
	收集标准	遵循传统学术对资料收集的客观性的单一标准	遵循传统学术对资料收集的客观性的单一标准	反对所谓“客观中立”原则。为女性发声，重视女性的主体经验、促进她们自我赋权。
同	反思性、批判性、挑战权威，鼓励缺少话语权的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			
	与访谈对象建立平等协商关系			
	主要对象为普通人群			

懂事、干净、漂亮、懂规矩……婚后作为妻子除了完成生育，还要担负起养育孩子、料理家务的重任，甚至还要尽显温柔体贴、慈爱宽厚、含辛茹苦、不求回报的品格。这些都是制度性、结构性的自我发展的制约性压迫，属于阻碍性支配系统。“再生产劳动负荷与职场工作冲突使她们中的许多人发出责任重、待遇低、家庭无助、牺牲、受歧视、窝囊、不平等的抗争之声。”^[10]如纺织女工杨美珍说：“小女儿，也是我生下她56天开始上班以后，就送她去托儿所了。上班的时候把孩子送去，工作时间该喂奶了，有人替着干活，我赶紧去奶孩子，孩子6个月到1岁的时候在工作时间奶两次孩子。下了班就自己抱着孩子去开会，不管开到什么时候都得抱着孩子开，带点儿吃的。晚上等孩子睡了，还想干点儿活儿，给她洗洗、缝缝、补补。那时候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的觉，上班困得我还没络纱就用手拨穗子，明明这些纱都掉在盒子里，我就觉得是掉到地上了，赶快跟着去摸这个穗子，结果摸不着。从盒子里拾起个穗子以为是萝卜，就啃一口，把牙硌得生疼”^{[14]44-45}。这些私域中家庭日常生活议题，“不仅让我们看见并重估女性在宏大历史叙事中往往被淹没的贡献，并重估历史书写的意义，更让我们从她们生命史的追寻中，发现那些被忽略的事业与家庭私域的冲突张力、生存状况复杂性和更隐秘的内在精神世界。”^[10]

4.3 关注女性的主体性

妇女主体在制度文化建构中不仅仅是被压迫者，

她们也有自己的能动性。我们在对女性进行访谈时，除关注其家庭角色之外，还需要关注女性怎样发挥主体能动性应对父权制性别制度结构的制约和限制。其实，“每个个体都处在一连串的结构位置和主体位置的交织、嵌入甚至冲突之中，有时出现无法完全实现在结构位置中的自主选择；但主体位置在结构位置中通过不断的实践经验与话语言说也可能建构型塑个人积极的主体性，或顺势适应，或抵抗压迫，或自觉能动有意识地创造变革改变自己 and 所处的环境。”^[10]如初等教育工作者高春英回忆：“解放初期，大多数的人家生活贫困，孩子们都不能上学读书，我们家更不用提了。男人下地耕种、锄、耨，女人在家里除织纺就是干针线活儿，妈妈只知道干农活儿、织布纺线换粮食吃，认为女孩儿们读书无用，只让我哥哥一个人去读书……那是50年代初，我看到有的人家女孩儿上学读书了，我们姐妹们羡慕了，就哀求妈妈，开始妈妈不答应，我们就每天不停地说呀、求呀，让别人说情呀，最后妈妈让我和二姐上午到学校报名。我们高兴而去，可到了下午妈妈变卦了，说什么‘都上学去，耽误纺线、薅苗、拾柴什么的，还是不去读书为好。’我急着说：‘比我大点儿的邻居老姑都去了，就让我去吧，好妈妈。’我坚持边闹边哭，求别人说情。几天后，妈妈见拗不过我，最终决定让我一人去上学，二姐留在家里干活儿；当时二姐又哭又闹，非要上学不可，但无论怎么闹，也没让二姐去。我虽然让去上学，必须答应妈妈一个要求，就是每天纺三捆布

介,我答应了,这才开始了我的学生生涯。”^[15]受访者家庭经济条件差,其母亲认为女孩子读书无用,极力反对女孩子上学。但个体是一个动力性的整体,不是受制于社会路线的被动承受者。受访者虽然受到各种限制,但是通过主观努力获得了受教育机会。可见,外部环境固然对个体的生命历程有很大影响,但个体的生命历程并非完全取决于外部环境,个体的能动性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也有很大的作用,甚至成为最终决定个人生命历程的机制。即使是对不平的倾诉,也能显示出妇女的能动性。

4.4 兼顾“史”“学”结合的优势,避免各自的局限

对于女性主义口述史与作为口述史变项的女性口述史或口述历史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关注其“衔接”或“对接”的一面,而不是“彻底颠覆”或“全盘否定”。仅仅有作为口述史变项的女性口述史或女性主义口述史是不够的,前者缺乏理论根基,后者不足以成为建构“历史”的全部基础。从妇女口述史的发展态势来看,与妇女史的研究具有相似性,首先是作为“口述史”的“添加史”,妇女口述史被添加到男性构建的口述史学中,进而构建完全属于女性的“作为口述史变项的女性口述历史”,继而把性别作为工具,发展成“女性主义的口述史”。从“挖掘”历史上“女性”这一群体,进而考虑到“社会性别”,这一发展趋势有其必然性和逻辑性,让我们用更加多元的视角

来窥探、审视和构建既有的历史。也就是说,“不只关注妇女的生活与命运,以及历史上两性之间的关系,同时还担负着对以往历史知识建构的全面审视和包括两性经验在内的新的历史知识建构的任务”^[16]。所以,笔者认为,作为口述史变项的女性口述史的“史”和女性主义口述史的“学”可以结合起来,“史”为原料,“学”为理论/方法,二者的结合,可以使得口述史收集和研究中的理论、视角和方法更加完善。

5 结语

我们看到,女性口述历史中涉及到的非女性主义的女性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口述历史是并行存在的。并不是所有的女性口述历史都是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前者是后者的必要不充分条件。有些女性口述历史的著作是无性别意识的,甚至是按照父权制的价值观而写作。女性主义口述历史具有政治性,而女性口述历史并非一定具有政治性。但这并不是说二者是处于对立面的,也并不排除二者的合作。正如定宜庄所言,“妇女史引入‘社会性别’概念,提供了一个理解和阐释历史的全新视角;应该尽量开拓史料收集范围,但不能置传统史学文献与优良传统于不顾。”^[17]这对妇女口述历史也同样适用。可见,妇女口述历史范围的广泛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其复杂性与发展性。

参考文献:

- [1] 许斌,定宜庄.一个口述史学者的口述:定宜庄博士访谈[J].黑龙江民族丛刊,2003(5):85.
- [2] 李小江.女性的历史记忆与口述方法:从“二十世纪妇女口述史”谈起[N].光明日报,2002-08-06(B3).
- [3] 李洁.口述史与女性主义研究的亲缘性[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2(3):94-97.
- [4] 李文芬.女权主义口述史:作为女权主义行动的口述史[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5(6):86-91.
- [5] 杨祥银.妇女史、口述历史与女性主义视角[J].浙江学刊,2004(3):211-212.
- [6] 魏开琼.中国妇女口述史发展初探[J].浙江学刊,2012(4):198.
- [7] 女权主义与女性主义有什么区别吗?[EB/OL].[2017-07-12].<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4/49156/4281407.html>.
- [8] 李莉.和谐社会中的妇女非政府组织:角色、作用与行动[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26-27.
- [9] 叶汉明.口述的性别维度:从工作与家庭对香港制衣业男、女工人的意义切入探讨[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2014:1.
- [10] 杜芳琴.追寻·发现·倾听:融生命史于宏大叙事中的妇女口述史——评《追寻她们的人生》系列[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6):13-17.
- [11] 金利杰.对女性主义史学的再认识[J].妇女研究论丛,2014(1):51-52.

- [12] 张李玺.记录她们20年的行动足迹:北京+20妇女活动家访谈录(7)[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5:30.
- [13] 赵金平.当代女性口述史刍议[C]//中国近现代史科学学会,中共石河子市委党史研究室.中国近现代史及史料征集研究(二)中国近现代史史科学学会学术会议论文集.新疆:新疆教育出版社,2002:301.
- [14] 张李玺.追寻她们的人生:女工人和女行政人员卷[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5.
- [15] 张李玺.追寻她们的人生:学前和初等教育女性工作者卷[M].北京:中国妇女出版社,2015:217.
- [16] 杜芳琴.历史研究的性别维度与视角:兼谈妇女史、社会性别史与经济[J].山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4):111.
- [17] 高世瑜.从妇女史到女性别史:新世纪妇女史学科发展十年[J].妇女研究论丛,2015(3):118.

作者简介: 李慧波(1979—),女,中华女子学院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情报、口述历史、社会性别。

收稿日期: 2017-11-06

(上接第25页)

- [16] 次旺俊美.西藏《格萨尔》抢救工作及其研究前瞻概述[J].西藏研究,2002(4):1-4.
- [17] 尕玛多吉.莫让“绝唱”成“绝响”[N].光明日报,2017-04-07(005).
- [18] 闫振中.激活原始的基力——贺《中国民间故事集成·西藏卷》的出版[J].西藏民俗,2002(4):43-49.
- [19] 西藏非遗保护工作实现数字化[EB/OL].(2014-08-02)[2017-05-02].http://www.xzxw.com/zhuanti/sbjyszqh/wh_6904/201505/t20150513_544957.html.
- [20] 常凌翀.互联网时代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传播路径[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3):167-171.
- [21] 益西拉姆.四川藏区民间口传文献的保护现状及对策[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5(2):51-55.
- [22] 程文雯.非遗入库 为康巴歌舞建个记忆档案[N].四川日报,2014-07-04(013).
- [23] 《格萨尔》保护35年:咏唱那流传千年的故事[EB/OL].(2017-05-22).<http://www.mzb.com.cn/html/report/1505231888-1.htm>.
- [24] 马宁.中央西藏工作座谈会与西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40-44,139.
- [25] 尕玛多吉.《格萨尔》藏译汉项目取得阶段性成果[N].光明日报,2017-03-25(001).
- [26] 国家立项资助编撰《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EB/OL].(2013-04-02)[2017-05-12].<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3/04-02/4699273.shtml>.
- [27] 洲塔.藏族民间口传文化汇典[M].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14:1.
- [28] 邢肃芝(洛桑珍珠).雪域求法记 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M].张健飞,杨念群,笔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29] 杨恩洪.藏族妇女口述史[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
- [30] 白玛朗杰,孙勇,仲布·次仁多杰.口述当代西藏第一[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2.
- [31] 卢小飞.西藏的女儿:60年60人口述实录[M].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2011.
- [32] 常川.《西藏百万翻身农奴口述史》首发[N].西藏日报(汉),2017-05-09(001).
- [33] 朝戈金.重视我们的口头传承[N/OL].人民日报,2016-3-21(007)[2017-05-15].<http://kns.cnki.net/kns/detail/detail.aspx?FileName=RMRB201603210071&DbName=CCND2016>.

作者简介: 冯云(1984—),女,博士,西藏民族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藏学文献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

收稿日期: 2017-11-06

· 探索与创新 ·

基于SWOT分析的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策略研究

马祥涛

(中国国家图书馆 北京 100081)

摘要: 基于国家政策和文件中的相关表述以及已开展的实践探索,运用SWOT模型分析研究图书馆在参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优势、劣势、机会和挑战,从挖掘馆藏资源、推进延伸服务,完善制度设计、理顺体制机制,妥善处理知识产权及各种矛盾关系等方面探索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的具体策略。

关键词: SWOT; 图书馆; 文创产品; 产品开发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Library Participating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WOT Analysis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levant statements in national policies and documents and practice exploration carried out concerning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researches the strength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library in the process of participating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using SWOT model. Then, it puts forward specific strategies for libraries to participate in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development, including exploring the collection resources, advancing extension services, perfecting system design, improving system and mechanism, and properly hand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other conflicts.

Key words SWOT; library; cultural and creative products; product development

引言

2016年5月,文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国家文物局联合发布《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6〕36号,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各级各类文化文物单位要依托本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逐步形成形式多样、特色鲜明、富有创意、竞争力强的文化创意产品体系^[1]。《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也明确指出,落实推动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政策措施,加强示范引导、搭建平台、展示推广,调动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文物单位和创意设计机构等社会力量积极性,创作生产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适应市场需要、满足现代消费需求的优秀文化创

意产品^[2]。作为社会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图书馆尤其是公共图书馆拥有丰富的文献资源,履行传播文化、传承文化的社会职能,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和文化创意产品开发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本文运用SWOT模型分析研究图书馆在参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过程中的优势(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机会(Opportunities)和挑战(Threats),厘清图书馆角色定位,便于图书馆结合自身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发展策略。

1 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概述

文化创意产品(以下简称文创产品)是与一定民族和地区的文化背景相联系,源自个人才情、灵感或

智慧并通过产业化的方式进行生产、消费和营销的,满足人们精神需要和欲望的任何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3]。它是以文化创意为核心,是人的知识、智慧和灵感在特定行业的物化表现^[4]。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一方面要扎根于一定的理论支撑,如图书馆在社会发展中的职能和作用等;另一方面又要立足于我国图书馆界已出现的实践探索。

1.1 理论支撑

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是由其职能和作用决定的。作为社会历史和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图书馆是一个专门收集、整理、保存、传播文献并提供利用的科学、文化、教育和科研机构。20世纪70年代,国际图联(IFLA)在法国里昂召开的图书馆职能科学研讨会上曾将其职能概括为四点,即: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情报,开发智力资源^[5]。图书馆依托本馆馆藏文献资源参与开发和研制文创产品,是挖掘珍贵历史文化典籍价值的有效途径和手段,是弘扬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客观要求和具体体现,而这正契合了图书馆的职能和宗旨。

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是由其角色地位和组织担当决定的。从社会构成和发展层面看,图书馆的存在有其特定的身份和价值,其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公共文化机构,更是整个社会文化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履行的不仅仅是某项职能,更是整个历史发展的有力推动者。社会现代治理理念的普及和文化消费经济的增长,要求图书馆在完善现代社会治理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一方面能在一定程度上打破现有行政体制的桎梏和局限,进一步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力度,便于社会“大机器”更良好有序地运行;另一方面能促进文化产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文化消费水平的逐渐提高,进而推动国家经济更高效全面的发展。

1.2 实践探索

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若干意见》等国家政策文件出台前,部分图书馆充分意识到文创产品开发在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发自身馆藏资源中的重要作用,并积极开展实践探索。一方面,图书馆探索开发新产品,增加产品数量,丰富产品类型,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例如,国家图书馆以典籍文本为依托,以典籍内容为精髓,相继推出甲骨文手工皂、《庆赏升平》卡通公交

卡、《十竹斋》信笺等产品^[6];与此同时,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推介文创产品,借助淘宝等第三方线上平台推出“国图旺店”。山东省图书馆利用珍贵古籍文献资源策划了限量版图书《十美图》《圣谕像解》等,并加大整理《济南“五三”惨案资料汇编》《齐鲁儒学文献珍本丛刊》等有明显地域文化特色的资源,向文创产品转化^[7]。南京图书馆借助2016年世界读书日的活动契机,基于本馆珍贵典籍推出“惠风书堂”服务项目,尝试开展本馆文化创意产品展销^[8]。2016年10月,河北省图书馆携19类151种文创产品亮相“京津冀传统工艺暨文化创意产品展览展销会”,与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共同组成图书馆创意展区,以古籍文献为元素设计的产品和具有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产品深受大众喜爱^[9]。另一方面,部分省市主管部门以国家政策文本为依据,探索制定适应本地区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文创产品开发方案,如甘肃省制定《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实施意见》,并首批确定6家试点文化单位^[10];重庆市出台《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实施意见》,力争到2020年落实“三个一批”、建成“两个体系”、形成“三个机制”,完成五项重点任务^[11];江苏省印发《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做好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切实重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工作,选择一批有条件的市级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化馆、纪念馆开展试点^[12]。

2 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的SWOT分析及发展战略选择

2.1 SWOT分析法

SWOT分析法,最早是欧美国家在战略管理和规划领域广泛应用的主流分析工具,后发展为一种可用于确定组织自身的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从而将组织战略与组织内部资源、外部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的科学分析方法^[13]。

SWOT分析法的流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通过基于内外部竞争环境和竞争条件的态势分析,调查列举与研究对象密切相关的各种内部优势、劣势和外部机会、威胁,并按矩阵形式排列;二是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将各调查要素相互匹配,构造SWOT分析模型,形成SO、WO、ST和WT发展战略,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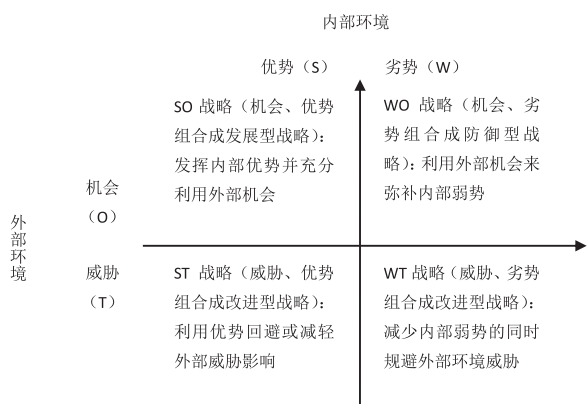


图1 SWOT 矩阵分析模型

2.2 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的SWOT分析模型

在信息社会和知识时代中,图书馆面临的内部组织机构、外部信息环境、用户信息需求、馆员信息服务等都在发生深刻变化,图书馆如何客观地面对文创产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积极地发挥自身优势,不断提升信息服务质量是值得探讨的问题。下文运用SWOT模型,分析出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的自身优、劣势及外部发展机遇与威胁(见表1),以此探讨图书馆参与开发文创产品的发展策略选择。

表1 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的SWOT分析模型

外部条件 \ 内部条件		优势	劣势
		①文献资源优势 ②空间场所优势	①现行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②人员缺少相关培训
机遇	①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重视 ②文化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③公众文化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挖掘馆藏资源,推进延伸服务。	利用外部机遇推进制度改革与人才培养
威胁	①知识产权问题 ②各种矛盾关系	基于文献资源开发文创产品要妥善处理知识产权	借鉴学习成功经验,减少内部劣势,避免外部威胁

2.2.1 优势因素分析

在当前国家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背景之下,图书馆作为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生力量,不仅能够提供类型多样、种类丰富的文献典籍资源,而且能够提供创意空间,同时还具有丰富的用户服务实践和需求分析经验。

(1) 文献资源优势

文献、典籍等资源是文创产品开发的基础和前提。图书馆作为现代社会生活中的信息中心、知识中

心、文化中心,馆藏资源内容丰富,种类繁多,不仅包括现当代的图书、期刊、报纸等文献,还涉及兼具文物价值和史料价值的刊抄、校跋、方志、家谱、插图、拓片、碑帖、写本、手稿以及少数民族文献、地方特色文献、特种文献等珍贵典籍,这为文创产品开发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如国家图书馆的“金石拓片”“敦煌遗书”“样式雷图档”“中国少数民族文字古籍”,首都图书馆的“古籍插图库”,上海图书馆的“家谱数据库”等。图书馆依托收集整理的馆藏资源,可以将文创产品开发视为馆藏文献服务的延伸,将文创产品作为宣传传统文化和塑造自身形象的有效手段,让民众在使用、体验、收藏仿制品和衍生品的过程中更深入地了解我国传统习俗和历史文化。

(2) 空间场所优势

图书馆是社会公众在生活、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公共文化设施。从20世纪末出现的信息共享空间,到现在广泛普及的学习空间、知识空间、交流空间、众创空间、创客空间,图书馆正在从传统的以阅览室为主的时代转向以学习和交流为特征的知识中心;面向未来的第三代图书馆,将会是促进创意工作者交流和互动的社交场所,是支撑和促进创新发展的最好的第三空间^[14]。图书馆作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信息、知识与空间支撑平台,在创业创新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吸引文创产品开发人员入馆,不仅能为其提供人际交流场所和产品创造空间,还能为其提供有关文化创意的灵感和氛围。

2.2.2 劣势因素分析

(1) 现行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

我国的公共图书馆是国家设置的带有公益性质的公共文化机构,属财政拨款的事业单位,经费多由国家中央或地方政府管理、资助和支持,向公众提供免费服务,基本不从事经济活动;与此同时,图书馆内部部门设置依据其特有的业务流程,有其相对固定的岗位设置、业务流程、经费管理等环节。文创产品开发涉及到产品的投资、生产、销售,本质上属商业活动,而图书馆缺少与之相适应的经济活动经验和财务管理模式。

(2) 人员缺少相关培训

自图书馆诞生以来,图书馆员的工作多与文献、信息、知识的收集、组织、加工与管理有关,日常工作

中的继续教育与培训内容也多为图书馆学、情报学、计算机、外语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业务实践。大多数图书馆员不具备设计研发、经营管理、营销推广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受文创产品开发的影响,只掌握图书情报知识和计算机、外语技能的馆员难以胜任产品开发工作。

2.2.3 机遇因素分析

(1) 国家政策支持、地方政府重视

依托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开发各类文化创意产品,对推动优秀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推陈出新、以文化人,具有重要意义。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文化产业和开发文创产品,相继制定《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4〕10号)等系列政策文件,对文化文物单位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的主要任务、支持政策和保障措施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与此同时,部分地区积极探索制定适应本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文创产品开发政策,如山东菏泽制定《菏泽市文博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试点方案》。

(2) 文化产业持续稳定发展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到2020年将文化产业发展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性产业^[15]。2016年“两会”期间,文化部部长雒树刚表示,将继续构建文化产业体系,使之占国家GDP的比重由2014年的3.76%增长到2020年的5%以上^[16]。《文化蓝皮书: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2015—2016)》认为,未来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必然下降,但会回归“常态化”稳定发展;文化产业越来越融入实体经济,两个典型特征日益凸显:前端越来越强调内容创意,后端越来越从“产品”变为“服务”^[17]。推动文化产业发展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融为一体、一脉相承的,文化产业的持续稳定发展为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提供了外在的有利条件和促进因素。

(3) 公众文化消费水平逐步提高

“中国文化消费指数(2015)”结果显示,我国文化消费综合指数由2013年的73.7增至2015年的81.2,文化消费环境、文化消费能力、文化消费水平指数等一级指标均呈上升趋势^[18]。数据表明,我国文化消费环境有了很大改善,文化产品种类不断丰富,质量

逐步提升,消费渠道也越来越多样化、便捷化,为居民进行文化消费营造了良好的氛围^[19]。随着“体验经济”的渐进发展,公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多样化和多层次化,公众对文化创意产业和产品的需求不容忽视,这在客观上要求图书馆开发馆藏资源,为用户提供丰富的文创产品。

2.2.4 威胁因素分析

(1) 知识产权问题

文化创意产业的核心内容就是创意,其本质特征体现在对创意产权的收益上^[20];文化创意产品汇集了脑力劳动者的智慧和创意,体现着设计者的思维和创新,理应受到知识产权的保护。文化创意产品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是对智力作品创作人和投资者的保护,也是对文化创意产业在中国发展前景的呵护。

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主要应重视两方面的知识产权保护:一方面,在产品的设计、开发、营销等过程中要确保不侵犯文献原作者的著作权,充分尊重原作者的版权利益;另一方面,要注意维护图书馆自身的权益,《意见》鼓励文化文物单位与社会力量开展深度合作,并允许试点单位通过知识产权作价入股等方式从事产品的开发经营,因此无论是合作开发还是授权开发文创产品,图书馆都要签订规范的条款和文件来明确各相关主体在限量复制、加盟制造、委托代理等形式中的版权和利益事宜。

(2) 各种矛盾关系

文化文物单位开发文化创意产品,旨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文明,推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但图书馆在开发文创产品过程中却要面对和处理各种矛盾关系,主要包括:①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图书馆是向公众提供免费服务的公共文化机构,而文创产品开发与营销则属经济活动。免费提供的基本服务项目与文创产品开发之间的关系需要图书馆正确面对;②教育性与商业性。文创产品能够加深文化认知、宣传图书馆形象、传播历史文化信息,同时它又是可供人们消费的文化商品,体现了馆藏资源的附属价值,文创产品的教育作用与商业价值需要图书馆妥善处理。

2.3 发展战略选择

确定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的发展战略应以结合外部机会与内部优势的SO战略为基础,同时兼顾弥补内部劣势的WO战略,此外还要谋划减少内部

劣势、避免外部威胁的ST和WT战略,达到图书馆开发文创产品的目的。图书馆参与文创产品开发战略分四步走:①建设发展战略(SO战略)。把握外部机遇,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文献资源优势 and 空间场所优势,通过挖掘馆藏资源、开展延伸服务等策略稳步推进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②管理发展战略(WO战略)。利用图书馆外部环境来弥补组织劣势,通过制度改革和人才培养等策略使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走向科学管理和发展轨道。③改进发展战略(ST、WT战略)。学习文博单位的成功经验和实践,基于读者需求和馆藏资源特色妥善处理知识产权及各种矛盾关系,克服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问题和障碍。

4 基于SWOT分析的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战略实现路径

4.1 挖掘馆藏资源,推进延伸服务

图书馆文创产品的开发需要紧紧结合馆藏文献信息资源这一要素^[21],拥有、保存着大量文化资源的图书馆应该成为创意产品开发的先驱之一,图书馆文创产品应该是基于图书馆资源开发的创意产品^[22]。

《意见》中强调了文化文物单位馆藏文化资源以及依托这些资源开发文创产品的重要价值,因此图书馆应严格按照《意见》要求,多角度、多层面、多手段地挖掘馆藏中具有艺术内涵和文化价值的特色文献资源,基于不同类型用户的文化需求,研发质量上乘的复制品、出版品、纪念品、体验品。此外,文创产品不仅是馆藏资源的一种延伸手段,更是知识推广和文化宣传的一种服务方式,它对于深入了解图书馆馆藏历史特色、增加对图书馆的认同感、宣传图书馆的教育功能、提升图书馆形象都有重要意义。开发面向各类型读者的文创产品,是对图书馆传统服务手段和形式的丰富与发展,能促进用户不同文化需求的满足;与此同时,图书馆为文创产品开发提供的场所、资源、工具,也可以算作是对图书馆现有服务的拓展和延伸。

4.2 完善制度设计,争取政策支持

在国家层面号召“双创”行动和图书馆界谋求转型变革之际,参与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对图书馆而言,既是机遇又是挑战:图书馆可以利用资源、场所、平台等优势寻求机构转型、管理变革、服务升级;同时,隐藏的制约因素在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图书馆

统的人才、资金、政策等制度设计需要进一步完善。

在人才方面,文创产品开发人员应该是既具有一定历史文化认知,又具有美学素养、艺术气质的复合型人才,这与传统的图书情报人员素质要求有较大差别,图书馆需要在人才招聘、培训、继续教育等方面的侧重点有所调整。在资金方面,图书馆作为公益类事业单位,在财务管理和资金使用方面有诸多严格要求,其经费使用多为专款专用,且目前的政策文件没有明确规定的资金筹集渠道,因此应完善图书馆文创产品研发的资金来源,积极引导、扶持、规范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文化创意产业。在政策方面,尽管目前国家发布了《意见》等文件,但公益文化事业单位从事经营活动的依据存在政策缺位,并且缺少有关企业投资、企业参与的相关配套政策,因此国家需要推动相关政策的体系化发展,使文创产品开发的主体及其职责都有法可依。

4.3 妥善处理知识产权及各种矛盾关系

版权问题和利益冲突是制约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的重要因素之一。目前,图书馆设计、开发文创产品多是基于馆藏文献资源,如经典著作、历史典籍、名人手稿等,这些文献资源由于在出版年限、法律依据、适用范围等条件上存在异同,因而其知识产权问题也错综复杂。图书馆依托馆藏资源开发文创产品,要充分尊重原作者的版权利益。一方面,对于仍在著作权法律保护时限内的资源,要与原作者或所有者进行协商签约,取得合法授权后再进行设计开发;另一方面,对于图书馆收藏的著作权人不明的“孤儿作品”,要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在“合理使用”范围内加以利用,避免对原作品版权的侵害。此外,图书馆在合作开发或授权开发文创产品时,要与合作者签订明确条款,对相关产品的品牌及设计标识加以保护。

此外,在文创产品开发中图书馆还要结合馆情妥善处理各种关系,如图书馆开发设计的文创产品应致力于图书馆教育使命的实现和图书馆用户体验的提升,因而要在教育使命与利益获取之间取得平衡,打消购买者对于图书馆以非营利性身份进行衍生商品开发的怀疑^[22];又如,图书馆针对开发设计工作,无论是新增设具体部门还是新招聘相关人才,都不应与原有部门和传统业务工作产生分歧;再如,各图书馆要依据文件规定及本馆馆情,妥善研究制定好利益分配的比例及资金使用的未来计划。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若干意见的通知[EB/OL].[2016-03-08].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3/08/content_5050721.htm.
- [2] 文化部“十三五”时期文化发展改革规划[EB/OL].[2017-02-23].http://www.gov.cn/xinwen/2017-02/23/content_5170224.htm.
- [3] 郝鑫.浅析文化创意产品的内涵和外延[J].现代交际,2012(7):126-128.
- [4] 李纪英.图书馆研发地方文献动漫摘要——创意文献意义及方略探析[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2(6):111-113.
- [5] 赵达雄.图书馆四大职能的传承与创新[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0(1):12-15.
- [6] 周缘.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N].文汇报,2016-07-10(01).
- [7] 创新理念 用好资源 山东拓宽文创产品研发途径[EB/OL].[2016-06-23].http://jinan.dzwww.com/whcyw/whyw/201606/t20160623_14512937.htm.
- [8] 赵晓红.文化创意产业与图书馆延伸服务研究[J].江苏科技信息,2016(25):12-13.
- [9] 河北省图书馆文创产品亮相沧州展会[EB/OL].[2016-10-28].<http://www.010lm.com/roll/2016/1028/4002599.html>.
- [10] 甘肃省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 首批确定6家试点文化单位[EB/OL].[2016-12-19].<http://gansu.gansudaily.com.cn/system/2016/12/19/016549521.shtml>.
- [11] 重庆出台《关于推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的实施意见》[EB/OL].[2016-12-08].http://www.cssn.cn/kgx/kgdt/201612/t20161208_3305840.shtml.
- [12] 江苏启动文化文物单位文化创意产品开发省级试点[EB/OL].[2016-12-27].<http://www.rmzxb.com.cn/c/2016-12-27/1245172.shtml>.
- [13] SWOT分析法[EB/OL].[2017-03-02].[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GcbGxL3CmY32THhP7zjQ5UupHBQjxBZRn0AfJTkbI-EYYTWd17GazKAJMP3Q8P_J1Colh7fqN_tyQgRRcTcQLYDra-70eSS110ywjATExDvjrzZPi9DP78nuNCxTdGJ6HvEJCSlGEdePe0GZW6_IUpJmEEYqRWV6aMCv5rJpS#reference-\[1\]-3892-wrap](http://baike.baidu.com/link?url=fGcbGxL3CmY32THhP7zjQ5UupHBQjxBZRn0AfJTkbI-EYYTWd17GazKAJMP3Q8P_J1Colh7fqN_tyQgRRcTcQLYDra-70eSS110ywjATExDvjrzZPi9DP78nuNCxTdGJ6HvEJCSlGEdePe0GZW6_IUpJmEEYqRWV6aMCv5rJpS#reference-[1]-3892-wrap).
- [14] 吴建中.走向第三代图书馆[J].图书馆杂志,2016(6):4-9.
- [15] 十三五规划纲要(全文)[EB/OL].[2016-03-18].http://sh.xinhuanet.com/2016-03/18/c_135200400.htm.
- [16] 文化部:2020年文化产业将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EB/OL].[2016-03-13].<http://news.163.com/16/0313/09/B11E4STJ00014SEH.html>.
- [17] 《中国文化产业报告(2015—2016)》发布[EB/OL].[2016-04-15].http://www.cssn.cn/dybg/gqdy_gqcj/201604/t20160415_2969284.shtml.
- [18] 2015中国文化消费指数发布 消费能力水平等均上升[EB/OL].[2016-11-01].http://news.china.com.cn/2015-11/01/content_36948719.htm.
- [19] 2016年中国文化产业指数发布[EB/OL].[2016-10-31].http://www.jyb.cn/Theory/whys/201610/t20161031_680111.html.
- [20] 杨金霞.文化创意产业:呼唤知识产权保护[N].民营经济报,2007-04-25(002).
- [21] 田利.图书馆文创产品开发项目的构想[J].河南图书馆学刊,2016,36(10):66-68.
- [22] 莫晓霞.图书馆文化创意产品开发探讨[J].图书馆建设,2016(10):98-101.

作者简介: 马祥涛(1988—),男,国家图书馆馆员。

收稿日期: 2017-06-15

· 探索与创新 ·

欧盟出版物和研究数据的管理及开放获取制度研究

——以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为例

翟中会 石 蕾

(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 陕西西安 710061)

摘 要: 文章以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为例,对出版物存储与开放存取、研究数据管理与开放存取进行了叙述,并分析了两者在管理制度方面的差异。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的出版物和研究数据管理与开放获取制度对我国科技项目管理工作的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 欧盟地平线2020; 研究数据; 研究出版物; 开放获取

中图分类号: G250.7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EU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Data's Management and Open Access System: Taking EU Horizon 2020 Projects as an Example

Abstract Taking the EU Horizon 2020 projects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introduces storage and open access of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open access, and then analyzes differences in their management systems. The publications and research data management and open access system of the EU Horizon 2020 projects has some reference significance to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jects management in China.

Key words Horizon 2020; research data; research publications; open access

欧盟“地平线2020”(Horizon 2020,以下简称H2020)是创新联盟(IU)系列活动之一,以公开征集、评选后注资的形式推动科研成果走向市场。H2020于2014年1月31日在英国正式启动,其包含7个板块分别为优秀科学、行业领导者、社会挑战、欧洲原子能、传播前言和扩大参与规模、科学与社会以及欧洲创新科技学院。其中,优秀科学板块旨在加强和扩大优秀科学原理的影响力,并借此打破国家间交流的屏障,提高欧盟内的研究与创新在全球的竞争力^[1]。H2020提出所有资助的出版物和研究数据开放获取,其主要目的是为了:①提高研究质量;②鼓励合作,避免重复(更加高效);③加快创新(更开放的市场进步意味着更快的增长);④提高科学过程的透明性。本文考察了欧洲研究委员会(European Research Council,简称ERC)对研究出版物和研究数据的管理和开放获取制度(见图1),并从政策范围、

政策规定、提供支持3个方面对比分析了欧盟最为重要的10个研究委员会制定的政策及提供的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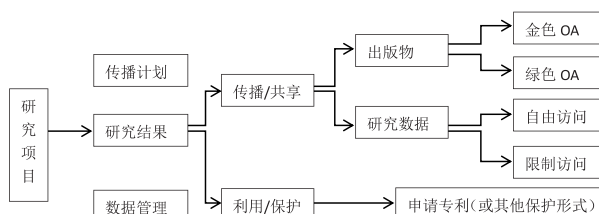


图1 欧洲研究委员会开放获取模式图

1 出版物存储和开放获取概述

1.1 出版物存储和开放获取要求

H2020规定ERC资助的研究课题,课题团队必须保证所有与课题研究相关的同行评审的科学出版物开放获取。其中资助条款29.2设置了详细的开放获取法律要求,每个受资助项目必须采用知识库使课题的

同行评审科学出版物开放获取, 这些出版物包括期刊论文、会议论文、专著等。同时对出版物的版本作了一定的要求, 即必须提供已出版的版本或者出版物接受后的同行评审版本(后印本)。此外, 还必须保证这些出版物允许任何用户免费在线阅读、下载和打印。ERC鼓励受资助者提供更多的出版物使用权利, 如复制、分发、搜索、链接、爬取和挖掘等。

1.2 出版物开放获取步骤

首先, 在知识库中储存出版物。要求受资助课题在一个合适的知识库存储出版物的电子复本。ERC推荐使用学科知识库存储出版物: 生命科学推荐使用欧洲PubMed中心, 物理科学推荐使用arXiv, 专著、书的章节使用OAPEN Library, 如果没有合适的学科知识库, 研究者可使用机构知识库或集中式知识库, 如Zenodo、ResearchGate和Academia等。电子版必须是机器可读的版本, 如文本文档或其他标准化的格式, 其他用户能够开发新的工具处理这些文档, 不能提交印刷版的扫描版本。无论采取哪种开放获取模型, 必须在出版后尽快地存储电子版。存储出版物的同时, 也鼓励在数据知识库中存储出版物中验证结果的研究数据。

其次, 选择开放获取路线。可以选择绿色OA或金色OA。绿色OA指自存档, 作者将出版物的最终版本或同行评审后的草稿存储在知识库中, 一些出版社要求一定的延迟后开放获取; 金色OA也叫出版开放获取, 出版物在出版后立即开放获取, 金色OA花费来源于ERC资助费用。

最后, 提供存储出版物的开放获取。受资助者必须保证出版物的存储版本通过知识库开放获取。开放获取应该尽可能地快速, 最多不超过出版后6个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多延迟至出版后12个月。对于金色OA的出版物, 必须在出版后立即提供开放存取。对于课题结束后的出版物, 如果受资助者不能在最大延迟期提供开放获取, 而且没有产生额外的金色OA费用, 可以采用延迟期更长的绿色OA。为了保证存储出版物的发现, 也必须保证出版物的书目元数据开放获取。元数据必须包括一个持久的标识, 如DOI。

2 研究数据管理和开放获取概述

2.1 研究数据管理和开放获取要求

H2020定义的研究数据包括统计资料、实验结果、测量值、实地观测结果、调查结果、采访录音和图像。受资助者必须在数据知识库中存储研究数据, 其他人员能够通过知识库访问、挖掘、利用、复制和传播科研数据。ERC于2016年的资助协议建议资助项目参与研究数据开放获取, 而2017年的新版资助协议明确规定资助项目必须参与研究数据开放获取。

2.2 制定数据管理计划

数据管理计划(DMP)是数据管理的关键要素。DMP描述了数据收集、处理等数据管理生命周期。H2020要求所有的资助项目在项目开始时必须制定详细的DMP, 内容包括项目将产生和处理哪些数据集, 这些数据怎样获取, 怎么储存、保存和管理, 敏感数据的保护等。除了上述内容外还必须保证数据发现、获取、互操作、重用和数据安全5项内容。如果某些数据集不提供访问, 应该说明具体原因(如数据开放获取将危及项目的目标等)。另外, H2020规定一旦项目受到资助并且开始执行, 必须在6个月内提交第一版DMP, 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如果出现新的数据、政策改变(如决定申请专利)等情况, 必须及时更新DMP。

2.3 研究数据开放获取步骤

首先, 在机构库中储存科学出版物证实结果的研究数据和相关元数据, 也包括其他数据(如不直接归属于出版物的数据或原始数据)。其次, 必须采取措施保障第三方访问、挖掘、利用、复制和传播这些研究数据。一些专业软件、软件代码、算法和分析方案, 在可能的情况下也应公开。

2.4 制定数据管理原则

数据密集型科学一个最大的挑战是帮助人们发现、获取、整合和分析研究数据以及相关的算法和工作流^[2]。管理研究数据以及研究数据发现、访问、互操作和重用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知识发现和创新以及后续的数据知识整合和重用。ERC进行的开放研究数据计划就是为了提高H2020项目产生的研究数据的访问和重用, 为此制定了促使研究数据可发现(Findable)、可访问(Accessible)、互操作(Interoperable)和重用(Re-usable)的数据管理原则, 简称FAIR数据原则。表1列出了FAIR的各项要求, 其中包含了研究数据的FAIR要求, 以及研究数据元数据的FAIR要求。在25条原则中, 元数据占13条, 研

究数据占12条,说明在研究数据管理过程中,研究数据和元数据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由于研究数据有实验数据、观测数据等不同种类,所以指南没有具体规范数据标准,只是列出了各项应该满足的规范。A1条款指出了通讯协议规范,进一步通过A1.1和A1.2对协议要求进行了详细说明。R3指的是研究数据必须和研究出版物关联,既能够通过出版物链接到研究数据,同时也能通过研究数据链接到出版物。

表1 FAIR数据原则的各项要求

目的	要求
可发现 (Findable)	F1 (元)数据分配一个全球唯一、永久持续的标识符 F2 采用丰富的元数据描述数据 F3 (元)数据在可检索资源中注册或索引 F4 元数据指定数据标识符
可访问 (Accessible)	A1 通过标准通讯协议标识能够检索到数据 A1.1 协议是开放、免费,能够普遍实现 A1.2 协议能够身份认证和授权 A2 即使数据不再可用,也能够访问到元数据
互操作 (Interoperable)	I1 (元)数据采用正式、可访问、可共享的知识表示语言 I2 (元)数据使用符合FAIR原则的词汇 I3 (元)数据包括其他数据的引用
重用 (Re-usable)	R1 (元)数据具有多个准确和相关属性 R2 (元)清晰并可访问的数据使用许可 R3 (元)数据与其来源相关联 R4 (元)数据满足领域相关的社区标准

注:(元)数据表示同时适用于元数据和数据。

2.5 支持FAIR数据原则的数据知识库

FAIR数据原则仅仅提供了高层次的实施指导原则,没有任何技术细节、标准和解决方案。原则本身不是一个标准或说明书,仅仅为数据出版商和数据管理者提供具体实现指南。许多知识库通过不同的技术实现了FAIR数据原则^[3],下面列出了几个主要实现FAIR原则的知识库以及其实现方法(见表2)。

3 出版物和研究数据管理与开放获取制度的差异

不同于出版物的强制开放获取,ERC不强制资助项目必须公开所有研究数据,原则为“根据情况尽可能公开”,推荐资助的研究课题保留全部研究数据,并在版权限制、保密和合约条款允许下,和其他研究

表2 数据知识库实现FAIR数据原则的方法

数据知识库名称	FAIR原则的实现方法
Dataverse	Dataverse 为每条数据集产生一个正式的引用,当数据集发布时公开(F),提供元数据、数据文件、数据集条款、许可和版本信息都被索引(F、A和R),存储元数据、数据文件的补充文件、文档或代码(R)。元数据必须公开,即使数据限制访问或移除(F、A)。元数据从3个层次广泛支持互操作和重用:①数据引用元数据,映射到DataCite模式或都柏林核心术语;②特定领域元数据,映射到专业领域内使用的标准元数据;③文件水平元数据,广泛应用于表格数据文件。Dataverse 提供机器搜索数据、访问元数据和下载数据文件的公开接口,在数据文件受限时使用令牌授予访问权限(A)。
FAIRDOM	整合了SEEK和openBIS平台,研究数据通过唯一持久的HTTP URLs标识,也可以注册DOI(F),可以访问数据的多种格式如RDF、XML等(I)。采用社区标准格式的元数据和本体(I)。RDF格式元数据能够下载和重用(R)。
Open PHACTS	提供多种数据表示格式,提供人阅读的HTML格式和机器可读的RDF、JSON、XML、CSV等格式(A),允许多个URLs访问一个实体数据集(F、A、I),采用VoID标准(R、I)。所有的接口特性遵循关联数据API说明的RDF描述(A),数据集采用社区约定的本体描述(I)。
wwPDB	主要存储蛋白质和核苷酸的3D结构数据,所有数据存储在FTP服务器,数据格式采用txt和XML格式(A),采用化学和生物领域元数据标准(R),提供各种软件工具解释wwPDB数据和元数据(I、R)。每个数据集采用DOI标识(F、A),能够通过wwPDB的附属网站搜索数据和元数据(F)。

注:F表示可发现,A表示可访问,I表示互操作,R表示重用。

人员共享这些数据。受资助项目可以在任何时期退出研究数据开放获取计划(如申请阶段、资助协议准备期、签署资助协议后),相应的条款也会从资助协议中删除。无论是出版物还是研究数据,其开放获取的相关花费都符合H2020资助协议。

AHRC(人文研究委员会)、BBSRC(生物技术和生物科学委员会)、EPSRC(英国工程与自然科学研究理事会)、ESRC(英国国家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MRC(医学研究委员会)、NERC(北美电力

可靠性委员会)、STFC(技术设备委员会)、Cancer Research(癌症研究)、European Commission(欧洲委员会)、Wellcome Trust(惠康基金会)是欧盟组织最重要的研究资助委员会。表3从3个大方面、11个小方面对比分析了其对出版物和研究数据管理制度的差异。

表3 不同基金资助的出版物和研究数据管理制度差异

基金名称	政策范围		政策规定					提供支持			
	出版物	数据	时间限	数据计划	访问/共享	长期管理	监控	指南	知识库	数据中心	费用
AHRC	F	F	F	F	F	P	N	F	N	P	P
BBSRC	F	F	F	F	F	F	F	F	F	P	F
EPSRC	F	F	F	P	F	F	F	P	N	N	F
ESRC	F	F	F	F	F	F	F	F	F	F	P
MRC	F	F	F	F	F	F	N	P	F	N	P
NERC	F	F	F	F	F	F	F	F	F	F	P
STFC	F	F	F	F	F	F	F	P	F	P	P
Cancer Research	F	F	F	F	F	F	F	P	F	N	F
European Commission	F	F	P	F	P	P	P	F	F	P	F
Wellcome Trust	F	F	F	F	F	F	P	F	F	F	F

注: F表示全部覆盖 H2020 规定; P表示部分覆盖 H2020 规定; N表示没有涉及该方面内容。

4 启示

出版物、研究数据的管理及开放获取需要基金资助机构、出版社、图书馆等单位的大力合作,才能真正实现出版物的绿色开放,研究数据的可访问、可重用。目前国内对出版物开放获取认识和研究有较大的提高,但对研究数据管理和开放获取还处在起步阶段。相对于国外科研资助机构对研究数据管理和开放获取的要求,我国无论是国家级还是省级的资助机

构,还没有制定相应的制度,应该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提高我国出版物、研究数据的开放获取。

首先,对于出版物的开放获取,欧盟11个主要的资助机构都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并提供开放获取的支持。国内中国科学院也在这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一方面试验推进中国科学院学术论文的开放出版;另一方面率先启动中国科学院学术论文从出版社向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的自动推送服务。英国物理学会出版社(IOPP)在2015年已经同意支持将中国科学院作者在其期刊上发表的论文自动推送至中国科学院机构知识库,并于论文发表后的12个月后开放获取^[4]。我国基金资助机构不但要制定出版物的开放获取,而且还要提供相应的支持,如提供学科库或机构库。同时在基金支持方面,也要支持开放获取,如明确将论文处理费用(APC)纳入资助范围。

其次,DMP是实现数据管理非常重要的因素,因此国内资助项目必须制定详细的DMP,注意以下几个问题:项目将产生哪些类型和格式的数据,是否将重用存在的数据,数据的来源是什么,预期的数据大小,谁可能用这些数据,应用什么样的标准,数据怎样被利用、共享、重用,怎样管理和保存数据等。

最后,数据管理不是最终目的,而是支持知识发现和创新的首要条件。e-science要求数据被发现、访问、互操作和重用。在数据管理过程中,不仅要重视数据本身,更要重视元数据,有了规范的元数据才能提供良好的数据发现和访问。对于数据的开放获取,首先要厘清哪些数据可以开放获取,清晰分开法律、合约原因和自愿限制。对于受到多个资助的项目,数据开放获取应符合所有资助条款,总之在可能的条件下,应尽可能开放研究数据。

参考文献:

- [1] 韩纓.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相关知识产权规则与开放获取政策研究[J].知识产权,2015(3):92-96.
- [2] 崔宇红.E-Science环境中研究图书馆的新角色:科学数据管理[J].图书馆杂志,2012(10):20-23.
- [3] 覃丹.英美社会科学数据管理与共享服务平台调查分析[J].图书情报工作,2014(16):67-75.
- [4] 张闪闪,顾立平,盖晓良.国外信息服务机构的数据管理政策调研与分析[J].图书情报知识,2015(5):99-109.

作者简介:翟中会(1974—),男,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石蕾(1965—),女,西安交通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

收稿日期:2017-11-13

· 探索与创新 ·

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内涵及评价体系探析*

周 兵

(江苏理工学院计算机学院 江苏常州 213001)

摘 要: 大数据背景下,对高校教师的数据素养水平的合理测评是教育大数据战略的实施和成果评价的重要内容之一。文章分析了数据素养内涵,揭示出高校教师数据素养教育应着重培养的5个方面的能力,在此基础上,设计了一种数据素养评价数学模型,并给出具体案例。分析结果表明,该模型能有效评测出教师的数据素养水平,从而推动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科学测评研究。

关键词: 大数据;高校教师;数据素养;评价体系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of University Teachers' Data Literacy in Big Data Era

Abstract Under big data background, how to reasonably evaluate data literacy level of university teachers is one of important contents of the implementation and achievement assessment of education big data strategy. Firstl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connotation of data literacy combined the characteristic of big data, and reveals five aspects that should be focused on in the data literacy education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On this basis, a mathematical model of data literacy evaluation is designed and a specific case is given. The analysis result shows that the proposed model can evaluate effectively data literacy level of university teachers and promote the scientific evaluation of university teachers' data literacy in big data era.

Key words big data; university teacher; data literacy; evaluation system

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是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重要举措。在教育大数据应用领域,高校教师作为大数据应用的践行者和骨干力量,其自身的数据素养教育及测评成为教育大数据在高校落地首先面临的课题。近年来,基于有限体量的数据资源,开展的针对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理论探讨,数据素养的内涵分析以及提高教师数据素养水平的实践研究,学界已经积累了一些研究成果^[1-3],然而在大数据背景下,如何密切结合大数据的特征,探索海量数据资源环境中数据素养的内涵,以及在此基础上开展数据素养测评研究,对于保障大数据素养的有效评价,并促进高

校教师大数据素养目标的顺利达成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4-7]。目前学界的相关研究还比较零散,并缺乏系统化的评测方案。本文以大数据时代教育变革为背景,探索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内涵及评价体系等问题。

1 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内涵

1.1 数据素养的概念

国外学界将数据素养称为数据信息素养(Data information Literacy, DIL)。David Herzog^[8]认为DIL

* 本文系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6年立项课题“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适应技术变革的策略研究——基于图情领域的数字素养理论”(项目编号:D/2016/01/38)的研究成果之一。

过程包括数据获取、评估、分析及可视化; Adam Beauchamp^[9]则将DIL简述为阐释、评价和传播信息的能力; Jacob Carlson^[5]认为数据素养教育应涵盖以下能力: 数据采集、转换、重用、分析和可视化能力, 并应注意数据伦理规范; Tibor Koltay^[10]认为数据素养是关于获取数据并能进行批判式的评价和利用的能力; Qin Jian^[4]强调数据素养教育过程中需要提升对科学数据的理解、利用和管理等能力。国内方面, 黄如花等^[11]深入分析英美等国的研究现状后认为, 数据素养应包括数据意识、数据能力和数据伦理3方面内容; 孟祥保^[1]讨论了科学数据素养 (Science Data Literacy) 的3个层次, 即具有数据意识, 具备数据知识与技能, 了解数据管理政策法规、数据伦理。

1.2 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内涵

大数据时代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内涵是指教师在数据的采集、组织和管理、处理和分析、共享与协同创新方面的能力, 以及教师在数据的生产、管理和发布过程中的道德与行为规范。教师通过个体或团体的方式收集学生的考试成绩、学习行为及其他数据, 以丰富其使用数据的知识和技巧, 并为学校和学生的发展开发基于数据的策略。数据素养不仅强调组织、解释、整合和分析等技能, 而且注重评估知识、统计知识等。数据素养是准确观察、分析和处理不断变化的各种数据, 有效使用数据并促进决策的能力。教育者可以将数据转换为信息, 并最终转化为指导行动的知识, 持续促进教与学。在大数据时代, 高校教师 (包括科研人员) 在数据素养方面, 应该具备数据意识、数据定位与采集、数据分析与解读、数据反思与决策、数据伦理道德等能力。

2 高校教师数据素养评价体系的建立

完整的评价体系应当包含评价主客体、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3个方面。

2.1 评价主客体的确定

从事专业教学的教师是我们进行评价的客体, 评价的主体则包含学生、同事、同行专家、教学督导人员、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和学校领导等。学生在课堂或课后从任课教师那里获取专业知识或相关信息知识。教师的数据素养直接关系到学生的信息素养, 所以说学生是最直接、最主要的评价主体。某专业教师

的同行及大数据信息技术专家则是最重要的评价主体, 同行专家能从教师的信息行为表现来评价某一教师的数据素养高低。另外, 学校聘请的离退休人员和在职老教师组成的督导团队, 以及教学行政管理人员、学校领导都应当参与对本校教师数据素养的评价。

2.2 评价指标的建立

评价指标是对评价目标中定性的部分进行量化、细化, 把抽象的、原则性的评价目标具体化、行为化和可操作化。高校教师的数据素养评价指标主要包括: 数据意识、数据知识、数据道德、数据能力和数据评价。在这套评价体系中, 重点体现了对教师数据素养全面的、综合的评价, 重视对教师获取及创造性地综合利用大数据的能力方面的评价。

2.3 评价方法的设计

考虑到高校教师数据素养的评价指标没有明确的外延边界, 具有很大的“模糊性”, 故用模糊综合评价法来建立评价模型。

2.3.1 建立模糊集合

(1) 评价对象集合 $X\{x_1 \ x_2 \ \dots \ x_k\}$, 该集合指的是所有接受评价的教师, 集合中每一个元素代表不同的教师。

(2) 评价指标集合 $V\{V_1 \ V_2 \ \dots \ V_m\}$, 该集合指的是不同的评价指标, 每一个指标均为一级指标, 每一个一级指标又包含若干个二级指标, 因此还需要建立二级评价指标的集合 $V_i\{v_{i1} \ v_{i2} \ \dots \ v_{ik}\}$ 。

(3) 评价权重系数集合 $A\{A_1 \ A_2 \ \dots \ A_m\}$, 评价权重集合中的元素与一级评价指标集合中的元素是一一对应的, 它反映了每一个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系数。同理, 我们还需要建立二级指标权重系数集合。

(4) 评价等级集合 $U\{u_1 \ u_2 \ \dots \ u_n\}$, 该集合中每个元素指的是不同的评价等级^[12]。

2.3.2 建立模糊综合评价模型

评价指标与评价等级之间存在着模糊关系, 我们用 R 表示此模糊关系, 将其表示为模糊矩阵如下:

$$R = \begin{matrix} & \begin{matrix} u_1 & u_2 & \dots & u_n \end{matrix} \\ \begin{matrix} V_1 \\ V_2 \\ \vdots \\ V_m \end{matrix} & \begin{bmatrix} r_{11} & r_{12} & \dots & r_{1n} \\ r_{21} & r_{22} & \dots & r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r_{m1} & r_{m2} & \dots & r_{mn} \end{bmatrix} \end{matrix} = (r_{ij})_{m \times n} \quad (1)$$

矩阵中的 r_{ij} 表示 V_i 对第 j 个等级的隶属度, 它依赖于一级评价指标 V_i 所包含的各个二级指标对各等级的隶属度及各二级指标对此一级指标的权重。设 V_i 所

包含的第P个二级指标对第q个等级的隶属度为 S_{pq}^i ($P=1, 2, \dots, k, q=1, 2, \dots, n$), 第P个二级指标对该一级指标的权重为 W_p^i 。于是可以确定模糊矩阵为:

$$[r_{11}, r_{12}, \dots, r_{1n}] = [w_1^i, w_2^i, \dots, w_k^i] \begin{bmatrix} S_{11}^i & S_{12}^i & \dots & S_{1n}^i \\ S_{21}^i & S_{22}^i & \dots & S_{2n}^i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S_{k1}^i & S_{k2}^i & \dots & S_{kn}^i \end{bmatrix} \quad (2)$$

通过对此矩阵进行m次运算可以得出R矩阵。

设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 $A = \{A_1, A_2, \dots, A_m\}$ 。通过已经计算出的R矩阵和给定的一级评价指标的权重A可以计算出综合评价结果。综合评价结果为:

$$B = AR = (b_1, b_2, \dots, b_n) \quad (3)$$

令 $b_k = \max(b_1, b_2, \dots, b_n)$, 则评价等级集合中的第k个元素为此教师的最终评价结果^[13]。

3 高校教师数据素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的应用案例

3.1 指标体系构成

在综合国内外文献对数据素养内涵、组成能力的阐述的基础上, 笔者从数据意识、数据获取能力、数据道德、数据处理与分析能力及数据评价能力等几个维度构建了高校教师数据素养能力评价指标集合, 如表1所示。

3.2 案例分析

根据上述构建的指标体系, 设10个评价者对某教师进行评价, 将评价等级分为5等, 分别对应于优秀、良好、中等、及格、不及格。假设对B11指标, 认为是优秀的有4人, 良好的有1人, 中等、及格、不及格的分别是4人、1人、0人, 于是认为该二级指标分别属于这5个等级的隶属度为4/10、1/10、4/10、1/10、0/10。然后依次对B12、B13、B14、B15、B16进行统计, 分别得出这几个二级指标的隶属度, 于是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结果:

$$[r_{11}, r_{12}, r_{13}, r_{14}, r_{15}] = [0.2 \quad 0.1 \quad 0.3 \quad 0.2 \quad 0.1 \quad 0.1] \begin{bmatrix} \frac{4}{10} & \frac{1}{10} & \frac{4}{10} & \frac{1}{10} & \frac{0}{10} \\ \frac{3}{10} & \frac{2}{10} & \frac{4}{10} & \frac{1}{10} & \frac{0}{10} \\ \frac{2}{10} & \frac{3}{10} & \frac{4}{10} & \frac{1}{10} & \frac{0}{10} \\ \frac{3}{10} & \frac{1}{10} & \frac{1}{10} & \frac{1}{10} & \frac{0}{10} \\ \frac{1}{10} & \frac{3}{10} & \frac{4}{10} & \frac{2}{10} & \frac{1}{10} \\ \frac{3}{10} & \frac{3}{10} & \frac{2}{10} & \frac{2}{10} & \frac{1}{10} \end{bmatrix}$$

$$=[0.24 \quad 0.26 \quad 0.32 \quad 0.12 \quad 0.02]$$

由于我们设了优秀、良好、中等、及格和不及格5个等级, 并且设了5个一级指标, 因此R矩阵是一个

表1 高校教师数据素养能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代码	指标内容	权重系数	指标内容	权重系数
A1	数据意识	0.3	B11 能认识数据是科研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0.2
			B12 能够认识到科学数据具有生命周期。	0.1
			B13 能够以严谨认真的态度对待与使用科研过程中产生的数据。	0.3
			B14 能够对论文中使用的数据负责。	0.2
			B15 能够保证数据的公正性与开放性。	0.1
			B16 能辩证认识数据在信息统计分析、处理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0.1
A2	数据获取	0.2	B21 能够熟练获取各类数据, 了解数据源如获取途径或数据库等。	0.3
			B22 具有检索与收集各种数据的能力。	0.3
			B23 能够对获取的各种形式的的数据(格式、类型、特点)作准确解读。	0.4
A3	数据道德	0.2	B31 了解数据采集、使用、分享中所涉及的道德和伦理问题。	0.4
			B32 能够尊重他人的数据, 使用时能够注明出处。	0.3
			B33 对数据安全常识有所了解, 并能积极维护数据安全。	0.3
A4	数据处理与分析	0.2	B41 能够利用软件处理与分析原始数据并利用统计分析软件如SPSS对获取的数据作恰当的统计分析。	0.2
			B42 能够结合文献与实际对统计分析结果作准确的解释。	0.2
			B43 能够正确运用统计量描述数据, 如平均值、标准偏差等。基于数据统计量准确表述结果并作出正确决策。	0.2
			B44 能够恰当采用统计图如柱状图、散点图等来表征并揭示数据中隐含的趋势、变化等。	0.3
			B45 能够利用数据统计量及数据的统计分析结果来支撑论点, 并撰写论文、报告。	0.1
A5	数据评价	0.1	B51 能够审核数据的准确性, 批判性地评价数据, 结合实际质疑数据, 善于结合具体情况分析数据。	1.0

(5×5)方阵。通过上面的计算, 我们得出了R矩阵的第一行(也就是第一个一级指标各元素的隶属度), 利用同样的方法, 我们可以得出R矩阵的其余四行。

$$[r_{21}, r_{22}, r_{23}, r_{24}, r_{25}] = [0.3 \quad 0.3 \quad 0.4] \begin{bmatrix} \frac{2}{10} & \frac{2}{10} & \frac{5}{10} & \frac{1}{10} & \frac{0}{10} \\ \frac{4}{10} & \frac{4}{10} & \frac{2}{10} & \frac{0}{10} & \frac{0}{10} \\ \frac{1}{10} & \frac{2}{10} & \frac{5}{10} & \frac{2}{10} & \frac{0}{10} \end{bmatrix}$$

$$=[0.22 \quad 0.26 \quad 0.41 \quad 0.11 \quad 0]$$

$$[r_{31}, r_{32}, r_{33}, r_{34}, r_{35}] = [0.4 \quad 0.3 \quad 0.3] \begin{bmatrix} \frac{1}{10} & \frac{2}{10} & \frac{3}{10} & \frac{4}{10} & \frac{1}{10} \\ \frac{3}{10} & \frac{3}{10} & \frac{3}{10} & \frac{1}{10} & \frac{0}{10} \\ \frac{1}{10} & \frac{2}{10} & \frac{5}{10} & \frac{2}{10} & \frac{0}{10} \end{bmatrix}$$

$$=[0.16 \quad 0.23 \quad 0.36 \quad 0.25 \quad 0.04]$$

$$[r_{41} \ r_{42} \ r_{43} \ r_{44} \ r_{45}] = [0.2 \ 0.2 \ 0.2 \ 0.3 \ 0.1] \begin{bmatrix} \frac{3}{10} & \frac{3}{10} & \frac{4}{10} & \frac{4}{10} & \frac{4}{10} \\ \frac{3}{10} & \frac{3}{10} & \frac{3}{10} & \frac{1}{10} & \frac{1}{10} \\ \frac{4}{10} & \frac{2}{10} & \frac{4}{10} & \frac{4}{10} & \frac{4}{10} \\ \frac{3}{10} & \frac{2}{10} & \frac{4}{10} & \frac{1}{10} & \frac{1}{10} \\ \frac{3}{10} & \frac{3}{10} & \frac{4}{10} & \frac{1}{10} & \frac{1}{10} \end{bmatrix}$$

$$= [0.32 \ 0.25 \ 0.38 \ 0.05 \ 0]$$

$$[r_{51} \ r_{52} \ r_{53} \ r_{54} \ r_{55}] = [1.0] \begin{bmatrix} \frac{2}{10} & \frac{4}{10} & \frac{3}{10} & \frac{1}{10} & \frac{0}{10} \end{bmatrix} = [0.2 \ 0.4 \ 0.3 \ 0.1 \ 0]$$

通过以上计算,我们就得出了R矩阵(一级指标隶属度的模糊矩阵)。

$$R = \begin{bmatrix} 0.24 & 0.26 & 0.32 & 0.12 & 0.02 \\ 0.22 & 0.26 & 0.41 & 0.11 & 0.00 \\ 0.16 & 0.23 & 0.36 & 0.25 & 0.04 \\ 0.32 & 0.25 & 0.38 & 0.05 & 0 \\ 0.20 & 0.40 & 0.30 & 0.10 & 0 \end{bmatrix}$$

由此,我们可以得到测量的结果:

$$B = [0.3 \ 0.2 \ 0.2 \ 0.2 \ 0.1] \begin{bmatrix} 0.24 & 0.26 & 0.32 & 0.12 & 0.02 \\ 0.22 & 0.26 & 0.41 & 0.11 & 0.00 \\ 0.16 & 0.23 & 0.36 & 0.25 & 0.04 \\ 0.32 & 0.25 & 0.38 & 0.05 & 0 \\ 0.20 & 0.40 & 0.30 & 0.10 & 0 \end{bmatrix}$$

$$= [0.232 \ 0.266 \ 0.356 \ 0.128 \ 0.014]$$

由于在B集合中第3个元素的值最大,所以该教师数据素养的评价结果为第三个等级,即中等。

4 结语

对高校教师数据素养进行评价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切实提高教师的数据素养,达到数据化教学。高校教师数据素养评价的发展方向不是仅仅采用一些评价方法得出教师的数据素养水平,而是通过评价使教师的认知得到发展,使其看待问题的方法得到改进,解决问题的能力得到不断提高。虽然相关学者都强调了数据素养评价的重要意义,但是对于如何通过评价促进教师数据素养的提高还处于探讨阶段,而真正比较完善的高校教师数据素养评价系统还有待于探索挖掘。

参考文献:

- [1] 孟祥保,李爱国.国外高校图书馆科学数据素养教育研究[J].大学图书馆学报,2014(3):11-16.
- [2] Session 74—Information Literacy with Reference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EB/OL].[2017-04-21].<http://www.ifla.org/node/6271>.
- [3] 缪其浩.大数据时代:趋势和对策[J].科学,2013,65(4):25-28.
- [4] QIN JIAN,D'IGNAZIO J.Lessons Learned from A Two—year Experience Inscience Data Literacy Education[EB/OL].[2017-04-21].<http://docs.lib.purdue.edu/iatul2010/conf/day2/5>.
- [5] CARLSON J,FOSMIRE M,Miller C C,et al.Determining Data Information Literacy Needs:A Study of Students and Research Faculty[J].Portal Libraries and the Academy,2011,11(2):629-657.
- [6] 张静波.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素养教育[J].科学,2013,65(4):29-32.
- [7] 李芸.浅论大数据时代的数据素养培养策略[J].电脑知识与技术,2013,9(36):8199-8200.
- [8] HERZOG D.Data Literacy:A User's Guide[M].Missouri:SAGE Publications,2015:224.
- [9] ADAM BEAUCHAMP. What is Data Literacy? [EB/OL].[2017-04-10].<http://databrarians.org/2015/02/what-is-data-literacy/>.
- [10] KOLTAY T. Big Data,Big Literacies?[EB/OL].[2017-04-10].http://citaliste.rs/casopis/br24/koltay_tibor.pdf.
- [11] 黄如花,李白杨.数据素养教育:大数据时代信息素养教育的拓展[J].图书情报知识,2016(1):21-29.
- [12] 杨纶标,高英仪.模糊数学及应用[M].广州: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2001:143-144.
- [13] 彭祖赠,孙韞玉.模糊(Fuzzy)数学及其应用[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2:52-142.

作者简介: 周兵(1968—),女,江苏理工学院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信息管理系统与数据挖掘。

收稿日期: 2017-06-13

· 阅读文化 ·

公共图书馆构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策略研究

——基于深圳“In Library”与北京特色阅读空间的比较分析

刘 艳

(江西省图书馆 江西南昌 330000)

摘 要: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章围绕深圳青番茄“In Library”与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两大案例,简述其发展历程,并通过比较分析,指出两者在基本属性、空间模式和现实意义3方面具有相同点,以及合作对象与建筑主体、服务内容与运营方式方面存在不同。最后从延伸空间、虚拟空间、建筑空间角度提出公共图书馆构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策略。

关键词: In Library; 特色阅读空间; 公共图书馆; 跨界合作; 城市公共阅读空间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of Public Library: Comparative Analysis Based on Shenzhen "In Library" and Beijing Characteristic Reading Space

Abstract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is an indispensable part of public cultural service system. The paper focuses on the case of Shenzhen Green Tomato "In Library" plan and Beijing Xicheng District characteristic reading space. It briefly introduces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and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it points out that the two libraries have similarities in basic attributes, spatial patterns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Meanwhile, differences exist in cooperative partner, main body of building, service content and operation mode. Finall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e strate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of public libra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xtension of space, virtual space and architectural space.

Key words In Library; characteristic reading space; public library; cross border cooperation; urban public reading space

1 引言

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和转型》一书中提到:“在现代社会,咖啡馆、图书馆、书店等是公民自由讨论公共问题的公共领域与公共空间”^[1]。公共图书馆的建立是现代公共阅读空间形成的一个重要标志^[2]。从我国图书馆发展史来看,我国公共图书馆的雏形是藏书楼,无论是官方藏书还是私人藏书,在古代藏书楼只为特定阶层服务,普通大众很难接触到藏书楼。19世纪末,随着西方列强的全球

扩张,新思想、新思潮突破国别限制,西方图书馆学传入我国。20世纪20年代,公共图书馆在全国得以广泛建立,普通大众终于拥有了公共阅读空间。21世纪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也对公共图书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公共图书馆公共阅读空间已经不能满足现代读者的需求。近年来,一种适应小康社会生活水平、形态新颖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在我国横空出世,并呈现迅猛发展态势^[3]。例如,北京西城区打造的特色阅读空间、深圳青番茄文化传播公司的

“In Library”、深圳罗湖区图书馆的“YOU图书馆”、南京的“24小时二楼南书房”、张家港的“图书馆驿站”、江阴的“三味书咖”以及温州的“城市书房”等^[3]。这类新型城市阅读空间,虽然名称各异、内容不尽相同,但是具有公共阅读空间公益性、开放性的共同特征,在时空上延伸了一座城市的公共图书馆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 案例概述

2.1 青番茄“In Library”概述

深圳青番茄文化传播公司(以下简称“青番茄”)是“In Library”的创始者。青番茄在2010年建立了第一家“线上+实体书店”形式的图书馆,将具有物理空间的图书馆移步到线上,自建图书配送物流,读者只需缴纳110元押金,便可以免费享受图书配送到家的图书借阅服务,如不想再续借,则110元押金全部退还。青番茄从创办之初到2012年,覆盖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西安、成都等27个城市,覆盖人群超过100万人,书籍种类超过40万种。但随着读者群体的持续壮大,青番茄因为成本问题难以为继,取消了网上借阅模式的图书服务。2013年,青番茄为摆脱中文网上实体书店的经营困境,选择与城市中一些知名咖啡馆、品牌咖啡馆、连锁咖啡馆合作,把网上书店模式移至线下,共同建立城市小型图书馆。以“In library”为共有标识,联动全国的咖啡馆一起创建具有人文阅读功能的图书馆——支持读者免费借阅,并在全中国咖啡图书馆进行通借通还。截止2013年底,已在全国创建近600家咖啡图书馆。合作的咖啡馆挂上“In Library”(内有图书馆)的视觉标识牌,表示该咖啡馆内有图书馆,可以提供书刊借阅等服务,也可以进行小团体、小范围的读书活动,由此“In Library”是一个主要标识,也是一个阅读空间符号^[4]。

2014年底,青番茄发布了第一款能够实现纸质版图书借阅的手机APP应用——In Library,其分为管理端口和用户端口两种形式。管理端口是有意向合作的咖啡馆通过注册提出申请,由青番茄对申请单位进行场地及其他条件的综合评定,通过之后即可称为“In Library”咖啡图书馆。“In Library”咖啡图书馆的图书均由青番茄统一采购,图书数量为200~500册,图书3个月免费更换一次,图书配送物流由青番茄的自建物

流承担。青番茄官网上有每个“In Library”咖啡馆门店的独立页面,展示咖啡馆环境及其藏书,图书借还工作由合作咖啡馆负责。用户端口供注册用户使用。

“In Library”APP能够基于GPS定位技术感知读者位置,并为其推荐距离最近的“In Library”咖啡图书馆,各个“In Library”咖啡图书馆之间也可以实行通借通还,服务覆盖逐渐呈现网状化态势。

青番茄与城市咖啡馆合作创建的“In Library”咖啡图书馆是其挖掘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第一步。2014年底,青番茄创始人张丽娟提出“汽车图书馆新动力”这一设想,指出图书馆的跨界合作,描绘了“实现对所有城市居民提供免费图书馆”的蓝图^[4]。青番茄还把“In Library”的视觉标识建设在高铁、汽车4S店、商业酒店里,并不断地开拓新的空间——沿地铁沿线各站点布置“In Library”,真正做到让图书馆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随处可见。

2.2 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概述

2014年初,北京西城区政府文化委员会开始探索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和PPP(社会资本)合作道路,相继建设了“红丹丹心目图书馆”(2013年)、“砖读空间”(2014年)、“甲骨文悦读空间”(2014年)、“海棠书斋”(2014年)、“书香酒店”(2014年)、“繁星书吧”(2015年)、“书香驿站”(2015年)、“荣宝斋咖啡书屋”(2015年)、“华宝斋书院”(2015年)、“西华书房”(2016年)等30多家别具一格的公共阅读空间,并将其统一命名为“特色阅读空间”^[5]。经过多年实践,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不仅增加了就业岗位,而且扩大了服务人群的覆盖面,年流通人次达30万,服务触角覆盖的区域延伸至城区的主要街道及社区。此外,北京西城区政府文化委员会根据多年实践经验制定了《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考核指标体系》,以此对这些特色阅读空间进行绩效考核^[6],开辟了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建设文化公益事业的新路径。

北京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有很多文保建筑。“砖读空间”是北京首个在文保单位中建立的公共阅读空间,其利用现有的古建筑实体,通过对其修缮改造,并结合地方历史文化特色,打造成集图书馆、博物馆、档案馆为一体的公共阅读空间,收集与北京有关的文献资料;西城区的什刹海皮影文化酒店,以中国皮影戏为主题,在酒店的大堂开辟了公共阅读空间,

命名为“书香酒店”；成立于2014年的“海棠书斋”，是在万寿公园内开辟公共阅读空间；“书香驿站”建立在社区内；“华宝斋书院”建立在全国政协礼堂西南厅；此外，还有不少公共阅读空间建在了景区、街道以及人流密集、交通便利的地方。北京西城区的公共阅读空间主题内容特色鲜明，满足不同读者的不同需求，走差异化发展道路，走进百姓，深入基层，是政府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渠道。

3 青番茄“In Library”和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的比较分析

3.1 相同点

3.1.1 基本属性相同：知识免费开放获取

青番茄“In Library”和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作为新型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改变着人们对传统公共图书馆的认知，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承担城市公共图书馆的部分职能，与小型公共图书馆类似。其基本属性主要有：①公共性。无论是青番茄“In Library”还是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都直接面向社会大众群体，没有阶级、等级、种族之分，具有公共物品品格。②公益性。青番茄“In Library”和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履行着公共图书馆的部分职能，如提供图书的基础借阅服务、讲座、展览等，都是免费向用户开放，具有公益性。③开放性。这类阅读空间开放时长较长，有的24小时开放，有的错峰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图书馆开放时间的不足，主要解决了城市公共图书馆闭馆后人们对公共图书馆的需求问题。④知识性。这类空间除了基本的图书借阅、公共阅读以外，还有包括美术、书法、戏剧等多种题材的艺术鉴赏功能，集合了部分博物馆、美术馆、档案馆的功能，知识性服务更加多样化。

3.1.2 空间模式相同：“图书馆+”模式

青番茄“In Library”和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都是在某一物体建筑空间的基础上，发挥图书服务功能，为市民提供知识服务。其主要是在公共阅读空间附加诸如文创产品、古玩字画、咖啡茶饮等服务项目，呈现“图书馆+”模式。为此，从这些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来看，空间呈现的特点是“x+图书馆”或“图书馆+x”，具有复合性。这类阅读空间注重环境打造，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同时也兼顾现代化技术手段在服

务中的运动，给予读者更加舒适、便捷、高效的阅读体验。“图书馆+”模式的阅读空间是图书馆的部分功能与图书馆以外的实体建筑空间跨界组合、跨界合作的结晶，是一个将阅读、文化、知识、创意与交流融为一体的城市“第三空间”。它的意义在于，对于合作的实体建筑空间来说，一方面获得了青番茄文化传播公司或政府公共文化资源的支持，提升了空间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也为空间消费群体提供了文化服务。对于图书馆而言，缩短了图书馆与群众之间的直达路径，改变了在藏书丰富而数量有限的大建筑里被动等待读者上门的局面，把服务触角延伸至城市各个角落，让阅读无处不在，从而拓展图书馆的服务空间。

3.1.3 现实意义相同：解答了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三个问题

青番茄“In Library”和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从物理空间、抽象空间、精神空间的角度阐释了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在哪里”“做什么”“怎么样”3个问题，指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具有为人们提供就近公共文化服务、丰富人们精神生活的现实意义。

（1）物理空间指向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在哪里”的问题。青番茄“In Library”建设的咖啡图书馆、酒店图书馆、汽车4S店图书馆等，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服务网点呈现网状化结构，使图书馆真正存在于市民的身边，在时空上延伸了公共图书馆服务覆盖不足之处。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也同样广泛存在于街道、社区、公园等，大大缩减了市民与公共图书馆之间的距离，也为市民节约了借还图书的时间成本。这类新型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丰富了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阅读空间的供给形态，以一种小型的、复合的公共阅读空间，弥补了城市公共图书馆服务时间覆盖和服务区域覆盖上的短板，使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系统更加网状化，成为一种碎片化的存在。

（2）抽象空间指向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做什么”的问题。这类新型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从字面上看，“阅读”二字体现了它们的专业特性。加盟青番茄“In Library”的咖啡图书馆，虽然带有营利性，但是青番茄注册会员可以在这里免费享受图书服务或参与读书活动。在“In Library”的各类图书馆中，青番茄会根据主题为各个网点配送图书，为网点量身定制专属标签，如林夕迷、韩寒迷、武侠迷等，注重差异化发展策略。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同样注重空间特

色,每个公共阅读空间都有侧重点,如书法、绘画、茶道、文玩鉴赏、皮影戏、戏剧等,以呈现给市民更加丰富的知识形态。这类新型的阅读空间,提供各种知识形态以及形式多样的读者活动,足以丰富城市市民的精神家园。

(3)精神空间指向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怎么样”的问题。这类新型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在空间视觉特色上,注重环境的设计与特色,具有唯美、现代、时尚、精致的特点,满足了人们对阅读空间的审美需求和心灵需求。虽然青番茄“In Library”和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面积都不大,但是其提供的知识给人们带来了正面影响,既能使人们感受到阅读所带来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也能够享受到休闲娱乐所带来的惬意,从而焕发出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营造人与人之间更加美好的社会环境。

3.2 不同点

3.2.1 合作对象与建设主体不同

商业性质的青番茄“In Library”的合作对象多带有商业性质,如咖啡馆、酒店、汽车4S店、大型企业等,主要以商业模式开展公益性事业;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则是以政府为主导,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公共阅读空间建设,发挥了政府、企业、社会等多方的作用。因此,青番茄“In Library”与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的建设主体也不尽相同。青番茄“In Library”主要为民间民办,由民间组织、团体或个人出资并负责运营,如咖啡图书馆、酒店图书馆等。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主要为:①政府公办。由政府投入并管理,如由国家图书馆投入建设与负责运营的“西华书房”。②公办私助。由政府提供空间场地、基本藏书、技术设备,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外包,引入社会力量运营管理,政府定期检查验收,如“砖读空间”。③私办公助。阅读空间的提供方来自民间,政府给予图书资料的配给支持其开展图书服务,如“繁星书吧”“书香酒店”。

3.2.2 服务内容与运营方式不同

青番茄“In Library”与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在服务内容上呈现业务混搭重组的特色,但是在服务内容的侧重点上有一定的差异。与青番茄“In Library”合作的咖啡店、汽车4S店、高档酒店,其主营内容与青番茄的图书服务内容是主辅的关系。在服务内容上,基本以图书借还为主,在方便读者借阅、

就近阅读上充分发挥了青番茄城市文化服务节点的作用。而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的业务范围更加广泛,有文创产品、新书销售、古玩字画等。其特色阅读空间承载了部分公共图书馆功能,有的又兼顾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等功能,成为一个复合型公共文化空间,既有效弥补了公共图书馆数量的不足,又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公共图书馆,能为读者提供公共图书馆以外的文化服务。

青番茄“In Library”与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在运营方式上呈现公私经营互补的特色,但是在运作资本来源上存在差异。青番茄“In Library”是民间与民间合作模式的公共阅读空间,合作主体均来自民间。在经营上,咖啡、汽车销售等是私营的,图书借还服务是公益性的。青番茄“In Library”会在配送图书时,在图书中放置带有广告性质的书签。作为民间机构,青番茄提供图书免费借阅,它的运作资本基本来自于会员所缴纳的押金以及企业或合作单位、团体的广告费用。而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本身就是在政府的主导下建设,是民间与政府合作模式的公共阅读空间,合作主体是公私结合。在经营上,以提供免费图书服务、阅读空间及其他文化服务为主,附带进行文创产品、新书、简餐的销售。北京西城区特色阅读空间的运作资本有政府提供的资金、图书资源的支持。

4 公共图书馆构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策略

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公共图书馆是最主要的建设主体,对于打造城市公共阅读空间肩负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近几年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的建设情况来看,民间运营管理的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由于管理人员和工作人员缺乏专业的图情知识背景,难免在服务中出现偏差,服务效果受到一定的影响。为此,公共图书馆更应该在建设中发挥主体作用。

4.1 打造“图书馆+”复合阅读空间

公共图书馆在建设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上,应坚持存量与增量相结合。第一,公共图书馆要做好资源整合,对存量的馆外流通分点进行深挖潜能。首先要将运行良好的图书流通点进行升级改造,改造成为符合现代读者审美需求的公共阅读空间,注重唯美设计与现代技术的融合。其次,对还在运行但运行状况不够好的流通点进行重新定位,从特色化角度出

发,走差异化发展道路。最后,对不再运行的流通点直接淘汰,重新审视是否有建设的必要,再进行重新定位与建设。第二,公共图书馆还应该做好公共阅读空间的增量拓展。要在阅读空间的供给上实现从馆内走向馆外,发展具有“图书馆+”功能的、多元化的、复合型的小型公共阅读空间,如咖啡馆、便利店、地铁沿线各站点、酒店、高档写字楼等。要加强与民间资本合作,或者购买社会服务,共同建设馆外的公共阅读空间。在选择某一空间作为城市公共阅读空间点进行建设时,要做好项目考察和甄别,加强对合作方的培训、引导,发挥孵化校正作用,引领合作方走正确发展之路。

4.2 开发虚拟图书馆共享学习空间

公共图书馆在建设城市公共阅读空间上,应坚持线上与线下相结合。公共图书馆未来的发展方向是图书馆服务的泛在化、图书馆资源的数据化、图书馆阅读的移动化、图书馆用户的自主化与图书馆功能的智慧化。公共图书馆要积极打造线上学习中心,使公共图书馆化身为“小运用”装进用户的智能手机里,装进读者的口袋。“小运用”里有“大乾坤”。要将图书馆资源数据化,在“小运用”里推介图书资源、展览资源、讲座视频资源,让读者在任意空间都能阅读与学习,满足当下读者移动化、碎片化的阅读需要。要在“小运用”里嵌入SNS社交板块,促进有共同兴趣爱好的读者之间的交流。同时,公共图书馆还应鼓励线上读者到当地公共图书馆或者公共图书馆打造的特色阅读空间里,进行线下的交流和学习,实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4.3 规划公共图书馆物理建筑空间

公共图书馆要重新规划现有馆舍的空间设计,注重设计、功能区分,兼顾读者审美需求。首先,完善馆舍阅读空间设计。公共图书馆应从自身的阅读空间建设入手,注重馆舍空间文化建设,提高视觉感官享受和体验;注重馆舍阅读空间的营造,着力打造舒适、安静、优美的阅读环境。其次,重新规划整合现有馆舍空间。引入可以自由拆分、组合的书架、座椅,根据区域、功能划分阅读空间,使每个阅读空间之间可以合并、隔断,实现化零为整、化整为零;阅读空间功能多元化设置,既可以是安静的阅览室,也可以变成小型阅读交流室。最后,按照主题藏书设置馆中馆。公共图书馆要加强用户分析,分析读者最受欢迎的文献学科,建设主题馆和特色馆。

5 结语

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给公共图书馆带来了竞争,也带来了合作发展的机遇。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建设所取得的宝贵社会经验,值得公共图书馆借鉴与学习。现代读者在阅读的审美需求上有了更高的要求,公共图书馆要想实现与读者需求的无缝对接,就要加快公共阅读空间的转型升级。打破传统公共阅读空间的建设模式,建设小型的、不同形式的、多种功能的复合型图书馆,使散落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公共阅读空间变成城市的“会客厅”,不仅有图书的借阅流通,也有知识的交流与分享,使市民可以就近享受到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 [1] 张铁.图书馆公共空间的理念、开发与管理[J].图书馆建设,2011(11):31-33.
- [2] 许欢.我国公共阅读空间的建立与现代图书馆发展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0(1):109-112.
- [3] 李国新.城市公共阅读空间发展的新趋势[J].公共图书馆,2016(3):卷首语.
- [4] 王洪波,耿晓宁.“In Library”和地铁图书馆跨界合作比较研究[J].图书馆,2016(3):33-40.
- [5] 杨松.社会力量参与特色阅读空间建设研究:以北京西城区公共文化服务改革为例[J].全国商情,2016(10):43-45.
- [6] 杨松.城市公共阅读空间概念、发展定位和运行机制研究[J].全国商情,2016(11):72-74.

作者简介:刘艳(1982—),女,硕士,江西省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管理、参考咨询、文献资源建设。

收稿日期:2017-06-21

· 阅读文化 ·

城乡结合区域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构建探索^{*}

谭 博¹ 熊 伟² 王 锦³

(1.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 陕西西安 710054)

(2.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 陕西西安 710054)

(3.西安市长安图书馆 陕西西安 710118)

摘 要: 针对城乡结合区域留守儿童阅读现状不容乐观,其合法权益亟待保护,图书馆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在我国开展全民阅读背景下,文章尝试提出构建城乡结合区域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思路,并以西安市长安图书馆的实践为例,分析了其在积极构建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方面作出的若干有益探索,以期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提供新途径和新形式。

关键词: 留守儿童; 公共图书馆; 城乡结合区域; 阅读推广; 长效机制

中图分类号: G258.2

文献标识码: A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Long-Term Mechanism of Reading Promo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in Urban-Rural Fringe

Abstract The current reading situation of left-behind children in urban-rural fringe is not optimistic, their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ests need to be protected, and library service system is not perfect enough.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wide reading in our country, the paper tries to put forward the general idea and basic ideas to develop long-term mechanism of reading promotion for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in urban-rural fringe. Taking the practices of Chang'an District library as an example, the paper analyzes some useful practical explorations in actively build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of reading promotion for left-behind children. This paper aims to provide new methods and new forms for reading promotion of the left-behind children.

Key words left behind children; public library;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ading promotion; long-term mechanism

1 引言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近40年时间,是中国加快“城市化”的重要时期,迄今为止,城市居民占比已经开始明显超过农村居民。城乡结合区域是中国城市化过程自然形成的特殊区域,即核心城市的临近部分

区域和居民初步完成了“城市化”,而其他部分区域仍属于农业区域,其居民身份仍是农民,尚未充分便利地享有相关公共服务。由于临近核心城区,该区域农民身份居民夫妻双方通常选择就近或外出流动进城务工,导致了约1/5家庭有1~2名留守儿童或“半留守儿童”这一社会问题的存在。城乡结合区域留守儿童公共服务的突出特征是区位优势机遇与基础劣势挑战并存,其区位优势是以城带乡延伸服务的临近便利

^{*} 本文系陕西省图书馆学会2016年研究课题“基于高校图书馆与公共图书馆结对帮扶建设农家书屋的研究”(项目编号:161011)的成果之一。

性,而其基础劣势是城乡发展水平的累积差异性^[1]。

2016年2月14日,国务院《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务院《意见》)明确提出“农村留守儿童和其他儿童一样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心”^[2]。目前,我国留守儿童的阅读现状不容乐观,其合法权益亟待保护,尽管不少基层公共图书馆针对留守儿童策划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但是客观存在“节庆化”“离散化”和“浅表化”等突出问题,其长效机制构建问题有待于着力研究解决。本文阐述构建城乡结合区域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总体思路和基本思路,并以长安区图书馆的实践探索为例,就如何开展留守儿童阅读推广作进一步探讨。

2 总体思路

一般来说,任何公共服务领域长效机制的简化数学模型为: $P_i = S_j(R_k, T_m)$,即该长效机制是—定规模数量公共服务资源集合(R_k)通过—定组织结构的公共服务体系(S_j)以长期稳定(T_m)地供给有一定质量保障的服务产品(P_i)的运行过程总和^[3]。由此数学模型来分析城乡结合区域公共图书馆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可知:目前城乡结合区域公共服务资源的总体稀缺性和留守儿童群体的弱势地位性,决定了真正建立该区域公共图书馆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前提条件是,必须筹措投入一定规模数量的公共文化服务资源,主要包括各级政府主导配置、公共图书馆行业自主配置、公民参与配置和全社会合作配置的公共文化服务制度资源、财政资源、组织资源和人力资源;目前城乡结合区域公共服务体系的整体不完善性和留守儿童群体分布的离散性,决定了真正建立该区域公共图书馆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关键环节是,必须建立健全主要包括政府宏观管理、公共图书馆事业运行、必要市场机制支持和适当志愿力量辅助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目前城乡结合区域公共服务时间及质量的非稳健性,决定了真正建立该区域公共图书馆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保障条件是,必须建立健全具有一定法律效力的、“管办评相分离”的新型公共文化服务运行监督体制,及主要包括服务对象覆盖率、结构性服务量和优质化服务率等基本指标的专业质量评估体系^[4]。

因此,构建城乡结合区域公共图书馆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的3个总体思路是:保障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服务资源配置,健全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公共服务体系,强化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服务监督评估。

3 基本思路

3.1 大力建设面向目标群体全覆盖的区域留守儿童公共服务体系

国务院《意见》提出,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责。因此,地方政府应全面贯彻落实国务院文化强国战略部署,统筹规划区域留守儿童服务体系建设,要特别考虑把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工作作为该服务体系的重要建设任务之一,明确责任主体与工作目标,落实经费保障与人力保障,开展科学的考核评估。各级政府应积极协调有关留守儿童工作机构,促进图书馆、企业、社会团体等各方面力量联合与联动。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生力军的公共图书馆,在推动留守儿童阅读方面,理应发挥主体作用。基层公共图书馆可以考虑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来从事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工作,通过寻求政府多部门支持,积极整合学校、乡村、社区和农家书屋、基层文化站、广播电台、电视台、出版社等文化企事业单位及各类基金会或慈善机构等行业与社会资源,自主拓宽留守儿童服务领域等途径,建立起公共图书馆与政府部门、行业联盟、社会力量之间良性互动机制^[5]。

3.2 着力建设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多元财政保障机制

有力的财政保障不仅是各地留守儿童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前提条件,更是支持留守儿童阅读推广的坚实基础。目前,值得重点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的多元财政保障机制问题。可以根据国内外公共服务经费效能管理经验,采取政府财政投入总量控制、保证机构基本运行经费、实施活动专项补贴或购买社会力量服务相结合的多元化财政保障办法,来解决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所需经费及其经费配置问题。对于城乡结合区域来说,鉴于留守儿童公共服务机构的基本服务很难充分延伸至全部基层单位特别是农村地区,在中小学校和城乡社区本级解决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基层服务中心基本运行经费的基础上,为调动其工作积

极性和便利性,更适合采取专项活动经费补贴的办法。此外,为了解决中小学校和城乡社区本级解决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基层服务中心本身供给力量不足的问题,不仅可以向相关儿童专业服务机构、公益慈善类儿童服务组织和面向儿童志愿服务组织提供专项活动经费补贴,还可以向相关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实施购买社会力量服务方式。

3.3 重点推进中小学校和城乡社区的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基层服务中心建设

除了家庭之外,中小学校、城乡社区是留守儿童群体最经常的活动区域。要深入开展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服务,必须本着普遍、均等和便利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原则,应优先考虑依托中小学校、城乡社区及其附设文化服务机构特别是相关基础设施建立重点面向留守儿童群体的综合服务中心。

留守儿童教育问题日益成为引起普遍关注的当代社会问题之一,迫切需要全社会采取得力措施予以有效干预。留守儿童在社会交往、语言表达、亲子关系等方面普遍弱于非留守儿童,他们在与人接触中显得胆怯、退缩,不爱说话或语言表达非常简单^[6]。对于中小学校来说,除了接纳和对留守儿童开展第一课堂教育,还需要成立专门的工作机构,特别是依托本校图书室来组织实施较为系统的第二课堂学习、寄宿生活和心理保健等多个方面的特别援助。其中,组织和指导留守儿童在校开展个体自主和集体互助的阅读活动是一条具有拓展视野、促进交流和陶冶情操等综合援助功能的有效途径。目前,中小学校“大学区制”的试点及其推广,不仅是促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促进校际留守儿童交流的重要途径。在学校和家庭中针对农村留守儿童心理健康采取促进策略:一是在中小学进行综合主题活动;二是建立亲情图书角;三是每月举行一次集体生日会和家书传递活动。不同学校的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基层服务中心可以联合举办儿童读书会、朗诵比赛和智力游戏等多种形式的活动,从开放交流的途径促进他们的社会化交往发展程度。对于城乡社区来说,需要认真、缜密地考虑帮助留守儿童愉快而充实度过正常学期和寒暑假的校外闲暇时光,可以依托社区(农家书屋)来接纳留守儿童并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

3.4 加快建设全面支持留守儿童阅读推广的基层公共图书馆平台服务体系

从阅读推广工作角度看,建立健全基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则是其实现长效化的关键所在。近年来,我国很多省市乃至县级公共图书馆陆续筹建了少儿分馆,并且面向留守儿童开展了一些阅读推广活动。但是,与其他公共图书馆服务一样,同样面临着如何有效向基层日常化延伸与渗透的“最后一公里”难题^[7]。

为此,学术界已经论证并提出了“馆校一体化”“馆乡一体化”和“馆屋一体化”等服务模式。上述服务模式实施的着眼点是建立某个基层公共图书馆与若干基层服务点的合作伙伴关系,从而实现向基层延伸与渗透。然而,基层个体公共图书馆的资源动员与整合能力毕竟有限,特别是难以产生基于基层公共图书馆集成服务网络体系的规模效应。近年来,我国以创建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示范区为契机,大力推进了相关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的制度设计工作,特别是县域公共图书馆总分制建设试点工作。众所周知,由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尚不够平衡,而且这些区域中城乡地区之间发展也不够均衡,在具体建设基层公共图书馆集成服务网络体系方面,必然存在从实际出发的多元模式选择。总体来看,对于东中西部的城市地区,可以优先选择总分馆制,而对于城乡结合区域特别是农村地区,则应考虑选择强调以基层服务点建设、管理和运行为中心的“馆点线制”^[8],即“以特定区域居民为服务对象,以城乡基层特别是农村基层为重点,以免费开放为前提,以政府力量为主导,以行业力量为主体,以社会力量为补充,以公共财政投入为支撑,以区域公共图书馆集成服务网络为载体,以区域图书馆联盟为依托,以各级公共图书馆为中心,以城乡基层服务点为终端,以馆、点、线之间的分工合作为准则,以标准化集成供给线为纽带,努力建成区域全覆盖、终端到基层、公平且高效的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宏观运行机制”。

4 长安区图书馆的实践探索

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距离西安市中心8.9公里,交通发达,辖22个街道及561个行政村,属于典型的城乡结合区域^[9]。随着乡镇和街道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长安区留守儿童的数量也在逐年上升。长安区图书馆2012年的调查显示,整个长安区有留守儿童8 200余人,占在校小学生总人数的17.48%。通过

发放调查问卷和访谈发现,农村留守儿童中每年和父母一起生活在10天以下的占34.8%,没有人给辅导家庭作业的占到78.5%,课外兴趣爱好是打游戏的占85.2%,选择需要父母关爱的占88.3%,希望参加社会关爱活动的占100%。

近年来,长安区图书馆在长安区委和区政府特别是文化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高度关注并充分发挥留守儿童阅读推广主力军的作用,通过大力整合相关社会资源,构建相关服务平台体系,在积极构建留守儿童阅读推广长效机制方面作了若干有益的实践探索^[10]。

4.1 大力参与推进农家书屋全覆盖,认真组织关爱留守儿童系列活动

长安区图书馆在省、市农家书屋工作领导小组的直接领导下,大力推进本区农家书屋新建或改造工作,在2008年全区只有82家农家书屋的基础上,截至2012年实现了全区农家书屋全覆盖和全达标。为了巩固农家书屋达标建设成果,长安区图书馆每年都对其管理员进行一次专业技能培训,促使农家书屋日常管理规范化,保证了农家书屋正常开门。除了正常上班时间,在节假日要特别针对小学生开放,方便村里的小学生前来借阅。自2014年开始,明确农家书屋具有本村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基层服务中心的职能,农家书屋管理员应成为留守儿童的监督员和联系员,重点做好关爱留守儿童系列工作,特别要求增加针对留守儿童的课外作业辅导时间和课外阅读指导时间,并要求对乡村和社区留守儿童阅读推广工作情况进行详细统计和汇总报告。在长安区图书馆的业务培训和日常督导下,整个长安区的农家书屋系统逐步形成了以留守儿童为重点服务群体的工作格局,深受广大村民好评^[11]。

4.2 探索构建“馆点线制”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大力提升留守儿童阅读推广的系统保障能力

长安区图书馆在推广构建“馆点线制”县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方面作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一是逐步建立健全组织与经费保障体制。长安区图书馆积极把各农家书屋纳入到区域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之中进行统一管理,同时积极争取相关专项财政补贴支持,重点支持农家书屋作为基层服务网点建设。二是初步建立了区域公共图书馆集成服务网络基础框架。在区文化主管部门的支持下,目前正在建立健全由区中心图书馆、乡镇(街道)中心图书馆和行政村(社区)终端服务点构成的三级中心指导型集成服务网络工作

组织体系。以区图书馆为中心,按照全区统一建设与服务标准,协调落实各级网点建设所需基本场地与设施。有效整合“农家书屋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及各馆外借阅点等资源。三是初步建立了区级公共图书馆集成服务网络的运行机制。长安区政府依法按比例经常性支付公共财政经费,并配置必要的人力与物力,乡镇(街办)和行政村、社区按规定提供必要的人力与物力;利用流动服务车,面向各乡镇图书室定期进行资源循环调配,进而再向各农家(社区)书屋进行资源循环调配,特别是在组织面向部分中小学校图书室“图书漂流活动”的基础上,正在积极打造“接力阅读线”。四是初步建立了服务监督体制与考核机制。逐步完善各项监督工作制度,坚持组织有关调查研究活动,强化监督与问责,落实奖惩政策,定期对全区各乡镇图书室和农家(社区)书屋的建设、管理、服务、质量、效益等开展考评,每年进行绩效评估,切实推进了全区服务质量保障体系建设^[12]。

4.3 依托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等行业和社会力量,组织开展留守儿童主题阅读推广活动

近年来,长安区图书馆主要依托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和长安区农家书屋系统,承办了由长安区委宣传部和长安区文体广电局共同主办的“书香长安全民悦读”活动,以“关注乡村学生 分享阅读快乐”为主题,重点策划开展了送少儿话剧、送书、送爱国影片、送科普知识展板、智力答题等进校园关爱乡村留守儿童阅读推广系列活动。其中,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主要为长安区图书馆持续提供编目数据、数字资源和业务指导等方面支持,长安区农家书屋系统为长安区图书馆持续提供基层组织、场所空间和人力资源等方面支持。

2016年6月,长安区图书馆特别联合“我的”美术教育培训中心,共同举办了“手拉手·艺术童年·精彩无限”主题系列活动,300余个家庭近700人参加此次活动,部分留守儿童代表和陪护人也参与了此次活动。2016年12月1日,由区文体广电局主办,区图书馆、灵沼街道文化站、灵沼小学联合举办的第五届“关注乡村学生·分享阅读快乐”暨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诗词朗诵大赛在灵沼小学隆重举办,并为灵沼小学捐赠新书200册^[13]。截止到2016年12月,长安区图书馆累计在学校、社区、乡村、农家书屋等活动场所开展系列

推广活动达55项(次),参与活动的成人和儿童累计人次达11.5万人次,累计赠书图书1.02万册。

4.4 积极组织开展结对帮扶系列活动,为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注入新鲜血液

长安区图书馆深刻认识和充分发挥了毗邻西安这座“大学城”的区位优势,在陕西省图书馆学会协作委员会的支持下,自2015年起与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建立了结对帮扶关系。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不仅组织了图书馆员到长安区图书馆所辖农家书屋进行整理、编目、赠书及管理等环节的帮扶活动,还在学

期中间和假期中组织大学生志愿者近400人以开展文化、教育、卫生三下乡的社会实践方式,深入长安区农家书屋、学校和家庭开展系列文化帮扶活动,对留守儿童群体进行功课辅导或开展支教讲授活动。部分大学生还坚持陪同留守儿童一起游戏或进行话剧表演,与留守儿童建立了亲密友谊关系。应该指出的是,上述结对帮扶活动的开展显著拓展了长安区图书馆组织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活动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智力资源,也开辟了针对农村留守儿童阅读推广活动进行志愿服务的新途径和新形式^[14]。

参考文献:

- [1] 李森.和谐社会视阈下的城乡二元结构基础教育公平问题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11.
- [2] 两会热点:关爱农村“留守儿童”[EB/OL].[2016-03-09].<http://ccn.people.com.cn/n1/2016/0309/c366510-28184513.html>.
- [3] 周月莲,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图书馆创新发展策略探讨[J].图书馆工作与研究,2011(5):28-31.
- [4] 李金星,赵敏,蔺海洋.教育治理中“管办评”分离及其实施[J].教学与管理,2016(16):9-12.
- [5] 周坚宇.关于图书馆如何做好农村留守儿童阅读指导的思考[J].图书馆论坛,2013(12):50-54.
- [6] 亲子分离越早对儿童伤害越大[EB/OL].(2017-03-03)[2017-04-15].http://esb.sxdaily.com.cn/sxrb/20170303/html/page_09_content_001.htm.
- [7] 江洪涛,程彬彬,马桂莲,等.上海建立网上“农业图书馆”努力破解农村信息化“最后一公里”难题[J].上海农村经济,2012(2):35-37.
- [8] 熊伟,索新全,陈碧红,等.西部地区公共图书馆“馆点线制”服务体系建设研究:以宝鸡市公共图书馆服务体系建设的制度设计为例[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3(7):16-25.
- [9] 中国.长安[EB/OL].[2016-06-21].http://www.changanqu.gov.cn/front/zoujin_changan/article.jsp?articleId=47016&nodeId=1315.
- [10] 中国.长安[EB/OL].[2016-07-13].http://www.changanqu.gov.cn/front/zhengwugong_kai/article1.jsp?articleId=43857&nodeId=3190.
- [11] 西安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西安市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EB/OL].[2017-02-04].http://www.xa.gov.cn/ptl/def/def/index_1121_6774_ci_trid_2301114.html.
- [12] 中国农家书屋网[EB/OL].[2016-04-29].<http://www.zgnjsw.gov.cn/booksnetworks/contents/399/295365.html>.
- [13] 长安区图书馆-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EB/OL].[2016-12-09].http://changan.sxplsc.org.cn/gzdt/201612/t20161209_243602.htm.
- [14] 长安区图书馆-陕西公共图书馆服务联盟[EB/OL].[2016-11-01].http://changan.sxplsc.org.cn/gzdt/201611/t20161101_242398.htm.

作者简介: 谭博(1969—),男,西安科技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图书馆员服务质量评估等;熊伟(1973—),男,研究馆员,陕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兼执行副主编、图书文献与信息传播研究所常务所长;王锦(1981—),女,西安市长安区图书馆馆员,馆长助理,研究方向为公共图书馆服务、儿童阅读推广。

收稿日期: 2017-09-18

· 阅读文化 ·

“互联网+”时代下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探讨

张蔚然

(杭州图书馆 浙江杭州 310016)

摘要: 在“互联网+”环境下,读者的阅读需求日益个性化、多元化,给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带来新的挑战。文章从“互联网+”的相关理论出发,结合杭州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实践经验,提出“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策略,即发扬互联网精神,加强社会化合作,拓宽阅读推广渠道;依托互联网技术,将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日常化;应用互联网思维,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持续优化服务内容。此外,就潜在的困难进行了思考,以期实现“互联网+”时代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 互联网+; 公共图书馆; 阅读推广; 杭州图书馆

中图分类号: G252.17

文献标识码: A

Discussion on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s of Public Libraries in Internet Plus Era—Take Hangzhou Public Library as an Example

Abstract In the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the personalized and diversified reading needs of readers bring new challenges to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of public libraries. The author connects the theory of internet+ with the practices of Hangzhou Public Library, and puts forward a series of strategies of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for public libraries, including social cooperation for widened channel; making reading promotion as routine work by internet technology; enhancing reading experiences and updating the service through the internet thinking. Besides, the author makes some reflections on the potential problems for developing and improving reading promotion service of public libraries in the time of Internet+.

Key words internet+; public library; reading promotion; Hangzhou Library

1 引言

“全民阅读”在2012年被写入十八大报告,自2014年起连续4年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2013年,公共图书馆评估工作中,包括讲座、培训、展览、阅读推广活动、年参与活动总人次和图书馆服务宣传等内容的“社会教育活动”占据重要地位^[1]。2017年6月,国务院法制办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草案)》。《草案》计划将全民阅读纳入国家战略,旨在鼓励民众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从政府层面到行业内部,一系列的举措都对图书馆的阅读推广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加强阅读推广工作成为图书馆服务

的新趋势和新方向。

2017年4月18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在北京公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数据: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较2015年的79.6%略有提升,数字化阅读(网络在线阅读、手机阅读、电子阅读器阅读、Pad阅读等)方式的接触率为68.2%,较2015年的64.0%上升了4.2个百分点,图书阅读率为58.8%,较2015年的58.4%上升了0.4个百分点^[2]。该数据显示出国民旺盛的阅读需求;“互联网+”时代,知识载体和传播方式的改变对读者阅读方式以及传统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产生了冲击。面对读者日益多样化、个性化的阅读需求,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需要作出相应的转变。

2 “互联网+”时代下阅读推广服务的特征和现状

2015年,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是在互联网模式下,行业在线提供服务的方式。互联网和行业不是简单的结合,而是在互联网支撑下,行业服务进行深度和广度的开发,促进行业服务不断走向健康、完善、可持续化^[3]。

“互联网+”时代下的公共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呈现出鲜明的时代共性特征。第一,去中心化,解放人心、创造动力。去中心化使得读者与图书馆员、读者与读者之间的边界变得模糊,弱化了图书馆自身的主导地位,以读者为主体,更好地发掘读者的潜在阅读需求,使读者从“被动”接受到“主动”选择,更深入高效地实现了阅读推广服务的宗旨。第二,扁平化,解放人力、创造效力。图书馆与社会组织及个人的关系,变得更开放、包容。扁平化原则使得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不再只是行业内部的专业行为,来自不同行业的人力、财力、物力都能加入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体系中来,处处都是与读者直接接触的节点,实现了以阅读为纽带,营造跨领域、跨行业的阅读推广服务生态圈。众多社会力量自发的阅读行为能在图书馆领域得到共鸣、得以强化。很多民间倡议、图书馆认可并得到多方支持的阅读推广行为,拓宽了传统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主体和受众。服务的形式,不再是以图书馆为中心向社会发散的线性模式,而是图书馆、社会组织、社会个人等多个中心,结为网络,向整个社会发散的的网络模式。简言之,当前的阅读推广服务促进了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行业跨界融合发展,激发了更强的创造力和执行力^[4]。

目前,图书馆行业利用互联网相关技术,基本实现了书书相联、书人相联、人人相联^[5]。以基于WAP的移动服务为例,随着移动上网的网民人数的增多,移动图书馆网站也相应越来越多。目前,国内基于WAP的移动图书馆在数量、深度上都不亚于国外同行^[6]。2014年5月,内蒙古图书馆率先推出的彩云计划“我阅读,你买单,我的图书馆,我做主”的创新服务,运用互联网技术,通过云服务理念,打造“云图书馆”,开始了阅读推广服务模式的创新。随后,全国各地公共

图书馆陆续推出相关的阅读推广服务,成效显著。有别于其他馆需要微信支付等形式的押金,杭州图书馆(以下简称“杭图”)将信用体系引入图书馆系统,依托杭州独有的互联网基因,和芝麻信用结合,率先实现了零押金线上借阅^[7]。这些成果为公共图书馆进一步完善阅读推广服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3 “互联网+”时代杭州图书馆阅读推广服务的实践

3.1 发扬互联网精神,加强社会化合作,拓宽阅读推广渠道

开放、共享是互联网精神的一个重要要素。在适应“互联网+”的大势下,各行业的颠覆性转变使得跨界合作成为必然。只有兼备开放和共享的姿态,才能实现全社会的资源整合,实现优势互补。

杭图在立足本馆资源履行阅读推广服务的同时,积极拓宽和深化社会化合作,将阅读推广服务纳入图书馆服务的日常运行机制。以杭图为中心馆,区县(市)图书馆为总馆,街道(乡镇)图书馆为分馆,社区(村)图书室为亚分馆,构成四级网络服务体系。通过服务体系的完善,实现阅读推广服务的城乡全覆盖。以最近兴起的“你借书,我买单”为例,杭州在开通农家书屋官方数字平台并为所有农家书屋提供免费WiFi的基础上,借鉴城区的成功经验,在农村实现图书阅读服务的“私人订制”^[8]。得益于总分馆体系的运行机制,杭图与区县、社区的深度合作,使得阅读服务与社区活动密切相关,也使得阅读推广能不受地域、时空的局限,有效且及时地开展。与此同时,杭图积极与区政府、文化单位、环保部门等开展合作,以合作办馆的方式,建设科技、运动、印学、环保、运河文化等主题图书馆。通过开展与主题密切相关的各种活动,将阅读推广服务与各个分馆的主题密切结合。

3.2 依托互联网技术,将公共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日常化

分析“互联网+”时代阅读行为的特点,不难发现,社会化阅读日趋普遍。社会化阅读是一种以内容为核心,以社交关系为纽带,注重分享、交流和互动的移动阅读新模式^[9]。而传统图书馆带给读者的封闭式的、私人的、静态的阅读体验已经不能实现这样的阅读模式。为对抗碎片化阅读、注意力缺失带来的冲

击,杭图充分利用“互联网+”时代催生的新技术,将之前逢节日、逢事件才进行的阅读推广服务常规化、制度化,纳入日常读者服务机制和馆员的绩效考评机制中。通过开通微博、建立微信平台,组织线上阅读分享群,与传统纸媒合作、网络直播等形式,积极向市民推荐新书、传递服务新动态。

值得一提的是,杭图依托物联网技术,搭建基于O2O的悦民服务平台,全面感知读者的阅读需求。悦民平台的搭建,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自2016年1月1日起,杭图推出“你看书我买单”的“悦读”服务。读者首次参与到文献资源建设中来,既解决了过去借阅周期慢、借新书难等问题,又提高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文献资源的利用率,还掀起了全民阅读的热潮。2017年,杭图进一步创新借阅方式,将阅读服务向更多潜在读者推广。在4月23日“世界读书日”,联合芝麻信用,启动“书香中国信用杭州”芝麻信用借还图书项目。任何人,只要支付宝芝麻信用分在600分以上,即可免押金借书。

芝麻信用借还书服务推出以来,不到半年时间,杭图的新增读者量将近3万,每个月保持6 000~7 000册的线上借阅量。9月2日,2017公共图书馆信用服务论坛上,杭图宣布,杭州地区芝麻信用分满550分的支付宝用户可以免费借书。由于支付宝注册芝麻信用功能的用户,默认起始分值是550分,这一举措意味着只要市民开通了支付宝芝麻信用,就可以零门槛免费借书。至此,图书馆的书籍通过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操作,就可以实现线上借还书。足不出户,快递到家,互联网和物流以及芝麻信用借书的高效融合,让O2O悦民平台真正实现了图书馆阅读推广的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3.3 应用互联网思维,注重读者的阅读体验,持续优化服务内容

互联网思维是建立在消费者主权的基础上,一切以用户为中心,强调参与和消费体验,由消费者决定一切。如何满足个性化需求,实现定制化,同时有效保质保量,并持续改善用户体验,是当前企业在应用互联网思维后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10]。基于消费者的思考,同样适用于公共图书馆的读者群体。杭图坚持以人为本,时刻注重将读者体验与阅读推广密切结合。

(1)从空间设计入手,优化读者入馆的阅读体验。新馆面积的近90%面向读者开放,设有2 200个阅

览座位,大厅空间、阅览空间、交流空间、休闲空间四块开放区域各具特色,为读者提供不同的服务内容和环境感受。2016年底,在杭图“图书馆+”这个分享一切与互联网创新、创业相关内容的空间,北京理工大学杭州校友会举办了《从0到1》读书分享会,既有读者交流读书心得,又有总裁分享互联网行业的创业经验,一时间创业、企业管理类的热门图书一“借”而空。

(2)时刻将读者体验放为首位,持续优化已有的阅读推广活动。以低幼区的儿童阅读推广服务为例,之前的线下活动虽然也涉及国学、英语、亲子阅读等,内容丰富,但收效不够显著。通过分析到场人次和活动效果,尤其注重分析来自读者的反馈和评价等信息发现,低幼区的读者年龄较小,自主阅读能力差,单独从儿童阅读能力培养的角度开展互动是不够的,因而加大了家长的参与力度,着重培养亲子阅读氛围,打造了“快乐家庭日”品牌活动,其内容涉及科普创客、手工制作、故事表演、艺术赏析等,受到小读者和家长的欢迎。

(3)为了进一步增强读者阅读体验、培养馆员的阅读推广能力,杭图及时优化了阅读推广策略:充分发动全馆馆员参与阅读推广活动的积极性,由过去的一名馆员从事栏目内容编写扩大到所有有兴趣的馆员都可以随时投稿参与内容编写,经过审核后都能发布在栏目中。同时,成立了阅读推广小组,保证每期的内容都能按时按量完成。此外,细化了读者群。目前新上线的推荐栏目中,读者不仅能看到不同馆员的推荐,还有来自学校老师、小朋友及各行业热心读者的阅读推荐,推荐的书目也根据年龄段作进一步的细分。可以说,从馆员个人孤立的推荐到馆员和读者之间、馆员和馆员之间分享式的推荐,从针对低幼读者的“粗放式”推荐到将低幼读者分年龄段的“集约式”推荐,阅读推广服务在栏目的改版中不断深入、细化。

(4)将阅读与倡导休闲娱乐文化的方式密切结合,积极开展分馆品牌活动。生活主题分馆的“生活的艺术,艺术的生活”、音乐分馆的“总有一种声音打动你”、运动分馆的“当阅读遇上运动”等活动,成为各具特色的品牌活动,通过交流、互动、体验,凸显了主题馆的特色,并激发了读者通过阅读深入了解和学习的兴趣。通过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休闲娱乐的方式体验,来提升读者对文化和知识的感知和鉴赏能

力,培养其阅读和思考的兴趣。

4 思考

互联网与图书馆行业的结合,为公共图书馆开展阅读推广服务提供了新思路和新方法。但我们也要适当反思互联网的弊端,用历史的、辩证的视角看待互联网与图书馆行业的发展。在满足读者的定制化、多元化阅读需求的同时,也要对流行文化、社会化阅读、阅读内容同质化等现象保持冷静的头脑,注重对经典文学、传统文化的坚守,对严肃阅读的倡导,有的放矢地遵循差异化发展。

要真正落实阅读推广服务,还需要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提升馆员的职业素养,培养适应“互联网+”时代要求的图书馆员。图书馆员不仅要掌握采编、流通等环节的必备技能,而且要主动学习“互联网+”时代下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的运营方式和内容特点。对新技术在传统行业的跨界应用保持敏感,对全民阅读在社会各界的流行和推广保持关注,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及时反思并改进服务,以身作则地成为“终身教育”“自我教育”的践行者。第二,坚持线上与线下服务密切结合,处理好其与传统阅读推广服务的关系。线上阅读推

广与线下阅读推广的关系不是简单的取代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线下的阅读推广注重参与体验,无论是阅读沙龙还是亲子阅读,其共通之处都是让尽可能多的读者能融入阅读。参与面对面的阅读推广活动,能够消除人与人之间的偏见和隔阂,搭建起一座沟通与交流的桥梁。线上的服务注重便捷、时效,无论是不方便出行的老年读者还是不愿意将时间花在路上的年轻读者,都能够节省其时间成本、精力成本、体力成本等,享受图书馆线上服务所带来的便捷。图书馆的阅读推广服务已经通过移动客户端、书店、物流,从馆内延伸到千家万户。线上线下的阅读推广服务各有侧重,应将两者紧密结合。第三,建立健全阅读推广服务考核机制,通过绩效考核的反馈信息,不断完善反思,指导工作。阅读推广服务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通过有效的考核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服务的准备、实施、效果等各环节都需要制定相应的考核机制,保证服务质量。此外,将服务与员工绩效考核挂钩,一方面可以激发馆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从最开始的参与阅读推广项目到之后独立开展阅读推广项目,馆员提高了能力,发挥了专长,激发了主动性和创造性,实现了职业生涯的快速成长。另一方面,可以将服务的考核落实到人,权责分明,奖惩分明,提高管理效率,完善服务质量。

参考文献:

- [1] 谢蓉,范并思.用研究、数据和案例推动图书馆阅读推广:《公共图书馆阅读与推广活动情况报告》周年述评[J].图书馆,2015(6):9-12.
- [2] 新浪读书.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出炉:2016年人均阅读7.86[EB/OL].(2017-04-18)[2017-06-15].<http://book.sina.com.cn/news/whxw/2017-04-18/doc-ifyeimqy2574493.shtml>.
- [3] 黄晓军.“互联网+”时代高校图书馆阅读推广策略探讨[J].知识经济,2017(3):137-138.
- [4] 王吉斌,彭盾.互联网+:传统企业的自我颠覆、组织重构、管理进化与互联网转型[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57.
- [5] 曹畋.试论“互联网+”下的智能阅读推广[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11):95-96.
- [6] 曾小英.面向阅读推广的移动图书馆服务模式与发展思路[J].情报探索,2015(3):57-58.
- [7] 王宏.拓宽“互联网+阅读”新模式[EB/OL].(2017-09-27).<http://news.sina.com.cn/2017-08-22/doc-ifykcirz3666839.shtml>.
- [8] 浙江日报.私人订阅走进杭州农家书屋[EB/OL].(2017-03-28).http://fashion.hangzhou.com.cn/ssqy/content/2016-07/28/content_6256286.htm.
- [9] 刘亚.移动互联时代的大学图书馆阅读推广策略:基于社会化阅读的启示[J].图书馆论坛,2014(5):48-54.
- [10] 刘晓娟,尤斌.“互联网+”:新思维和新管理[M].北京:中国人事出版社,2016:20.

作者简介:张蔚然(1987—),女,杭州图书馆助理馆员,硕士,研究方向为阅读推广、读者服务。

收稿日期:2017-08-07

· 工作研究 ·

基于实践的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建设探析

肖 铮 刘海伟 黄国凡

(厦门大学图书馆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信息技术的发展影响着现代图书馆的发展进程,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和技术馆员作为图书馆中信息技术应用实践的主要力量,其发展成为图书馆在信息技术时代转型发展的关键因素。文章通过分析国内外图书馆技术部门和技术人员相关研究文献,以厦门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发展实践为例,总结归纳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的建设理念,提出高校图书馆技术馆员面临的共性问题及其对策。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的发展应因需而变,注重人文素养和创新意识,以开放的心态打造学习型组织,培养过硬的专业技能。

关键词: 高校图书馆; 信息技术; 技术部门; 技术馆员

中图分类号: G258.6

文献标识码: A

Discussion on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ity Library Technical Department Based on Practice

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ffects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library. As the main force of th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libraries, the development of technical departments and technical librarians in university libraries has become key factor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ibraries in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ra. By analyzing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library technical departments and technician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taking the development practice of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partment in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 the paper sums up the construction ideas of university library technical department, and puts forward the common problems faced by university library technical librarians and their countermeasures. Finally, the pape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library technical department should be changed due to need. Besides that, we should focus on humanistic literacy and innovative awareness, build a learning organization with an open mind and develop excellent professional skills.

Key words university lib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echnical department; technical librarian

1 引言

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人类社会产生了深刻影响,图书馆也无时无刻不在其影响下发生着变化。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机读目录格式和图书馆管理系统的出现,使图书馆进入了自动化时代。围绕着计算机读目格式,传统的图书馆工作流程发生了重大改变,卡片目录被更容易查询的计算机目录所取代,手动登记也变成了效率更高的光枪扫描,图书馆的服务效

率大为提升。当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通讯技术进一步与图书馆业务融合发展,图书馆的馆藏资源不再仅为纸质图书资料,数字化的内容逐年增多,读者也不再受限于图书馆的物理空间。通过网络,读者可以随时随地取用资料,复合型图书馆极大地扩展了图书馆的服务范围^[1]。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尤其是Web 2.0运动对图书馆的服务理念产生了深远影响^[2],随着各种新兴的信息技术与现代图书馆融为一体^[3],图书馆从此开始了2.0的时代。回顾图书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现代信息技术推动着图书馆的发展转

型。图书馆信息技术部门作为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具体应用的实践执行者,其建设发展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未来图书馆的发展之路^[4]。

2 图书馆信息技术部门建设研究综述

图书馆界对信息技术的研究热度逐年增强,在CNKI上通过高级检索式“SU=('图书馆'*'信息技术') NOT TI='启事’”检索(检索日期为2017年9月6日),共检索到11 481篇文章。通过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研究主要集中于“高校图书馆”“数字图书馆”“信息服务”“网络环境”“公共图书馆”“图书馆管理”“知识管理”“信息资源”“读者服务”等方面。范并思指出,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的影响体现在新一代计算机系统研究、信息收集、信息处理、信息存贮、读者服务和图书馆管理6个方面^[2]。虽然对于图书馆信息技术的研究成果丰富,但对于图书馆技术部门和技术馆员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在CNKI通过高级检索式“SU=('技术部'+ '技术馆员') * '图书馆' NOT TI='启事’”检索(检索日期2017年9月6日),只检索到169篇文献,将新闻通讯类和其他无关内容记录排除后,仅有47篇文献真正与图书馆技术部门或技术馆员相关。郑宏在1997年首次以图书馆自动化技术人员为研究对象,提出建立一支强大的技术人员队伍是保证图书馆现代化建设深入持久进行的基本条件^[5]。陈慧杰等人指出,现代图书馆自动化部门的功能已不再是传统的系统支持与维护,应转型扩充其功能为图书馆提供新技术、新产品的应用建议,支持新技术的应用与培训,开展新技术的研究与跟踪^[6]。李广建在2002年以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为例,第一次全面介绍了图书馆信息技术部的功能定位、任务目标、业务规范和队伍及项目^[7]。王启云通过分析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建设现状,发现图书馆信息技术人员比例低,人才流失严重^[8]。张连分介绍了美国泽维尔大学顺应技术发展潮流,成功将图书馆和大学信息技术部门合并,开启新的图书馆改革,引领图书馆走进数字化时代^[9]。钟戈针对图书馆“大流通”服务模式的普及,提出“大流通”服务模式技术部门服务意识需要转变,增加服务的主动性^[10]。

关于图书馆信息技术部门及信息技术员工发展的问题,国外学者也有所关注。Dale Askey在2016年网

络信息联盟(Coalition for Networked Information, CNI)春季会议上的主题报告“侵入式融合:信息技术和图书馆的领导、结构和文化”中指出,学术图书馆在招聘和留住IT员工上面临挑战,同时IT员工也面临无法进入图书馆管理层的职业发展瓶颈,导致图书馆无法充分发挥IT员工的才智为用户提供更有效的服务和更好的用户体验^[11]。美国咨询公司Ithaka S+R在关于图书馆如何设置和看待技术部门的调研报告中指出,美国大学图书馆技术部门一般都处于专业体系的边缘地带,从事的是配合和辅助专业馆员的工作。在数字人文、数据管理等新业务大量涌现的今天,如果这些技术人员的地位不改变,大学图书馆就找不到高层次的技术人员,未来图书馆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影响^[12]。

综合分析上述文献,图书馆界对于图书馆技术部门建设发展和技术人才培养问题虽然有所研究,但一方面由于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图书馆大环境发生改变,早期研究已无法有效指导当前工作。另一方面,在相关研究中较少有具体实践案例的分析,不能为目前图书馆信息技术部门建设提供参考。

3 厦门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发展概况

3.1 早期实验阶段

20世纪80年代,微型计算机开始进入厦门大学图书馆。个别馆员开始利用微机编程开发简单的表格系统,实现书目录入、排序、索引等功能,并自主开发了图书流通管理程序进行图书借还,将原来的手动登记变成了机器记录,大大减少了借还操作时间。随后通过引入Biblio File光盘编目系统进行西文图书计算机编目^[13],息洋系统进行中文图书编目工作,为日后图书馆自动化管理系统的使用奠定了基础。早期因受限于人力和经费等,图书馆仅有少数人会使用计算机,他们既是使用者,也是管理员和维护员。可以说,他们是图书馆最早接触现代化设备的馆员,是最早的图书馆信息技术人员。

3.2 初建探索阶段——自动化部的成立

进入20世纪90年代,图书馆的现代化建设得到了学校的重视和大力支持,学校规划利用5年时间投入大量经费实施全校图书情报自动化网络化^[14]。1996年,图书馆经过测试和比较,最终选择了由深圳图书馆开发的、当时处于国内领先地位的ILAS图书馆自动

化系统^[15]。随着自动化系统的成功应用,传统业务流程也随之调整,图书馆适时地进行了业务重组和机构改革,成立了以保障自动化系统、维护计算机及网络设备的新部门——自动化部。图书馆在自动化网络化建设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培养了自己的技术队伍。当学校筹划建设校园网时,专门从图书馆抽调了一名馆员参与组建学校网络中心,说明图书馆在全校信息化网络化建设起步阶段处于领先地位。

3.3 扩大发展阶段——“大”自动化部时代

随着各类型电子出版物的规模不断增加,图书情报电子化趋势愈发明显。经讨论规划,图书馆成立了专门的电子文献部,并从自动化部抽调技术人员负责电子文献的采编与通报、电子文献信息查询服务、计算机辅助教学、电子文献制作与建库、电子文献与会议通讯^[16]。

校园网络全面建成,图书馆服务器、存储、网络等硬件基础设施大幅提升后,通过计算机网络提供更加丰富的资源、提高文献资源保障率、满足读者资料检索的便捷性,成为图书馆下一步的发展目标^[17]。图书馆从各个部门抽调了一批优秀年轻馆员开始进行资源数字化和数据库开发工作,并成立了资源开发小组^[18]。

这一时期是图书馆信息化、数字化建设的热潮阶段,对自动化部工作职责定位较为模糊,认为与计算机工作相关的职能都属于其工作范畴,因此会使用计算机的馆员被大量调入,自动化部人员规模一度达到19人之多。

3.4 专业建设阶段——信息技术部的成立

在数字图书馆建设过程中,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资源内容规模扩大,服务模式发生转变,逐渐形成了资源、技术、服务三大组成部分。各部分工作对象、工作流程、工作目标各不相同。图书馆适时对自动化部进行了调整,分别成立了以资源建设为主的多媒体中心,以技术保障、系统开发为主的信息技术部。另有若干原自动化部馆员加入一线服务部门,他们凭借在自动化部的技术历练,带动了全馆信息化应用水平,推进了数字化图书馆的全面建设与服务转型。

经过重组,信息技术部下设系统维护组和资源开发组,根据工作任务重新梳理各岗位职责,设立自动化系统管理员、网络工程师、资源开发主管、软件

工程师等专业技术岗位,专业化分工进一步明晰,既有利于技术人员的专业发展,也有利于技术团队的建设^[19]。

3.5 服务转型阶段——泛技术团队形成

信息技术部明确了以信息化建设、技术服务保障为主的工作方向,将工作重心聚焦于图书馆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图书馆平台建设、信息系统开发。厦门大学图书馆大胆尝试将Web2.0的相关技术与图书馆服务相结合^[20]。同时,Web2.0的理念也在悄然改变图书馆的组织文化,人人参与、集体智慧、开放协作,形成了一支来自不同业务部门、具有不同背景和专业技能、提倡创意创新知识共享的泛技术团队^[21]。在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体时代,厦门大学图书馆除了跟踪尝试新的技术和产品外,还更加关注新媒体与图书馆业务结合,通过营销推广图书馆服务^[22],是最早一批开通微博、微信公众号的图书馆。在社交网络上与用户广泛互动,解答咨询问题,开创了读者服务的全新模式^[23]。在迎新、离校两个对高校学生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通过推出设计清新、内容个性、有情感依托的专题网站,营销图书馆服务。专为毕业生准备的“围·时光”网站获得了2016年IFLA国际营销奖第二名^[24],受到业内同行的广泛关注。

4 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建设的理念

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大多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至今已有20多年的历史。虽然各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的名称不尽相同,但其负责的工作内容却大同小异^[25],其发展过程和建设经验也可以互相借鉴。回顾厦门大学信息技术部的发展历史,总结其发展过程中的问题与经验,针对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建设,提出以下理念。

4.1 感知变化, 因需而变

信息技术本身的特点就是一直处在快速变化之中,当新技术出现并影响社会发展时,图书馆尤其是负责信息技术工作的技术部门,要能感知到社会环境变化并及时作出调整,保障图书馆事业适应新的环境。从厦门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发展过程中的几次转型调整可以看出,当自动化系统引入图书馆,为了保障系统应用,自动化部应运而生。当网络基础和硬件基础逐渐完善,需要通过网络提供更加丰富的数字化

资源时,信息技术部便加大力度开展数字化加工和数字图书馆平台建设。当Web2.0时代来临,能够积极实践Lib2.0,信息技术部提出“因你而变”的服务口号。当社交媒体兴起之时,其能够迅速建立图书馆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并在部门内设置新媒体服务、媒体创意设计岗位。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要时刻关注信息技术的变化,尤其是行业外的社会变化,思考这些变化可能会给图书馆带来的影响,积极探索并实践新技术与图书馆服务的结合。

4.2 打造学习型组织,构建部门知识库

要保持对不断变化的信息环境的感知,技术部门必须要有意地开展学习交流,打造学习型组织,并且要利用知识管理工具将学习成果沉淀为部门知识库,以保证团队持续进步。厦门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实践学习型组织:①利用每周部门例会时间,由一名部门成员进行主题分享,内容可以是其近期工作项目介绍、学习或应用到的新知识新技术、图书馆行业最新动态、软件工具使用技巧、新设备使用体验等。通过定期分享,部门成员既增强了理解与信任,又能够了解到新鲜事物,或从分享讨论中找到新思路、新方法。②组织并参与馆内的泛技术团队分享会或学科馆员会议,向馆内同事介绍新技术应用,从其它同事分享中了解全馆发展动态,展开头脑风暴集思广益。③外出交流参会,从行业专家的报告中汲取新思想、了解最新动态,从同行的实践总结中学习新方法。④关注优秀的微博和微信公众号,跟踪了解信息技术领域和图书馆行业的新知识新动态,并通过微信群分享讨论。⑤注重知识管理,从最早的内部论坛、馆内维基到部门博客,再到今天使用的印象笔记企业版,部门成员的工作总结、学习笔记得以存档,形成部门知识管理仓库。这既是团队知识的传承与分享,也是对团队发展历史的记录。

4.3 提升专业技能,培养岗位能力

根据岗位分工不同,各成员应具备不同的专业技能并不断向深层次发展,逐步完善个人知识结构和能力。系统管理员应具备丰富的服务器、网络、存储知识,熟练掌握计算机操作系统、数据库、服务器应用软件、图书馆专业软件的安装、维护和故障处理,掌握网络安全防范知识,熟悉各种信息系统体系架构。软件开发工程师应熟练使用至少一种后台编

程语言,具备数据库开发能力,Web前端开发HTML、CSS、JavaScript知识,掌握基本的Web安全漏洞检测与修复技能。此外,还需要了解图书馆行业相关规范标准,比如OAI协议、各种元数据规范标准等,以便使开发的系统具备良好开放性、交互性和可扩展性。桌面工程师应具备丰富的PC、网络、其他周边设备的维护经验,熟悉一卡通设备安装维护、自动化系统的常见操作与问题处理、相关管理信息系统的使用。新媒体服务工程师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良好的文字功底,熟悉媒体软件的基本操作,善于沟通交流、把握用户需求,熟悉全馆业务与服务,能够及时处理读者咨询。图书馆技术部门不能如专业IT公司般细致划分岗位、配置充足的技术岗位编制,往往要求成员具备一专多能的素质,通过团队配合提升整个技术部门的专业能力。

4.4 坚持以服务为导向,直接面向终端用户

传统的技术部门主要以保障工作为主,工作对象为各种硬件基础设备和计算机程序。但作为信息化时代的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应秉承图书馆读者服务的理念,直接面向读者提供服务,充分融入图书馆服务中,以提升图书馆整体服务效率。例如,厦门大学网络中心提供了校园VPN服务解决用户校外访问图书馆数据库资源这一问题,但由于不同操作系统的VPN设置方法各异,因设置不当造成的无法连接问题也不尽相同,对此提供了现场处理、电话和E-mail咨询、远程协助等方式直接解决读者关于校园VPN的问题,极大地节省了读者因技术障碍而无法使用图书馆服务的时间。在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以来,凭借在信息技术方面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部门成员结合实际需求开发课程,为读者开设《使用印象笔记进行知识管理》《邮件礼仪漫谈》《Latex论文写作》《Photoshop使用入门》等讲座,取得了良好的读者反馈效果。还有部门成员兼任学科馆员服务,直接对口学院开展各种培训、咨询、专题服务。通过以服务为导向的转变,使得技术人员能够更加直接地接触终端用户,获得用户反馈,这也有助于技术人员更好地了解用户需求,及时解决问题并改进服务。

4.5 保持开放心态,发扬分享精神

在开放的网络环境下,图书馆已不再是用户获取知识的唯一途径,而成为知识服务网络上的一个节点,面对环境的变化,图书馆需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

融入其中。厦门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多次调整和人员变化,人员的正常流动不仅没有影响团队稳定发展,反而增强了团队的活力,建立了与各方的联系,培养了懂业务、会技术的馆员,推动了图书馆整体发展。泛技术活动的一个特点就是开放性。人人都可参与,话题亦无限制,只要有乐于分享的精神,都能成为其中的一员。因项目组建的各种临时工作小组,打破了传统部门间的壁垒,技术部门、业务部门、服务部门以问题为导向自由讨论、彼此分享,共同探讨最优的解决方案^[26]。

4.6 发挥创新思维,营造创新氛围

信息技术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各个行业都在经历着由信息技术而引发的变革。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因其专业背景和工作性质而对新信息技术具有更高的敏感度和适应性。在图书馆发展过程中,技术部门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积极思考哪些新技术可用于图书馆工作流程的优化、服务的升级与推广、知识的组织与发现。创新源于学习和思考,厦门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在多年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好的创新氛围,鼓励成员提出新想法、尝试新技术、探索新服务。在工作中,形成学习提高、实践探索、回顾反思、逐步改进的良性发展。

4.7 具备人文素养,坚持以人为本

不论环境如何变化,图书馆以人为本的服务理念是永远不变的,在提倡技术引领服务创新的过程中,仍需要坚持以人为本,注重将信息技术与为读者服务的理念相结合。技术人员在图书馆信息化建设时,不能脱离实际单纯追求设备的现代化,不能脱离服务片面强调技术的先进性,需要多从用户视角思考审视技术方案的可行性。技术人员还应参与到技术推广和应用指导中,通过用户易于获得的渠道宣传图书馆的各种新式服务、新式设备,通过用户善于理解与接受的方式介绍如何使用新技术、新设备。建立便捷的用户交流平台,虚心听取用户建议,了解用户真实需求,不断完善各种新设备和应用系统,充分发挥新技术、新设备在提升图书馆工作和服务方面的效果。

5 高校图书馆技术馆员面临的问题及对策

技术部门的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各种问题的困扰,而最为主要的就是人才问题。针对高校图书馆技术馆

员发展中面临的几点共性问题,结合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实践,共同探讨技术类人才问题的解决之道。

5.1 选人与留人

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通常面临“招不到人”和“留不住人”两大人才困境。图书馆很难招到优秀的技术人才,而招到的技术人才经过锻炼成为部门骨干后又很难留在图书馆,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的发展过程中也面临这样的问题^[27]。早期,厦门大学图书馆技术岗位可以享受重点岗位津贴,因此馆内有钻研精神的年轻馆员会选择技术岗位,经过个人努力和部门培养,成为图书馆信息化建设中的支撑力量。随着学校整体待遇水平的提高,近几年也吸引了应届毕业生的加入。相比“招不到人”,“留不住人”更是一道难题。厦门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先后有10多位馆员离开图书馆,除去“待遇”这一图书馆无法自己决定的因素外,图书馆可以多在“感情留人、事业留人”上想办法。在感情上,厦门大学图书馆信息技术部经常组织外出参观学习、踏青秋游、集体观影等团队建设活动,通过多种方式增进团队成员间的了解,增强彼此间的信任,建立情感纽带。由于长期以来,技术部门都工作在二线后台,其服务保障的工作价值平时较少得到关注。而一旦出现故障,又往往给人以技术部门工作不到位的负面印象,久而久之成为技术部门无法承受的压力。在事业上,最好的方法是为馆员搭建个人展示的平台,使他们的工作得到馆领导和其他同事的认可,同时通过直接面向读者的服务,获得读者的肯定与表扬,使他们的工作价值得到正面评价、个人价值得到认可。

5.2 人员考评

人员考评是部门建设的重要工作之一,建立一种合理的考评体系是保证考评工作得到馆员认可的重要保障。技术部门工作内容繁杂,对于技术部门岗位的评价不能简单地以工作量作为唯一标准。厦门大学图书馆制定了馆员自评、同事互评、主管评价3个层次、“德、能、勤、绩”4个方面的综合考评体系。在此基础上,信息技术部针对“德、能、勤、绩”制定了更为细致的评分标准。客观公正的人员评价,能够帮助馆员更清楚地认识个人价值,反思自身不足,明确下一步的发展方向。同时通过对考评的优秀馆员实施奖励,也起到了激励的作用。

5.3 职业发展

高校图书馆信息技术部门馆员的职业发展一方面是通过传统的职称评定,另一方面则可以通过调换岗位从事其他工作。处在环境变化中的高校图书馆,新兴岗位随着需求应运而生,如学术交流与机构库建设馆员、数据馆员、新媒体运营馆员、服务推广馆员等。新兴岗位一般都会涉及到信息技术的应用,从事技术岗位的馆员,大都具有较强的学习钻研能力和挑战新事物的精神,可以适时地结合自身特点,发挥个人特长,谋求新的岗位。如软件开发工程师,就可以凭借其掌握的技能,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系统工程师也可以凭借工作经验积累,逐渐转型为系统架构师。工作的新鲜感是保持工作激情、防止职业倦怠的有效

方法,也是促进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的动力。

6 结语

在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基础的新一轮信息技术浪潮中,人工智能正在快速发展,智慧图书馆也正逐步从概念变为现实。面对未来,高校图书馆技术部门应以开放的心态,充分发挥其专业性,不断跟踪学习信息技术的发展变化,探索工作模式转变,发现新的用户需求,实践服务创新,与图书馆各项业务充分融合,联合各界力量勇挑重担,共同引领图书馆未来发展之路。

参考文献:

- [1] 孙一钢.融合、创新、引领——论信息技术在图书馆发展中的定位和作用[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15(3):1-5.
- [2] 范并思,胡小菁.论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的影响[J].图书馆,2000(1):12-17.
- [3] 刘炜,葛秋妍.从Web2.0到图书馆2.0:服务因用户而变[J].现代图书情报技术,2006(9):8-12,67.
- [4] 刘炜,周德明.从被颠覆到颠覆者:未来十年图书馆技术应用趋势前瞻[J].图书馆杂志,2015,34(1):4-12.
- [5] 郑宏.论图书馆自动化技术人员队伍建设[J].中国图书馆学报,1997(3):46-50.
- [6] 陈慧杰,夏云,张甲等.关于大学图书馆新信息技术应用及自动化系统发展的设想和建议(续)[J].大学图书馆学报,1998(1):1-5.
- [7] 李广建.信息化、网络化、自动化——信息技术部简介[J].图书情报工作,2002(6):21-22.
- [8] 王启云.图书馆信息技术部的建设[J].图书馆杂志,2003(1):33-35.
- [9] 张连分.美国大学图书馆的机构改革:以泽维尔大学图书馆和信息技术中心合并为例[J].图书馆建设,2009(2):89-91.
- [10] 钟戈.“大流通”服务模式下图书馆技术部的职能转换[J].科技情报开发与经济,2013,23(18):37-39.
- [11] LISA JANICKE HINCHLIFFE.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Research Libraries #CNI16S[EB/OL].[2017-09-01].<https://lisahinchcliffe.com/2016/04/13/infotech-in-research-lib/>.
- [12] DALE ASKEY.Finding a Way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Middle Lib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Leadership,and Culture[EB/OL].[2017-09-01].<https://doi.org/10.18665/sr.303501>.
- [13] 黄小敏.Bibliofile光盘及其在厦门大学图书馆西文编目中的应用简介[J].文献信息学刊,1995(2):44-46,35.
- [14] 全省高校图书馆自动化、网络化专题研讨会纪要[J].文献信息学刊,1994(4):1-3.
- [15] 沈迪飞.我所亲历的图书馆技术变革(1974—1998)[J].图书馆论坛,2016,36(9):52-61.
- [16] 崔晓西.我馆的电子文献信息部[J].大学图书馆学报,1996(3):59-60.
- [17] 黄国凡,萧德洪.厦门大学图书馆数字化建设回顾与展望[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3(5):53-55.
- [18] 杨巧云.高校图书馆建设刍议[J].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2):111-112,115.
- [19] 黄国凡.数字图书馆的组织结构和人力资源开发[J].现代情报,2004(1):110-111.
- [20] 江湍.厦门大学Library2.0研究与技术应用介绍[D].厦门:厦门大学,2008.
- [21] 肖琳.基于Web2.0的图书馆内部管理沟通:以厦门大学图书馆为例[J].贵图学刊,2013(3):50-52.
- [22] 黄国凡,肖铮.图书馆新媒体服务的实践与思考:以厦门大学图书馆为例[J].情报资料工作,2014(6):85-88.

(下转第80页)

· 工作研究 ·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现状调查与分析^{*}

易 红 王宁远

(重庆图书馆 重庆 400037)

摘 要: 公共文化机构建立法人治理结构是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相适应的体制机制改革。文章通过学术论文、政府官网、图书馆网站、新闻媒体、电话调查等渠道调查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现状,并以11家省级公共图书馆为研究样本,分别在职能定位、人员结构、理事长的产生方式、理事会与政府以及图书馆管理层三者关系等方面开展了积极探索。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面临的共同问题是:法人治理缺乏法制保障、理事会独立决策地位尚未落实、理事会管理运营“章程化”有待加强、理事会决策支撑体系不够完善。

关键词: 公共图书馆; 法人治理; 理事会

中图分类号: G251.6

文献标识码: A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Public Libraries

Abstract The establish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public cultural institutions is an institutional mechanisms reform adapted to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reform in public libraries in China through academic papers, government official websites, library websites, news media, telephone surveys and other channels. Positive explorations have been carried out in function orientation, personnel structure, election mode of council chairman an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vernment, council and library management, based on 11 provincial public libraries. At presen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in public libraries in our country confronts with the common problems as follows: corporate governance lacks legal protection, the council has no independent decision-making status, the management and operation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decisions-making support system is still not perfect.

Key words public library; corporate governance; council

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是图书馆工作管理模式的转变与创新,是政府、图书馆、社会组织机构以及公众等利益相关者,通过权利分配以及相互监督制约,共同参与图书馆事务管理,最终实现图书馆价值最大化、服务效能最优化和公众文化权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图书馆法人治理内部结构是由决策层、监督层和管理层三者形成的分权制衡的组织结构。理事会是

决策层的组织形式,享有重大事项决策权,也要对决策失误承担追究责任。管理层由图书馆馆长和副馆长组成,依照理事会决议独立开展管理工作,对理事会负责,定期向理事会报告工作^[1]。监事会组成人员一般由独立于执行层之外的人员组成,在单独设立监事会的图书馆,监事会对决策层和管理层进行监督,不单独设立监事会的图书馆则直接由理事会或理事会

^{*} 本文系重庆市“青年文化优才”培养计划项目“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模式研究”(项目编号:2016QNWHYC20)的阶段性成果。

下设的专门委员会执行监督职责^[2]。

1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现状

1.1 发展进程

2007年,中央编办和国家事业单位登记管理局选择山西、上海、浙江、广东、重庆5个省市面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的事业单位开展先行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工作。2010年,深圳图书馆、广州图书馆、山西省图书馆、重庆图书馆作为公益性图书馆机构,列入当地试点单位。2011年3月和7月,国家先后下发《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的指导意见》(中发〔2011〕5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分类推进事业单位改革配套文件的通知》(国办发〔2011〕37号),出台了9个配套文件,标志着公益性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从国家政策层面正式提上实践日程,法人治

理结构改革启动^[3]。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动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等组建理事会,吸纳有关方面代表、专业人士、各界群众参与管理。2014年,国家文化部又明确将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等10家公共文化机构列入国家公共文化法人治理结构改革试点单位名单。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和理事会建设,已进入以文化行政部门为主体进行大力推进的新阶段。

1.2 建立情况

重庆图书馆理事会秘书处通过学术论文、政府官网、图书馆网站、新闻媒体、电话调查等渠道,调查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现状。调查发现,截止到2016年12月,全国共有129家公共图书馆成立理事会(见表1),其中省级公共图书馆11家,市级公共图书馆75家,区县级公共图书馆43家。

表1 国内公共图书馆理事会成立概况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1	广东	深圳图书馆	2010.12	44	山东	烟台市图书馆	2015.10	87	河南	原阳市图书馆	2016.03
2	广东	宝安区图书馆	2013.07	45	青海	大通县图书馆	2015.10	88	天津	天津图书馆	2016.03
3	浙江	温州市图书馆	2014.06	46	广东	中山市图书馆	2015.10	89	内蒙古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2016.03
4	浙江	湖州市图书馆	2014.06	47	湖南	岳麓区图书馆	2015.11	90	海南	保亭县图书馆	2016.03
5	广东	广州图书馆	2012.07	48	河南	信阳市图书馆	2015.11	91	新疆	克拉玛依市图书馆	2016.03
6	广东	福田区图书馆	2014.07	49	浙江	平阳县图书馆	2015.11	92	甘肃	肃南县图书馆	2016.04
7	贵州	遵义市图书馆	2014.08	50	山东	滨州市图书馆	2015.11	93	山西	朔州市图书馆	2016.04
8	上海	上海图书馆	2014.10	51	山东	费县图书馆	2015.11	94	浙江	文成县图书馆	2016.04
9	安徽	合肥市图书馆	2014.10	52	内蒙古	锡林郭勒盟图书馆	2015.11	95	黑龙江	黑龙江省图书馆	2016.05
10	江苏	南京图书馆	2014.11	53	吉林	长春市图书馆	2015.11	96	宁夏	银川市图书馆	2016.07
11	广东	东莞图书馆	2014.11	54	内蒙古	阿拉善盟图书馆	2015.12	97	内蒙古	玉泉区图书馆	2016.07
12	四川	成都市图书馆	2014.11	55	江西	赣州市图书馆	2015.12	98	浙江	慈溪市图书馆	2016.07
13	广西	玉林市图书馆	2014.11	56	山西	太原市图书馆	2015.12	99	河南	许昌市图书馆	2016.07
14	江西	新余市图书馆	2014.11	57	山西	山西省图书馆	2015.12	100	广东	花都区图书馆	2016.07
15	内蒙古	呼伦贝尔市图书馆	2014.11	58	浙江	浙江图书馆	2015.12	101	浙江	苍南县图书馆	2016.08
16	内蒙古	包头市图书馆	2014.12	59	浙江	江东区图书馆	2015.12	102	四川	巴中市图书馆	2016.09
17	浙江	义乌市图书馆	2014.12	60	浙江	海曙区图书馆	2015.12	103	上海	嘉定区图书馆	2016.09
18	广东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2014.12	61	浙江	鄞州区图书馆	2015.12	104	江苏	连云港市图书馆	2016.09
19	广东	顺德图书馆	2014.12	62	浙江	宁海县图书馆	2015.12	105	浙江	镇海区图书馆	2016.09
20	湖北	湖北省图书馆	2014.12	63	浙江	奉化市图书馆	2015.12	106	江西	吉州区图书馆	2016.10
21	山东	威海市图书馆	2015.01	64	浙江	余姚市图书馆	2015.12	107	浙江	西湖区图书馆	2016.10
22	江苏	镇江市图书馆	2015.01	65	浙江	海宁市图书馆	2015.12	108	浙江	磐安县图书馆	2016.10
23	浙江	乐清市图书馆	2015.01	66	浙江	舟山市图书馆	2015.12	109	浙江	龙湾区图书馆	2016.11
24	浙江	萧山图书馆	2015.01	67	浙江	平阳县图书馆	2015.12	110	江苏	南通市图书馆	2016.11
25	湖南	湖南图书馆	2015.03	68	浙江	乐清市图书馆	2015.12	111	四川	自贡市图书馆	2016.11
26	山东	济南市图书馆	2015.03	69	浙江	德清县图书馆	2015.12	112	安徽	宁国市图书馆	2016.11
27	贵州	毕节市图书馆	2015.03	70	山东	昌乐县图书馆	2015.12	113	广东	端州图书馆	2016.11
28	上海	浦东图书馆	2015.03	71	广东	白云区图书馆	2015.12	114	甘肃	民乐县图书馆	2016.11
29	江苏	徐州市图书馆	2015.04	72	广东	四会图书馆	2015.12	115	安徽	天长市图书馆	2016.11

续表 1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序号	地区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30	广东	云浮市图书馆	2015.05	73	内蒙古	通辽市图书馆	2015.12	116	内蒙古	伊金霍洛旗图书馆	2016.11
31	内蒙古	巴彦淖尔市图书馆	2015.05	74	青海	海西州图书馆	2015.12	117	江苏	苏州图书馆	2016.12
32	内蒙古	鄂尔多斯市图书馆	2015.06	75	重庆	重庆图书馆	2015.12	118	山东	莱阳市图书馆	2016.12
33	贵州	贵阳市图书馆	2015.06	76	湖北	武汉图书馆	2015.12	119	山东	平原县图书馆	2016.12
34	广东	茂名市图书馆	2015.06	77	山东	临清市图书馆	2015.12	120	山东	黄岛区图书馆	2016.12
35	贵州	都匀市图书馆	2015.06	78	江苏	浦口区图书馆	2015.12	121	青海	格尔木市图书馆	2016.12
36	广东	高州市图书馆	2015.07	79	江苏	盐城市图书馆	2016.01	122	浙江	路桥区图书馆	2016.12
37	北京	东城区第一、第二图书馆	2015.07	80	湖南	株洲市图书馆	2016.01	123	甘肃	平凉市图书馆	2016.12
38	河北	保定市图书馆	2015.08	81	甘肃	临泽县图书馆	2016.01	124	安徽	马鞍山市图书馆	2016.12
39	山东	东营市图书馆	2015.09	82	浙江	江北区图书馆	2016.01	125	安徽	泗县图书馆	2016.12
40	内蒙古	阿巴嘎旗图书馆	2015.09	83	福建	莆田市图书馆	2016.02	126	广东	汕头市图书馆	2016.12
41	浙江	宁波市图书馆	2015.10	84	浙江	象山县图书馆	2016.02	127	陕西	印台区图书馆	2016.12
42	浙江	北仑区图书馆	2015.10	85	浙江	瑞安市图书馆	2016.03	128	四川	内江市图书馆	2016.12
43	浙江	长兴县图书馆	2015.10	86	河南	新乡市图书馆	2016.03	129	浙江	椒江区图书馆	2016.12

从区域分布看,全国共有28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成立了公共图书馆理事会(见表2),浙江、广东、山东和内蒙古列前三甲,共计71家,占统计总数的55%,其中浙江省以32家遥遥领先,理事会制度正逐步覆盖本省范围的各区县图书馆。可见东部沿海地区在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上的积极性更高、改革步伐更大。

表2 我国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区域分布

区域	数量/家	区域	数量/家
浙江省	32	青海省	3
广东省	17	湖北省	2
山东省	11	北京市	1
内蒙古自治区	11	重庆市	1
江苏省	8	天津市	1
安徽省	5	河北省	1
河南省	4	黑龙江省	1
甘肃省	4	吉林省	1
贵州省	4	陕西省	1
四川省	4	宁夏回族自治区	1
上海市	3	福建省	1
江西省	3	海南省	1
湖南省	3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1
山西省	3	广西壮族自治区	1

2 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特点

以全国11家省级公共图书馆的理事会为主要研究样本(见表3),分析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运行现状与特点。

2.1 职能定位

由于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在我国刚刚兴起才几年时间,理事会的一切运作都在试验探索之中,导致图书馆理事会的定位类型多样,既说明理事会的职能可以多样性,也说明理事会在定位上没有统一标准。目前存在的定位分别包括咨询机构、决策机构、决策和监督机构、议事和决策咨询机构以及议事、决策和监督机构,对涉及图书馆发展重大事项分别负有决策、监督、审议或咨询等职权。但就目前发展来看,决策与监督型理事会是主要的发展趋势,而单一的议事型和咨询型理事会将逐步被淘汰。此外,有部分图书馆在理事会之外单独成立监事会或者在理事会内部设立监事职务,对理事会的情况实行全面监督。

2.2 人员结构

公共图书馆建立理事会的重要目的,是为了吸纳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图书馆的管理与服务,因此,吸纳社会多方面人士参与组成理事会是一般通行的做法。目前,国内公共图书馆理事会的成员一般由3方面代表组成。一是政府部门代表;二是图书馆自身代表;三是社会人士代表,体现了理事会的代表性和决策时对各方利益的平衡。人员数量从7人至15人不等,在分配比例上,多采取三三制原则平均分配。东部沿海地区的图书馆理事会中,社会人士代表占多数,如浙江图书馆理事会的13名理事中,社会理事达到9人;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的13名理事中,社会理事达到8人,充分显示了社会力量参与办馆的积极作用。在产生方式上,主要包括任命、民主选举、推选和社会招募这4种方式或者4种方式相结合。目前,我国公共图

表 3 省级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及构成情况

序号	单位名称	成立时间	理事会类型	理事会组成	理事长产生方式	理事长人选
1	上海图书馆	2014.10	决策监督型	13 人（政府部门 4 人，馆方代表 3 人，社会人士 6 人）	市委宣传部任命	文化名人
2	南京图书馆	2014.11	决策监督型	14 人（政府部门 3 人，馆方代表 5 人，社会人士 6 人）	省文化厅任命	省文化厅副厅长
3	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	2014.12	决策监督型	13 人（政府部门 4 人，馆方代表 5 人，社会人士 4 人）	省文化厅任命	省文化厅公共文化处处长
4	湖北省图书馆	2014.12	决策监督型	15 人（政府部门 3 人，馆方代表 4 人，社会人士 8 人）	省文化厅任命	图书馆馆长
5	湖南图书馆	2015.03	议事决策型	11 人（政府部门 3 人，馆方代表 3 人，社会人士 5 人）	省文化厅任命	省文化厅副厅长
6	山西省图书馆	2015.12	决策监督型	13 人（政府部门 4 人，馆方代表 3 人，社会人士 4 人）	省文化厅任命	图书馆馆长
7	浙江图书馆	2015.12	决策监督型	13 人（政府部门 1 人，馆方代表 3 人，社会人士 9 人）	社会选举	文化名人
8	重庆图书馆	2015.12	决策监督型	15 人（政府部门 5 人，馆方代表 5 人，社会人士 5 人）	市文化委员会任命	业界专家
9	天津图书馆	2016.03	议事决策型	13 人（社会代表 4 人，馆方代表 4 人，政府部门 5 人）	市文化广播影视局任命	市文化广播影视局领导
10	内蒙古自治区图书馆	2016.03	议事监督型	13 人（政府部门 2 人，馆方代表 3 人，社会人士 8 人）	理事会选举	文化名人
11	黑龙江省图书馆	2016.05	决策监督型	15 人（政府部门 5 人，馆方代表 5 人，社会人士 5 人）	省文化厅任命	省文化厅副厅长

书馆理事会还是以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任命加上其他民主产生方式为主导形式，这和国外公共图书馆的理事会人员产生办法较为相似，充分体现了政府在下放决策监督权限之前，对放权对象的履职能力、专业水平、业界影响力、参与能动性等方面进行综合考量，为图书馆理事的高效履职提供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4]。此外，对于图书馆的管理层是否进入理事会，多数理事会将图书馆馆长或党委书记作为理事会的当然成员。

2.3 理事长的产生

理事长是理事会的最高负责人。目前已经成立的图书馆理事会理事长的产生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直接由文化行政主管部门任命；二是由理事会选举。理事长人选类型一般分为4种：一是文化主管部门的领导；二是图书馆馆长或党委书记；三是文化学者；四是企业家。政府任命机制产生的理事长多来自于文化行政主管部门即图书馆主办单位或者图书馆管理层，而以社会名流身份担任理事长多来自于推选、社会选举等民主产生机制。由此可见，社会公众期望公共图书馆理事会敞开大门，积极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图书馆建设与管理事务，充分保障社会各方主体利益，提升图书馆服务效能。

2.4 公共图书馆理事会与政府行政部门的关系

建立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制度的一个重要目的便是把行政主管部门对图书馆的具体管理职责交给理事会，由其进行决策和监督，使政府转变职能，从直接管理转向间接管理，从管微观转向管宏观，从行政

管理转向法治管理。国务院《关于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意见》明确指出：“理事会要接受政府监管，且理事会应有政府部门代表。”这表明，政府与公共图书馆理事会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政府对理事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政策引导、经费保障、行为监督，而不是通过行政手段直接干预理事会的决策行为，但理事会须按照一定的程序向政府报告工作并接受政府的监督。

2.5 公共图书馆理事会与管理层的关系

图书馆管理层由图书馆行政负责人及其他主要管理人员组成，负责图书馆的日常管理工作。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势必带来图书馆管理层的角色转变与图书馆体制机制的革新。国务院《关于建立和完善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的意见》中明确表述了理事会与图书馆管理层的关系，“管理层对理事会负责，按照理事会决策独立履行日常业务管理、财务资产管理和一般工作人员管理等职责，定期向理事会汇报工作。”因此，在理事会制度下，图书馆管理层应成为理事会决策的执行人，受理事会监督，并参与理事会的决策和议事，且根据理事会决议独立进行本单位的日常业务、财务、人员等的管理活动，而理事会不直接参与图书馆管理工作。

3 法人治理结构建设存在的问题与发展前瞻

3.1 法人治理缺乏法制保障

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借鉴于

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经验与实践,是一次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深刻变革。我国已经建立起制度完善的公司法人制度,例如1993年《公司法》的出台对企业的设立、组织、运营与终止等过程提供了基本的法律准则。新修订的《公司法》完善了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方面的规定,从根本上保障了公司法人治理制度的有效运行。我国公共图书馆由于是财政全额拨款的公益性事业单位,早期忽视了图书馆的法制建设,在《公共图书馆法》未颁布之前,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政府有关部门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配套衔接不到位,缺乏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立法层面依据,尤其缺乏政府在公共图书馆的管理体制、人事体制、财务体制等方面进行的相应改革,导致法人治理结构改革难以突破,理事会组建与运行流于形式。目前我国只有少数地方对公共图书馆实行法制化管理,法律保障力度明显不够。在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图书馆法律法规的滞后是制约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发展的主要原因^[5]。

3.2 理事会独立决策地位尚未落实

理事会是法人治理结构的核心,拥有工作过程中对整体的决定权。保障理事会独立决策的地位是建立法人治理的根本,是实现政府与公共图书馆之间“管办分离、政事分开”的必要条件。我国公共图书馆的法人治理结构分权制衡的框架结构没有从根本建立起来,理事会的决策权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甚至部分图书馆理事长直接由文化行政部门领导或者图书馆馆长担任。这一方面是为了维护作为公共图书馆举办者的政府部门的权益;另一方面和政府“简政放权、去行政化”管理的法人治理理念相互冲突,而且由图书馆领导担任理事长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法人治理结构中决策层与管理层相混淆。政府、图书馆与理事会之间权责模糊,理事会难以拥有真正的人事权和财政权^[6],这也是理事会独立决策地位难以保障的一大障碍。我国公共图书馆仍然推行现有的政府财政拨款体制和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体制,图书馆的人、财、物仍是政府全权掌握,政府不愿放权或者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要求其放权,导致理事会对图书馆的财政和人事决策权的实际缺失,使理事会很容易与图书馆外部的咨询委员会或内部的馆务委员会相提并论^[7]。

3.3 理事会管理运营“章程化”有待加强

所谓“章程化”,是说文化事业单位的管理和运

营要建立起基本的制度,如年度报告制度、信息公开制度、工作评价制度、社会监督制度等,管理、运营、监管都依规章制度进行,这也就是法人治理“依法进行”的含义^[8]。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在制度建设方面还处于起步探索阶段,比如,年度报告制度报告什么?信息公开制度公开什么?工作评价主体是什么?理事会决策失误怎么办?这些章程化建设还没有在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中达成共识,尤其是理事会决策失误时是否追责、如何追责、由谁追责等问题,在理事会独立决策地位落实之前更难实现。虽然理事会章程明确规定了理事长、理事的权利和义务,但某种程度上图书馆的理事有不带薪的荣誉性质,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和决策零失误的愿景,而没有相应的回报机制。各地方公共图书馆理事会建立运行至今,理事会鲜有履行否决权,也并未发生决策失误的惩处先例,可谓是章程中有惩无奖,实践中无惩无奖。法人治理的根本目的是追求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佳秩序和最佳效益,因此,相比于组织架构搭建,制度建设是更为根本、更为重要的事情^[8],尤其是如何保证理事会严格依照制度章程开展管理运营是未来公共图书馆制度建设需要深入思考和探索的方面。

3.4 理事会决策支撑体系不够完善

理事会制度的实质是为公共图书馆引入外部治理,借助不同领域的理事自身的影响力,多角度、全方位地思考问题,实现对公共图书馆决策的科学化。公共图书馆理事会通过公开招募、社会选举等方式吸纳社会理事,鼓励社会公众参与图书馆建设,使公共图书馆事务由图书馆内部单一决策转型为内外部共同参与决策,这也是国家对文化事业单位开展法人治理的明确要求之一。公共图书馆是专业化的服务机构,然而理事们并不都是图书馆学的专业人士,难以保证对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事务开展科学决策。针对这一现状,一方面可以借鉴国际上公共图书馆理事会的成功经验,即在理事会下设立专业委员会发挥决策的咨询顾问作用,通过完善的决策专业支撑体系确保理事会科学决策。另一方面,还可以加强对理事的履职培训,通过理事会专业知识服务平台,借助线上交流培训、信息推送等方式,加强公共图书馆理事的履职能力。此外,还可以对图书馆工作开展定期第三方独立评估,通过向理事会提交详细的评估报告,为理事行使决策职责提供客观科学的决策依据。

3.5 法人治理结构发展前瞻

随着国家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2017年9月,中央七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从改革目标、主要内容、配套措施、实施步骤等方面明确了改革框架体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推动文化事业发展,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完善文化管理体制。到2020年,我国省级和地市级公共图书馆将全面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力争在人事管理、收

入分配、经费保障、社会参与等方面大胆探索,开展体制机制改革并制定相关配套政策,推进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改革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落实理事会的监督决策地位。在未来几年必然是公共图书馆建立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的攻坚期。公共图书馆唯有建立产权清晰、责权明确、运行顺畅、决策科学、监督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才能完成向现代公益性事业组织的成功转变,才能真正构建起为大众提供高效优质服务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

参考文献:

- [1] 李松武.认真制定执行事业单位章程推进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建设[J].中国机构改革与管理,2013(7):97-99.
- [2] 蒋永福.论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J].图书馆学研究(理论版),2011(1):40-45.
- [3] 肖容梅.我国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建设现状与分析[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4(3):22-28.
- [4] 陈顺忠,黄一文,舒睿.国内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工作现状研究:重点基于公共图书馆的调查[J].图书馆杂志,2016(11):14-20.
- [5] 申庆月.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的法律依据研究[J].图书馆建设,2015(3):8-12.
- [6] 霍瑞娟.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现状调研及思考[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6(7):117-127.
- [7] 顾晓光,刘兹恒.图书馆实行法人治理结构的难点[J].图书馆杂志,2015(9):28-32.
- [8] 李国新.公共图书馆法人治理:结构·现状·问题·前瞻[J].图书与情报,2014(2):1-6.

作者简介: 易红(1978—),女,重庆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王宁远(1966—),男,重庆图书馆副馆长,重庆图书馆理事会副秘书长,研究馆员。

收稿日期: 2017-10-06

(上接第74页)

- [23] 黄国凡,龚晓婷,毕媛媛,等.高校图书馆暑期微博运营的实践与启示:以厦门大学图书馆为例[J].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15,25(1):44-47.
- [24] 程晓岚.厦门大学图书馆的“围·时光”营销实践与启示:以对IFLA国际营销奖高校图书馆的获奖项目分析为切入点[J].图书与情报,2016(5):62-69.
- [25] 芦晓.新形势下图书馆技术部职能的思考[J].贵图学刊,2008(2):58-60,57.
- [26] 肖铮,林奕纯,杨薇,等.高校图书馆创意迎新的策划、实施与效果评估[J].上海高校图书情报工作研究,2014,24(3):14-16.
- [27] 苏海潮.论高校数字图书馆的优先发展策略[J].大学图书馆学报,2002(4):15-18,90.

作者简介: 肖铮(1980—),男,厦门大学图书馆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数字图书馆;刘海伟(1973—),男,厦门大学图书馆高级工程师,研究方向为图书馆信息技术;黄国凡(1971—),男,厦门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图书馆新媒体服务。

收稿日期: 2017-11-06

· 工作研究 ·

嘉兴市图书馆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实践研究^{*}

程玉芳 董事强

(嘉兴市图书馆 浙江嘉兴 314001)

摘 要: 嘉兴市图书馆是国内最早几家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实践基地之一,其通过“快乐读写直通车学习体验营”项目开展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探索运用多感官教学、游戏等多元化教学方式为读写困难儿童开辟了有趣又有用的学习方法,帮助读写困难儿童克服读写恐惧,提升读写兴趣,提高读写技能,重建学习自信心。

关键词: 特殊群体;读写困难儿童;图书馆服务

中图分类号: G252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on Service Practice for Children with Dyslexia in Jiaxing Municipal Library

Abstract Jiaxing Municipal Library is one of the earliest public library practice bases in China to serve children with dyslexia. It serves children with dyslexia by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arning experience camp project of happy reading and writing. It explores the use of multi-sensory teaching, games and other diversified teaching methods to provide those children with funny, interesting and useful learning methods, and to help them with their fears for reading and writing, to improve their reading and writing interests and skills, and to rebuild their confidence in learning.

Key words special group; children with dyslexia; library service

1 嘉兴市图书馆开展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背景

读写困难,是对阅读和书写能力不良儿童的神经医学判定名词,是一种较常见的表现为阅读、书写等能力缺陷的神经综合症,是儿童学习障碍的主要类型,也是学生成绩欠佳的主要原因。简单来说,读写困难是指智力正常或超常但在阅读和书写能力落后于同龄人的一种现象。读写困难儿童在读写方面的困难容易被人忽略,甚至被老师和家长误认为是笨孩子、坏孩子,从而给他们造成严重的心理障碍,妨碍了对他们阅读兴趣的培养,甚至阻碍了儿童各方面能力的全面发展。他们需要图书馆提供特殊服务,帮助他们

克服读写困难,协助他们迈过图书馆的隐形阅读门槛。英国、美国以及北欧一些国家的公共图书馆都有为读写困难儿童开展相应的服务^[1-4],而目前我国公共图书馆开展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机构屈指可数。2014年在华南师范大学束漫教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公共图书馆为阅读困难儿童服务的理论、方法与对策研究》(项目编号:13BTQ006)的研究推动下,国内部分公共图书馆开始开展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实践活动,如广州市图书馆、东莞图书馆,等等。

嘉兴市图书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课题的实践基地之一,于2014年9月开始了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实践课程。课程宗旨是让读写困难成为一种读写快乐,让不爱阅读的孩子爱上阅读,让不会阅读的

^{*} 本文系浙江省图书馆学会2016年度立项资助学术研究课题“嘉兴市图书馆为特殊群体服务实践研究——以读写困难群体为例”(项目编号:Ztx2016 A-5)成果之一。

孩子学会阅读。截止到2016年8月,嘉兴市图书馆已经开展了6期70堂105课时的实践活动,共约100位有不同程度读写困难问题的儿童及其家长参加了实践体验课。其中,有5位儿童全程参与了6期课程,两年来在读写方面发生了很大变化。本文对嘉兴市图书馆的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方式方法进行了探讨研究,以期为更多公共图书馆开展特殊群体服务提供借鉴。

2 研究方法

本项目在实践探索中综合使用了访谈法、问卷调查法、观察法、对比法等实践方法。

2.1 访谈法

在前期准备工作中通过访谈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了解身边存在读写困难的儿童,将其作为实践课的招募对象。在活动过程中通过访谈参加活动的儿童家长,了解孩子参加活动前后的阅读成长情况。

2.2 问卷调查法

通过在一定范围内抽样,向市民发放1 000份调查问卷,了解全市存在读写困难儿童的情况、市民对读写困难的知晓情况以及对图书馆开展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需求和建议。本次调查对象有一般读者、学校老师和学生家长。在课程实践活动中,每期活动都会向参加活动的家长和儿童发放满意度(含建议和意见)调查问卷、(儿童读写情况)评估调查问卷。

2.3 观察法

在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图书馆发动志愿者全程参与活动记录儿童课堂表现的前后变化。在6期活动中,笔者和来自嘉兴学院和嘉兴职业技术学院的30名志愿者参与活动,观察儿童在活动中的表现,搜集家长、学生对课程的反馈和建议并及时调整课程内容。

2.4 对比法

每期活动前后都会通过同一内容试卷对儿童进行读写能力评估,比较儿童在参加活动前后的读写能力变化。

3 教学方法

3.1 引导——让不喜欢读写的儿童喜欢上读写

读写困难儿童由于天生对读写存在一定困难,

因此大多数人对读写不感兴趣。同时由于家长和老师对读写困难知识缺乏了解,一般认为读写困难儿童在阅读和书写上的缓慢是因为懒惰、笨拙等原因,对读写困难儿童常常采取责骂、批评的态度,致使读写困难儿童对读写产生厌倦、排斥心理。嘉兴市图书馆针对读写困难儿童开展的“快乐读写直通车学习体验营”项目则通过生动有趣、形式多样的阅读推广活动,运用体验式教学方法,寓教于乐,引导他们享受阅读的乐趣,感受阅读的魅力,从而接受阅读,热爱阅读并逐步形成主动阅读的意愿。在体验教学中综合运用了多感官教学法,充分调动儿童的视觉、触觉、听觉、嗅觉等,如游戏、舞蹈、说唱、绘本剧表演、影视作品赏析、彩色大字卡、沙盘写字、橡皮泥写字、拼字拆字游戏等。同时,将讲故事、交流读书体会、手工制作等活动也贯穿在体验课堂中。有趣的学习方法让读写困难儿童逐渐体验到阅读的快乐。以《走进果园》一课为例:老师把新鲜的水果蔬菜拿到教学现场,让孩子们观察它的色彩、形状,触摸它的软硬质感,感受它的重量、味道,用大字卡显示水果的汉字,让同学们很容易把实物和汉字结合起来,同时还用分组比赛的游戏方式组字、组词,增加了学习的趣味性。又如,用戏剧表演的方式演绎朗读经典绘本《一园青菜成了精》《我想有颗星星》《彼得兔》等,让读写困难儿童喜欢上读写。

3.2 训练——让不会读写的儿童学会读写

华东师范大学范并思教授指出,阅读推广包括读物的推广和阅读方法的推广^[5]。针对读写困难儿童开展的快乐读写直通车项目活动,由研究读写困难儿童的华南师范大学束漫教授作理论指导,由经过专业技能培训的本馆馆员具体负责活动项目的运作,由嘉兴市小学教学名师负责课程教学活动,嘉兴市职业技术学院和嘉兴学院的大学生志愿者作为观察员和助教,同时要求家长全程参与伴读。每期课程8~12节短课,约12~18个小时。运用各种好玩有趣的方式,在培养儿童读写兴趣的基础上反复强化训练儿童掌握读写技巧、学会阅读和书写。比如精选经典绘本故事、经典童谣、地方诗歌,让老师、家长、志愿者通过和孩子们角色扮演、唱诵、歌舞等方式反复领读;通过拆字拼字、彩色大字卡让儿童学会字体结构,便于记忆;通过展示钱币文、甲骨文等汉字实体或图片让儿童了解汉字的演变过程,使读写困难儿童逐渐掌握了

读写技巧,提高了阅读能力。

3.3 培养自信心——重建读写困难儿童的自信力

读写困难儿童由于学业不良,长期遭受家长责骂、老师歧视和同学嘲笑,与一般学生相比,自信心严重不足,孤独、自卑、胆小、害怕、退缩、厌学甚至逃学,对阅读和书写非常反感。要让读写困难儿童克服读写困难,重建阅读兴趣,就要培养孩子的自信心。

“快乐读写直通车学习体验营”活动特别注重儿童的参与、互动、体验,老师也多用积极关注和鼓励的方式推动孩子个性的良性发展和成长。小班体验课的形式,使每个参加活动的儿童都能够受到老师的关注,感受到老师对他的重视。在体验课上,每个孩子都有发言的机会,他们可以在座位上举手发言,也可以站到讲台上发言。在体验课中设计孩子的互动交流环节,如自我介绍、找朋友、拼字游戏等,也可以锻炼孩子的社交能力、融合能力。通过以上方法,逐步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让孩子感受到学习是有趣的,并在此基础上,让孩子慢慢尝试,从易到难,感受学习的乐趣和成功的喜悦。

4 项目活动实践社会效果分析

综合调查问卷、儿童课堂行为记录、跟踪访谈,总结家长和儿童反馈信息,在以下3方面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

(1) 提高了读写兴趣。从调查问卷开放性问题的部分、课堂留言簿、“快乐读写直通车学习体验营”家长微信群和QQ群以及家长朋友圈收集到的各类家长反馈信息可以看出,通过“快乐读写直通车学习体验营”的专项培训,读写困难儿童的学习兴趣有了很大

的提高。

(2) 掌握了学习方法。在读写困难儿童体验课中推广了适合读写困难儿童的特殊学习方法,如沙盘写字、角色扮演、拆字拼字游戏等,这些方法在活动之外得到继续应用。在调查反馈表中针对培训内容对孩子是否有帮助一项中,约93%的家长表示教学中展示的学习方法很实用。其中针对课程方法的评价统计(多选问题:参加本次课程中用到的什么方法比较实用?)60%的家长选择了拆字拼字游戏,角色扮演、彩泥沙盘白板写字、图卡游戏等各获得了40%的投票率。

(3) 树立了自信心。在开放式留言反馈信息中,很多家长认为在参加活动的过程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成长。一些孩子开始由胆怯、退缩变得胆大、主动,在学习及与同学交往中“自信心有增强”“敢于表现自己,能喜欢说话了”“与小朋友能和平相处,有合作的概念了”“综合素养有提升”。

5 结语

嘉兴市图书馆是国内最早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公共图书馆实践基地之一。在两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快乐读写直通车学习体验营”项目活动,实践探索了公共图书馆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的方式方法,传播了快乐读写的理念,拓展了公共图书馆为特殊群体服务的领域。目前本项目已经成为嘉兴市图书馆一个常规化的特别受欢迎的品牌活动,2016年荣获中国图书馆学会小学生阅读推广一等奖。如何进一步形成自己的特色、如何推动公共图书馆深化为读写困难儿童服务是需要继续探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 [1] 宗何婵瑞,宋双秀.加拿大高校图书馆“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12):51-55..
- [2] 田花蔓,束漫,王波.美国公共图书馆“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12):40-44..
- [3] 苏丽平,束漫.亚洲部分地区“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12):56-63..
- [4] 孙蓓,方家忠.北欧图书馆“阅读障碍症”群体服务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4,58(12):45-50.
- [5] 范并思.阅读推广与图书馆学:基础理论问题分析[J].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5):4-13.

作者简介:程玉芳(1976—),女,嘉兴市图书馆馆员;董事强(1967—),男,嘉兴市图书馆馆员。

收稿日期:2017-10-09

· 文献学研究 ·

《大正藏》与《嘉兴藏》中国佛教著述收录差异比较研究

王 蕾

(辽宁省图书馆 辽宁沈阳 110167)

摘 要:《大正藏》和《嘉兴藏》是汉文大藏经系统里特色鲜明、流传广泛的两部藏经。《嘉兴藏》在日本流传很广,是《大正藏》的间接祖本,也是众多校本之一,但《嘉兴藏》中丰富的中国佛教著述,并没有在《大正藏》中体现。文章阐述了两部藏经差异的原因:重视弘扬本国佛学、收录标准不明确、材料收集有局限以及人力财力的局限。

关键词:《嘉兴藏》;《大正新修大藏经》;中国佛教著述

中图分类号: G256

文献标识码: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ited Differences of Chinese Buddhist Writings Between *Taisho Canon* and *JiaXing Zang*

Abstract In the Chinese Tripitaka system, *Taisho Canon* and *JiaXing Zang* are two classics that are distinctive and widespread. *JiaXing Zang* is widely circulated in Japan. It is the indirect origin of *Taisho Canon* and one of many proofread editions. But many writings of Chinese Buddhist in *JiaXing Zang* are not included in *Taisho Canon*. The paper discusses reasons of differences: focus on promotion of the local Buddhism, the ambiguity of inclusion standard, the limitation of material collection and the limitation of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Key words *JiaXing Zang*; *Taisho Canon*; chinese buddhist writings

佛教在中国历经数世纪的本土化历程,教义思想都有了深广发展,中国僧众的佛教成就显著,著述丰富。随佛教东传,中国佛教著述也一并扩散。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直接开展,佛教随留学僧大量进入日本,随后中国赴日僧进一步推进传播,对日本文化产生深远影响。有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文化是由于佛教的流入而日趋兴盛的^[1]。随中国汉文大藏经的流入,日本也进行了汉文大藏经的编刊。《嘉兴藏》与《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分别是中国与日本历代编修的汉文大藏经中特点鲜明、创新突出的两部。两部藏经关系紧密,后者的形成既受前者影响,又有自己的特点。

1 《嘉兴藏》和《大正藏》概述

1.1 《嘉兴藏》的特点及对日流布

《嘉兴藏》又称《径山藏》,于明代万历时始刻,

至清代康熙时刻完,又在雍正至嘉庆时进行了补刻,总历时近230年。《嘉兴藏》是由民间僧俗信众募资刊印的,由紫柏大师发起,密藏道开实际主持刻藏。

《嘉兴藏》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我国收佛教典籍最多的汉文大藏经,尤其是大量收录中国僧人居士的佛教著述;二是改梵夹装为方册装,方便普及和流通。

《嘉兴藏》没有一次发行过全藏,多个收藏单位的藏本都是不同时期请购或汇集的,全藏没有统一的目录。同时因为随请随刻、允许“附藏流通”,所以《嘉兴藏》在收录品种上可说是中国历史上至清嘉庆为止最为丰富的,其中有很多稀见的中国僧人居士著述。2008年北京民族出版社重辑出版《嘉兴藏》(后文统称重辑《嘉兴藏》)。主持重辑者韩锡铎先生在全国征集各个收藏单位的目录,集全征异,收集的品种丰富,尤其是对复杂的中国本土著述搜罗较全,虽有遗漏,但也是之前学界所无。本文即以此本为考察对象进行研究。

《嘉兴藏》输入日本的部数有七部和九部两种说法。部数之多反映了《嘉兴藏》在日流布之广泛。单经流传暗合《嘉兴藏》在中国“随请随刻”“附藏流通”的现象。《嘉兴藏》流传到日本主要通过3个途径：一是随商贸往来流入；二是日本访华僧采购；三是中国僧人携藏渡日。明后期中日贸易往来频繁，通过中国商船，很多佛教典籍输送到了日本。日本大量访华僧在中国活动时，采购了很多佛籍回国，在日本流传的一些单经推测应是由此而来。清顺治年间，临济宗高僧隐元隆琦东渡日本，将《嘉兴藏》已刻成刷印流通的部分带到日本（以正藏为主）。随后隐元禅师在日本创建黄檗宗，他的弟子日本僧人铁眼道光就据隐元禅师带来的这部《嘉兴藏》翻刻了一部汉文大藏经《黄檗藏》，也称《铁眼藏》，并依照《嘉兴藏》，在卷末也附有施资人姓名、祈愿内容、刻经者姓名等的刊记。频繁的文化商贸交流中，《嘉兴藏》里的中国佛教著述很多随之流入日本。《嘉兴藏》对日本大藏经刊行系统的影响不可避免，20世纪初《大正藏》的编修就把《嘉兴藏》作为主要校本之一。

1.2 《大正藏》的特点与受《嘉兴藏》的影响

《大正藏》是由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小野玄妙等主持编辑的一部铅印本汉文大藏经，从大正十一年（1922年）至昭和九年（1934年）历时11年完成。因为资料丰富、收经数量居冠，该藏出版后为学术界广泛利用，普及极广。全藏100册，收录有印度、中国、日本、朝鲜的汉文佛教典籍。全藏总计收经3 493部，13 520卷^[2]。其中正编55册（1—55册），续编30册（56—85册），图像部12册，《昭和法宝总目录》3册。33—55册主要收录了中国僧人居士的著述，中间杂有朝鲜、日本的著述，56—85册为日本僧人的著述。

《大正藏》与之前日本编修的大藏经不同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编辑分类一改以往大藏经体例（大小乘、西土撰述、此土撰述），改依佛学思想的历史发展和典籍演变、流传的先后进行排序；二是收书有特色，首先品种历代最多，其次古逸佛典收录很多，有很多中国已佚的隋唐时高僧大德的著述，最后是大量收录日本佛教著述。

《嘉兴藏》在日本流布已久，《黄檗藏》及之后《卮字藏》《卮续藏经》莫不受其影响。《嘉兴藏》也是《大正藏》的重要校本。近期关于《大正藏》的底本，研究学界有新的见解。原来普遍认为《大正藏》

的底本是《高丽藏》（正藏部分），近年日本学者永崎研宣认为《大正藏》的底本并非《高丽藏》而是《频伽藏》。《频伽藏》是民国初年编修的铅印本大藏经，1909年至1913年出版。《频伽藏》是以《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为底本排版，删去了部分日本著述。追本溯源，《大日本校订缩刻大藏经》依《黄檗藏》排印，《黄檗藏》是《嘉兴藏》的覆刻^[3]。由此可说《嘉兴藏》是《大正藏》的间接祖本。祖本、校本双重影响下，两藏在中国佛教著述部分上收经数量及品种上差异却很大。

2 《大正藏》与《嘉兴藏》收录中国佛教著述的数量与品种差异

2.1 数量、品种的差异

（1）数量上，《大正藏》所收中国佛教著述共424种（仅以正编统计，不含古逸部、疑似部即敦煌出土的逸典或伪经）。重辑《嘉兴藏》中收录中国佛教著述有832种。重辑《嘉兴藏》收录的中国佛教著述在统计时，如《阅经》十二种、《云栖法汇》二十五种等均按12种、25种统计。盖因有的书零种《大正藏》中有收，如《云栖法汇》二十五种中《往生集》，《五家语录》中的灵佑禅师、慧寂禅师、文益禅师三家语录。另外排除了杂入其间的3部高丽僧人著述，2部译经。从数量统计上看，《嘉兴藏》收录的中国佛教著述是《大正藏》的近2倍。

（2）品种上，《大正藏》收录多以隋唐宋元时僧人著述为主，其中很多为国内失传而在朝日两国流传的珍稀典籍。由东晋始至宋，《大正藏》中有240多种为《嘉兴藏》所缺，如隋三论宗创始人吉藏大师的著述22种、唐唯识宗窥基大师著述15种、唐华严宗法藏法师15种等。这些典籍对中国佛教著述是很好的补充。《大正藏》不足在对明清僧人居士的著述收录很少，《嘉兴藏》续藏、又续藏中这一类收录则最为丰富。

《嘉兴藏》中国佛教著述中有639种为《大正藏》缺辑，明清僧人居士的著述就占了90%。其中不乏各宗派里的高僧和著名的学士、政治人物。有一种无收者，如明代四大高僧中的德清、真可，明末僧人道开，明末清初的曹洞宗僧人弘赞，明代居士钱谦益、僧人姚广孝等。略举几例具体如下。

德清：续藏中的妙法莲华经通义七卷、憨山老人梦游集四十卷、憨山老人梦游全集五卷、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二卷；又续藏中的庄子内篇注四卷。

真可：续藏中的紫柏老人集十五卷、紫柏尊者别集四卷附录一卷。

道开：密藏开禅师遗稿二卷（续藏）。

姚广孝：道余录一卷（续藏）。

有收录不全者，如明四大高僧中的智旭、株宏，清初临济宗高僧道忞。举例如下。

智旭：续藏中的相宗八要直解八卷、佛说孟兰盆经新疏一卷、藕益三颂一卷、周易禅解十卷，法华堂四问并答一卷，净信堂初集八卷；又续藏中的阅藏知津四十四卷目录四卷、毗尼后集问辩一卷、梵室偶谈一卷、灵峰藕益大师宗论十卷等。

株宏：又续藏中的竹窗随笔三卷，拾遗中的云栖法汇二十五种。

道忞：续藏中的弘觉忞禅师北游集六卷、天童弘觉忞禅师语录二十卷；又续藏中的布水台集三十二卷。

这些或为禅宗高僧，或是著名政治人物，其著述的研究价值很高。对比可见，两部藏经收录著述侧重点不同。

2.2 同品种内容差异

《大正藏》与《嘉兴藏》收录的同品种佛经在内容上有差异，内容编次不同。如唐释匡真禅师的著述，在《大正藏》47册诸宗部中收的是《云门匡真禅师广录》三卷（简称《广录》），《嘉兴藏》是在续藏中收的《云门匡真禅师语录》三卷（简称《语录》），同为宋释守坚编，收录的都是匡真禅师生平行实。《广录》的体例是三卷：卷上对机，卷中实中语要、垂示代语，卷下勘辩、游方语录、遗表、遗诫、行录并请疏。《语录》的体例是三卷：卷一机缘、示众，卷二实中语要、垂示代语，卷三垂示代语。整体内容上《广录》多出遗表、遗诫、行录并请疏的内容。两经其他内容文字基本相同，但编次不同。如《语录》中的“机缘”分拆入《广录》中的“勘辩”“游方语录”中，《语录》中“示众”的内容在《广录》中列入“对机”中。这应该是匡真禅师的著述有过重新的汇编整理，而《大正藏》因为用的本子有新的、后出的，所以出现了同品种佛经在《大正藏》中体现的内容更为丰富、编次有差异的情况。

内容含量上例如《大慧普觉禅师语录》三十卷，《大正藏》收在诸宗部中，《嘉兴藏》收在正藏中，千字文用字为“说、感、武”。比较《大正藏》与《嘉兴藏》二书版本，《嘉兴藏》多了宋释祖咏编的《大慧普觉禅师年谱》一卷。《大慧普觉禅师年谱》的内容丰富可以独立成书^[4]。在重辑《嘉兴藏》中，便将《年谱》单列一种。

以这两个现象对比看，因为《大正藏》校本很多，采用新的、内容丰富的本子可以理解，但是《嘉兴藏》中辑辑的内容更为丰富的僧人著述却没有采用，理念产生矛盾，令人费解。

经上述考察，《嘉兴藏》流入日本多年，最为显著的特点却并未被《大正藏》的编辑所吸收，中国佛教著述大量失辑。早于《大正藏》的《已续藏经》中已经收录大量的明清僧人著述，可见不是流传的原因。

3 差异原因分析

日本学者干泻龙祥在《大正新修大藏经之新修意义与经纬》中有提及《大正藏》的编纂原则：①以丽、宋、元、明四藏及日本古写经、敦煌文献进行校对；②对校梵、巴原典；③打破传统的大藏经结构体例，按照学术原则重新分类，以反映佛典思想的发展与文献的变迁；④增收敦煌文献、日本古写经、续藏中的优秀典籍及日本诸宗要典。从这四原则可见《大正藏》编纂的重点有三：一文本校勘，二建立新的大藏经结构体例，三收录日本佛教典籍。对应编纂的背景和重点我们可以分析出《大正藏》失辑大量中国佛教著述的原因。

（1）重视弘扬本国佛学。《大正藏》收录日本著述丰富，在续编的56册至84册中计有500余种。从《大正藏》编修背景可见这一倾向。高楠顺次郎、渡边海旭等人也都曾留学西方，时值西方佛教研究“蔚成热潮”，这些留学西方的日本学者将这股研究热潮带回，相信这里也有对本国佛教著述整理和丰富研究的强烈意愿在内。这在前文第四条原则中也充分体现出来。在日本编修者们侧重本国佛学著述这一思想指导下，除传统经典正常收录外，中国佛教著述体量变小，侧重收录隋唐以来在中国佚失而日本续存的典籍以及敦煌文献。

(2) 收录标准不明确。这个问题方广钊先生有过阐述。方广钊先生指出,《大正藏》在正藏部分就出现很多重要典籍没有收录,在众多校本大藏经中收录的许多经典,《大正藏》也没有收录。而却又收录了历代大藏经没有收录的典籍,当然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在中国佚失的^[5]。可见,无论是在继承前藏经典方面还是补入新入藏典籍方面,标准均不一致,有矛盾。《嘉兴藏》收经原则很明确,一是继承前代经典,二是大量收录之前未入藏的中国佛教著述。

这种模糊的标准在《大正藏》的“中国撰述部”中是有反映的,如明株宏的著述。《大正藏》只收了《净土疑辩》一卷、《禅关策进》一卷,像《嘉兴藏》中所收株宏的《云栖法汇》和展现其佛学思想的晚年著述《竹窗随笔》都没有纳入《大正藏》中。《大正藏》中收禅宗各家著述均为宗派创始者、二代或发扬宗派的名僧的重要著述,如曹洞宗的悟本禅师语录、良价禅师的语录,临济宗黄龙派创始僧慧南的语录等,但是禅宗的知名著作《正法眼藏》、临济高僧晓莹的《罗湖野录》、临济黄龙派慧洪的《石门文字禅》等又都缺录。这种对经典选择的矛盾之处很多。

(3) 材料收集有局限。《频伽藏》凡例中言“本藏初议,原欲广搜罗明藏未收诸作,汇辑校印,编为续藏……顾以从事之际,适遇中华光复,兵火遍布南北,故规定之程序,因之受其顿挫。又以人事之不

齐,印刷工厂之易主,纷纭斜射,皆为宿谋所未及。故不得已暂将初意欲增入者,悉行搁置,以俟续藏之刊。”^[6]说明作为底本的《频伽藏》有很多品种还未及刊入,这些待刊入“续藏”中的佛经不免被《大正藏》遗漏。《大正藏》还有很多重要的大藏经版本没有收集到,如《赵城金藏》《磧砂藏》《龙藏》等,这就错漏了其中很多中国佛教著述^[7]。《嘉兴藏》单经在日流传,这一类单经多为中国僧人著述,也没有列进《大正藏》收集范围内。再有《嘉兴藏》续藏、又续藏过于复杂,在国内已是散逸众多。重辑《嘉兴藏》中就多列出了一个“拾遗”部分,还有36种待访书目。这些著述流入日本后情况复杂,除非进行专项搜集,否则遗漏是必然的。

(4) 受人力、财力局限。《大正藏》校勘精密详实,搜罗众多古今校本,有宋《资福藏》、元《普宁藏》、明《嘉兴藏》、隋唐写经、天平古写经、敦煌文献,还有梵文、巴利文。并且单独辟有一校勘栏,将底本与其他各本藏经校出的字句差异,都标注于此栏内,同时标注梵文、巴利文拼音。一种经典需要进行多个版本的校勘,再进行差异标注,这样校勘的工作量是巨大的,需要的人力与财力也是巨大的。《大正藏》编辑在当时二三十年代已是举全日本佛教界之力进行,但仍然遗漏众多经典。如果把品种复杂、数量众多的中国佛教著述全部列入校勘工作之中,私认为在当时的环境下已是能力范围之外了。

参考文献:

- [1] 严绍璁.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20-21.
- [2] 李富华,何梅.汉文佛教大藏经研究[M].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622.
- [3] 方广钊.略谈《径山藏》的历史地位[C]//中国杭州径山禅寺.刻本大藏经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径山藏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径山禅寺,2015:153.
- [4] 蓝吉富.佛教史科学[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7:21.
- [5] 方广钊.随缘做去 直道行之——方广钊序跋杂文集[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71-72.
- [6] 频伽精舍校刊大藏经总目·凡例[M].北京:中国图书公司,1913:14.

作者简介:王蕾(1980—),女,辽宁省图书馆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为古典文献整理。

收稿日期:2017-07-20

· 文献学研究 ·

《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疑误辨析

龙坡涛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是研究五代历史最基本的史料之一。但是宋人欧阳修、薛居正修撰《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时因种种条件的限制,加之史书在流传或刻板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故两部史书中讹误之处不免存在。笔者就20余处疑误略加考证,以期为研读和运用《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者提供借鉴。

关键词:《新五代史》;《旧五代史》;疑误

中图分类号: G256.3

文献标识码: A

Discriminate the Suspected Errors in the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bstract The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re the most basic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studying the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However, errors were unavoidable in these two history books due to various limitations during the writing process of The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Ou yangxiu and 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by Xue Juzheng, as well as the mistakes made in circulation or carving.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makes research on more than 20 suspected errors of the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he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cholars who study and use them.

Key words *New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Old history of the five dynasties*; suspected errors

《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比较全面、系统地反映了五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的状况,内容丰富,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是治史者必读和参考之书。笔者在阅读和运用《新五代史》与《旧五代史》时发现了相关记载的疑误之处,本文就其所载20余处疑误略加分析,权为引玉之砖,以求正于方家。

《新五代史·梁太祖纪》载:“都统王铎承制拜温左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天子赐温名全忠。”^{[1]2}《旧五代史·梁太祖纪》亦载:“(中和二年)‘九月,帝遂与左右定计,斩伪监军使严实,举郡降于重荣。重荣即日飞章上奏,时僖宗在蜀,览表而喜曰:‘是天赐予也。’乃诏授帝左金吾卫大将军,充河中行营副招讨使。”^{[2]3}

按:“左金吾卫大将军”有可商榷之处。据《新唐书·僖宗纪》载:“(中和二年)‘九月丙戌,黄巢将朱

温以同州降。己亥,温为右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3]274}《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五载:“(中和二年十月)‘以朱温为右金吾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4]8398}可见,《新唐书》《资治通鉴》所载与《新五代史》《旧五代史》不同,是为“右金吾(卫)大将军”,故我们在征引此处文献分析问题时一定要有所辨析。

《新五代史·梁太祖纪》载:“(文德元年)‘三月庚子,僖宗崩。’”^{[1]4}

按:“三月庚子”疑误。据《旧唐书·僖宗纪》载:“(文德元年)‘三月戊戌朔,正殿受册。庚子,上暴疾。壬寅,大渐。癸卯,宣制立弟寿王杰为皇太弟,勾当军国事。是夕,崩于武德殿,圣寿二十七,群臣上谥曰惠圣恭定孝皇帝,庙号僖宗。’”^{[5]729-730}《新唐书·僖宗纪》载:“(文德元年三月)‘壬寅,疾大渐,立寿王杰为皇太弟,知军国事。癸卯,皇帝崩于武德殿,年

二十七。”^{[3]280-281}《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七载：（文德元年三月）“己亥，上疾复作，壬寅，大渐。皇弟吉王保，长而贤，群臣属望。十军观军容使杨复恭请立其弟寿王杰。是日，下诏，立杰为皇太弟，监军国事……癸卯，上崩于灵符殿。”^{[4]8496-8497}从上述记载不难发现，文德元年三月庚子，唐僖宗当是“暴疾”，而非驾崩。故“庚子”疑误，当为“癸卯”。

《新五代史·王景仁传》载：“末帝立，以景仁为淮南招讨使，攻庐、寿，军过独山，山有杨行密祠，景仁再拜号泣而去。战于霍山，梁兵败走。”^{[1]271}

按：“霍山”疑为“霍丘”。吴缜《五代史纂误》卷上载：“今按杨隆演世家，乃是徐温与景仁战于霍丘，非霍山也。案薛史及《通鉴》并作霍丘。”^{[6]16}《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九载：（乾化三年）“十二月，吴镇海节度使徐温、平卢节度使朱瑾帅诸将拒之，遇于赵步。吴征兵未集，温以四千余人于景仁战，不胜而却……吴兵既集，复战于霍丘，梁兵大败……霍丘守将朱景浮表于木，徙置深渊……吴人聚梁尸为京观于霍丘。”^{[4]8899-8900}《旧五代史·王景仁传》载：“末帝即位，复用为淮南西北面行营招讨应接使，以兵万余人伐寿州，至霍丘接战，案：欧阳史作战于霍山，《通鉴》从薛史。《旧五代史考异》擒贼将袁藁、王彦威、王璠等送京师。”^{[2]365}故“霍山”疑误，当为“霍丘”。

《新五代史·周德威传》载：“天祐七年秋，梁遣王景仁将魏、滑、汴、宋等兵七万人击赵。”^{[1]296}

按：“天祐七年秋”疑为“天祐七年冬”。《五代史纂误》卷中载：“今按天祐七年，即梁开平四年也。以梁太祖纪、唐庄宗纪、王景仁王镒传校之，皆是开平四年冬十一月，独此传以为秋。误也。”^{[6]17}《五代会要》卷十“月蚀”条载：“开平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夜，先是，司天奏：‘是日月蚀，不宜用兵。’时王景仁方总大军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为后唐庄宗大败于柏乡。”^{[7]174}《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七载：（开平四年）“十一月，己丑，以宁国节度使、同平章事王景仁充北面行营都指挥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勍副之，以李思安为先锋将，趣上党。寻遣景仁等屯魏州，杨师厚还陕。”^{[4]8847}因此，从上述记载不难发现，“天祐七年秋”疑误，应为“天祐七年冬”。

《新五代史·王朴传》载：“显德三年，征淮，以朴为东京副留守。还，拜户部侍郎、枢密副使，迁枢密使。四年，再征淮，以朴留守京师。”^{[1]389}

按：“显德三年”王朴迁枢密使疑误，应为“显德四年”。《新五代史·周世宗纪》载：（显德四年）“秋八月乙亥，李谷罢，王朴为枢密使。”^{[1]143}《旧五代史·周世宗纪》载：（显德四年八月）“以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为枢密使、检校太保。”^{[2]1811}《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三载：（显德四年八月）“以枢密副使、户部侍郎王朴检校太保，充枢密使。”^{[4]9703}故“显德三年”疑误，当为“显德四年”。

《新五代史·张文蔚传》载：“昭宗迁洛，拜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424}

按：张文蔚拜相在“昭宗迁洛”似误，当在唐哀宗朝。《新唐书·哀帝纪》载：（天祐二年三月）“戊寅，独孤损罢。礼部侍郎张文蔚同中书门下平章事。”^{[3]303}《旧唐书·哀帝纪》载：（天祐二年三月）“以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文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5]790-791}《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五载：（天祐二年三月）“以礼部侍郎河间张文蔚同平章事。”^{[4]8760}故张文蔚拜相在唐哀宗朝，非昭宗迁洛之时。

《新五代史·李茂贞传》载：“光启元年，朱玫反，僖宗出居兴元。”^{[1]487}

按：“光启元年”疑误。《新唐书·僖宗纪》载：（光启二年正月）“戊子，如兴元。癸巳，朱玫叛，寇凤翔。”^{[3]277}《旧唐书·僖宗纪》载：（光启）“二年春正月辛巳朔，车驾在凤翔……癸巳，朱玫引步骑五千至凤翔。令孜闻邠州军至，奉帝入散关，令禁军守灵壁。玫至，禁军溃散，遂长驱迫驾至尊途驿。嗣襄王煊疾，为玫所得。”^{[5]723}《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六载：（光启二年正月）“萧遘因邠宁奏事判官李松年至凤翔，遣召朱玫亟迎车驾，癸巳，玫引步骑五千至凤翔……车驾才入散关，朱玫已围宝鸡。石鼻军溃，玫长驱攻散关，不克。嗣襄王煊，肃宗之玄孙也，有疾，从上不及，留遵涂驿，为玫所得，与俱还凤翔。”^{[4]8451-8453}故“光启元年”疑误，应为“光启二年”。

《新五代史·刘守光传》载：“匡威为弟匡侔所逐，仁恭闻乱，乃拥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关，战败，奔晋、晋以为寿阳镇将。”^{[1]475}《新五代史·高行周传》载：“（高）思继兄弟皆以武勇雄于北边，为幽州节度使李匡威戍将。匡威为其弟匡侔所篡。”^{[1]620}

按：“匡侔”疑误，当为“匡筹”。《新唐书·景镈传》载：“俄而匡威为弟匡筹所逐，镈德其助已，迎而

馆之……明日，谥以礼敛匡威，素服哭诸廷，遣使告匡筹。匡筹怒，移书诘兄所以死状，表天子请讨谥，诏止之。”^{[3]5964}《旧唐书·昭宗纪》载：（景福二年）“是月（三月），幽州节度使李匡威弟匡筹据幽州，自称留后，以符追行营兵，兵皆还幽州。”^{[5]749}《文献通考·封建考》载：“李全忠，范阳人，为牙将，攻可举，杀之，为留后，拜节度使。卒，子匡威领留后，进为使。后为弟匡筹所逐，奔赵，谋取王谔，赵人杀之。匡筹，既逐兄匡威，自为留后，诏授节度使……李匡筹逐其兄，戍卒推仁恭趋幽州，匡筹逆战，败之，仁恭乃奔太原。李克用用其计攻匡筹，取幽州，表仁恭为节度使。”^{[8]7559}《资治通鉴》卷二百五十九载：“李匡威之救王谔也，将发幽州，家人会别，弟匡筹之妻美，匡威醉而淫之。二月，匡威自镇州还，至博野，匡筹据军府自称留后，以符追行营兵。”^{[4]8560-8561}“李匡筹奏谥杀其兄，请举兵复冤。诏不许。”^{[4]8563}故“匡俦”疑误，当为“匡筹”。

《新五代史·汉家人传》载：“邠等死，周高祖起兵向京师，慕容彦超败于刘子陂，帝欲出自临兵，太后止之曰：“郭威本吾家人，非其危疑，何肯至此！”^{[1]220}

按：“高祖”疑误，应为“太祖”。《五代史纂误》卷上载：“今按周本纪，郭威庙号太祖，今呼高祖误。”^{[6]13}《十七史商榷》卷九十八载：“《汉家人传·高祖皇后李氏传》‘周高祖起兵向京师’，当作‘周太祖’。”^[9]《旧五代史·周太祖纪》载：（显德元年）“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谥曰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号太祖。四月乙巳，葬于嵩陵。”^{[2]1750}《五代会要》卷一“帝号”条载：“周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讳威……谥曰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号太祖。”^{[7]7}《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载：（显德元年四月）“乙卯，葬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于嵩陵，庙号太祖。”^{[4]9641}故从上述记载不难发现，郭威庙号太祖，“高祖”似误，应为“太祖”。

《新五代史·司天考》载：“天成元年三月，恶星入天库，流星犯天棓。”^{[1]795}

按：“恶星”疑误，当为“客星”。《新五代史·唐太祖家人传》载：“明年三月（同光四年三月），客星犯天库，有星流于天棓。占星者言：‘御前当有急兵，宜散积聚以禳之。’宰相请出库物以给军，庄宗许之，后不肯，曰：‘吾夫妇得天下，虽因武功，盖亦有天命。命既在天，人如何！’”^{[1]71}《旧五代史·唐庄宗纪》载：（同光四年三月）“时知星者上言：‘客星犯天库，宜

散府藏。’又云：‘流星犯天棓，主御前有急兵。’”^{[2]543}同光四年也即天成元年（926年）。故“恶星”疑误，当为“客星”。

《新五代史·职方考》载：“潞州，唐故曰昭义。梁末帝时属梁，改曰匡义，岁余，唐灭梁，改曰安义。晋复曰昭义。”^{[1]830}

按：“晋复曰昭义”疑误，潞州复名昭义当在后唐长兴元年。据《五代会要》卷二十四“诸道节度使军额”条载：“潞州。梁龙德三年，改为匡义军节度，以李继韬归顺故也。后唐同光元年，复为安义军。至长兴元年三月，复旧名昭义军。”^{[7]383}《太平寰宇记·河东道》载：“潞州，上党郡。今理上党县……乾元元年改为潞州大都督府。本昭义军节度，梁龙德三年改为匡义军，以李继韬归顺故也。后唐同光元年改为安义军，长兴元年依旧名昭义军。”^[10]《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七载：（长兴元年三月）“复以安义为昭义军。”^{[4]9166}《文献通考·舆地考》载：“潞州……后唐改安义军，俄复为昭义军。”^{[8]8578-8579}故“晋复曰昭义”疑误，潞州复名昭义当在后唐长兴元年。

《新五代史·职方考》载：“五代之际，外属之州，扬州曰淮南，宣州曰宁国，鄂州曰武昌，洪州曰镇南，福州曰武威。”^{[1]830}

按：“武威”疑误，当为“威武”。钱大昕在《廿二史考异·五代史》指出：“福州曰武威。‘武威’当作‘威武’。”^[11]但未给出相关证据，略显不足。《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载：（乾宁三年）“九月，庚辰，升福建为威武军，以观察使王潮为节度使。”^{[4]8613}《新五代史·王审知传》载：“唐以福州为威武军，拜审知节度使，累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琅琊王。”^{[1]956}《旧五代史·王审知传》载：“审知自称福建留后，表于朝廷。唐末，为威武军节度、福建观察使，累迁检校太保，封琅琊郡王。”^{[2]2087}《新唐书·方镇表》载：（乾宁四年）“升福建都团练观察处置使为威武军节度使。”^{[3]1926}故“武威”疑误，当为“威武”。

《旧五代史·唐庄宗纪》载：（天祐七年）“十二月丁巳朔，梁祖闻帝军屯赵州，命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韩勅为副，相州刺史李思安为前锋，会魏州之兵以讨王谔。”^{[2]425}

按：“十二月丁巳朔”疑误。据《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载：（开平四年十一月）“以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充北面行营都招讨使，潞州副招讨使韩勅为副，相

州刺史李思安为先锋使。时镇州王熔、定州王处直叛，结连晋人，故遣将讨之。”^{[2]106}《五代会要》卷十“月蚀”条载：“开平四年十一月十四日夜，先是，司天奏：‘是日月蚀，不宜用兵。’时王景仁方总大军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为后唐庄宗大败于柏乡。”^{[7]174}《新五代史·梁太祖纪》载：（开平四年）“冬十一月己丑，宁国军节度使王景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以伐赵。赵王王熔、北平王王处直叛附于晋，晋人救赵。”^{[1]22}开平四年十一月己丑是为该月三日。故“十二月丁巳朔”疑误，应为“十一月”。

《旧五代史·周太祖纪》载：（显德元年）“二月甲子，太常卿田敏上尊谥曰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庙号太祖。四月乙巳，葬于嵩陵。”^{[2]1750}

按：“四月乙巳”（显德元年四月甲辰朔，乙巳日是初二）疑误。据《新五代史·周世宗纪》载：（显德元年）“夏四月乙卯，葬圣神文武恭肃孝皇帝于嵩陵。”^{[1]140}《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载：（显德元年四月）“乙卯，葬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于嵩陵，三月乙酉，梓宫赴山陵。四月乙卯方葬，与北汉交兵，葬备多阙，故缓。庙号太祖。”^{[4]9641}《五代会要》卷一“帝号”条载：“周太祖圣神恭肃文武孝皇帝姓郭氏，讳威……显德元年正月一日，上尊号曰圣明文武仁德皇帝，其月十七日，崩于大内之滋德殿，年五十一。其年四月十二日，葬嵩陵，在郑州新郑县。”^{[7]17}且显德元年四月甲辰朔，“乙卯”日为“十二”日。故“乙巳”似误，应为“乙卯”。

《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载：“时镇州王熔、定州王处直叛，结连晋人，故遣将讨之……案《五代会要》：十一月十四日，司天奏：‘月蚀，不宜用兵。’时王景仁方总大军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为后唐庄宗大败于柏乡。”^{[2]106}

按：“十一月十四日”疑误。《旧五代史·天文志》载：“梁太祖开平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夜，先是，司天奏：‘是日月蚀，不宜用兵。’时王景仁方总大军北伐，追之不及。至五年正月二日，果为后唐庄宗大败于柏乡。”^{[2]2159}《新五代史·司天考》载：（开平）“四年十二月庚午，月有食之。”^{[1]794}开平四年十二月丁巳朔，“庚午”日是“十四日。”故“十一月十四日”疑误，当为“十二月十四日”。

《旧五代史·唐庄宗纪》载：（同光元年四月）“以行台右丞相卢澄为中书侍郎、平章事、监修国史。”^{[2]460}

按：“卢澄”疑误。《旧五代史·卢程传》载：“卢程，唐朝右族。祖懿，父蕴，历仕通显……庄宗将即位，求四镇判官可为宰辅者。时卢汝弼、苏循相次沦没，当用判官卢质。质性疏放，不愿重位。求留太原，乃举定州判官豆卢革，次举程，即诏征之，并命为平章事。”^{[2]1033-1034}《新五代史·唐庄宗纪》载：（同光元年四月）“行台左丞相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右丞相卢程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50-51}《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二载：（同光元年四月）“以豆卢革为门下侍郎，卢程为中书侍郎，并同平章事。”^{[4]9005}《新五代史》卷二十八亦有卢程本传。故“卢澄”疑误，当为“卢程”。

《旧五代史·唐末帝纪》载：（清泰二年五月）“以翰林学士马裔孙为礼部侍郎。”^{[2]744}《旧五代史·唐末帝纪》载：（清泰三年三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裔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2]756}

按：上文所载“马裔孙”，查《新五代史》《资治通鉴》等相关文献均无此人，疑有误。《新五代史·唐废帝纪》载：（清泰三年）“三月丙午，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86}《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载：（天福元年）“三月，丙午，以翰林学士、礼部侍郎马胤孙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4]9226}《新五代史》卷五十五亦有马胤孙本传。故此处“马裔孙”当为宋人修撰该书时避宋太祖赵匡胤名讳而改“胤”为“裔”。

《旧五代史·晋高祖纪》载：（天福五年八月）“丁卯，宰臣李崧加集贤殿大学士，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平章事。”^{[2]1213}

按：“天福五年八月”疑误。《新五代史·晋高祖纪》载：（天福五年）“九月丁卯，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1]99}《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二载：（天福五年九月）“丁卯，以翰林学士承旨、户部侍郎和凝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4]9345}且天福五年八月甲午朔，本月内并无“丁卯”日。故“天福五年八月”疑误，当为“天福五年九月”。

《旧五代史·马裔孙传》载：“马裔孙，字庆先，棣州滴河人也。”^{[2]1941}

按：如上文所述，“马裔孙”是宋人避赵匡胤名讳而改“马胤孙”为“马裔孙”。此外，“棣州滴河人”中“滴河”疑误。《新五代史·马胤孙传》载：“马胤孙，字庆先，棣州商河人也。”^{[1]711}《宋史·地理志》载：

“棣州，上，乐安郡，防御。建隆二年，升为团练，俄为防御……县三：厌次，上。商河，中。阳信。下。”^[12]故上文“滴河”疑误，当为“商河”，“滴”与“商”字体相像，疑为史书在流传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

《旧五代史·天文志》载：“乾化二年，五月壬戌，荧惑犯心大星，去心四度，顺行。占曰：‘心为帝王之星。’其年六月五日，帝崩。”^{[2]2161}

按：“其年六月五日，帝崩”中“六月五日”疑误。《新五代史·梁太祖纪》载：（乾化二年）“六月，疾革，郢王友珪反。戊寅，皇帝崩。”^{[1]23}《资治通鉴》卷二百六十八载：（乾化二年六月）“戊寅，友珪易服微行入左龙虎军，见统军韩勅，以情告之。勅亦见功臣宿将多以小过被诛，惧不自保，遂相与合谋。勅以牙兵五百人从友珪杂控鹤士入，伏于禁中，中夜斩关入，至寝殿，侍疾者皆散走。帝惊起，问：‘反者为谁？’友珪曰：‘非他人也。’帝曰：‘我固疑此贼，恨不早杀之。汝悖逆如此，天地岂容汝乎！’友珪曰：‘老贼万段！’友珪仆夫冯廷谔刺帝腹，刃出于背。友珪自以败毡裹之，瘞于寝殿，祕不发丧。”^{[4]8879}乾化二年六月丁丑朔，“戊寅”日是“初二”。故“六月五日”疑误，当为“六月二日”。

《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是研究五代时期最基本的史料。两部五代史互有短长，《新五代史》文笔简洁，叙事生动，诚如张之洞所说：“诸史中体例文笔，虽有高下，而其有益实用处，并无轻重之别。盖一朝自有一朝之事迹，一朝之典制，无可轩輊。且时代愈近者愈切于用。非谓《四史》之外可束高阁。《四史》外，《新五代史》最好，义例正大，文辞和雅。”^[13]而《旧五代史》以史料完备著称，全书是《新五代史》的两倍多，四库馆臣对其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14]然而，因种种条件的限制，书中讹误之处不免存在。笔者认为产生上述疑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宋人著述时的失误，也有《新五代史》《旧五代史》在传抄或刻板过程中所产生的讹误。由于诸多相关史料已经失传，笔者对于某些问题也难以作出准确的论断，只能依据现有史料进行相关的推测。加之笔者能力有限，文中或有断章取义之弊，期待方家批评指正。琐细考证，实为小道，但是微小细节有时候也可以推翻结论。因此，我们在阅读和运用《新五代史》《旧五代史》时，一定要注意结合其他史料，注重对史源的核查，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讹误。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新五代史[M].徐无党,注.北京:中华书局,2015.
- [2] 薛居正.旧五代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5.
- [3]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2.
- [4]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14.
- [5] 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2016.
- [6] 吴缜.五代史纂误[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 [7] 王溥.五代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8] 马端临.文献通考[M].上海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6.
- [9]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M].黄曙辉,点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488.
- [10] 乐史.太平寰宇记[M].王文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13:935-936.
- [11] 钱大昕.廿二史考异[M].方诗铭,周殿杰,校点.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932.
- [12]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2173.
- [13] 张之洞.增订书目答问补正[M].孙文泐,增订.北京:中华书局,2011:662.
- [14] 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1267.

作者简介：龙坡涛（1988—），男，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17-05-27

· 文献学研究 ·

古书香盈邑，人文称地灵^{*}

——杭州、嘉兴、台州三地藏书史专著述评

蔡思明

(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文章通过比较评介《杭州藏书史》《嘉兴藏书史》《台州藏书史》三部地方藏书专题史著,梳理了杭州、嘉兴、台州三地的藏书文化史实,阐述了三书的著述特色,并着重探讨了由三书所见浙江藏书家一以贯之的“藏以致用”的藏书文化理念。

关键词: 藏书家;地方藏书史;浙江省

中图分类号: G256.1

文献标识码: A

Ancient Book Full of the city, A Remarkable Place Producing Outstanding People: A Review of Monographs on Book Collecting History in Hangzhou, Jiaxing and Taizhou

Abstract The paper reviews the three books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on in Hangzhou*,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on in Jiaxing*,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on in Taizhou* comparatively, and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 of book collection history in Hangzhou, Jiaxing and Taizhou. Then,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hree books respectively, and focuses on the concept of "possession for use" which was insisted by the Zhejiang bibliophiles and was reflected from the three books.

Key words bibliophile; local history of book collection; Zhejiang province

1 引言

浙江藏书历史源远流长。据范凤书先生《中国私家藏书史》一书中对中国藏书家省区分布的统计,浙江省共有藏书家1 139位,在全国排第一,占全国藏书家的22.58%^{[1]657-658}。中国藏书家数量最多的10个市县,依次为苏州、杭州、常熟、宁波、湖州、绍兴、福州、嘉兴、海宁和南京,其中浙江一省就占据六席。

本文选取陈心蓉所著《嘉兴藏书史》(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版)、顾志兴所著《杭州藏书史》(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张明君所著《台州藏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三部区域藏书史研究著作进行综合对比研究,藉此展示浙江书香盈邑的藏书文化。

2 杭州、嘉兴、台州三地藏书史专著比较评介

《杭州藏书史》《嘉兴藏书史》《台州藏书史》是以“史”为主线、以某一地为研究范围而展开的3种区域藏书史研究著作,综合对比三书,对于三地的藏书特色、三书的编著方式、浙江一地的藏书文化等均有

^{*} 本文系2016年度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泛在知识环境下大学生经典阅读障碍与阅读推广研究”(项目编号:2016SJB870002)的成果之一。

不同角度的呈现。

2.1 《杭州藏书史》

《杭州藏书史》由浙江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顾志兴所著。全书分为五大章,前四章立足中国古代四大藏书体系,分别论述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学校与寺院藏书以及佛寺道观藏书,各章在体例上依时代分次展开。第五章从总体上论述了杭州私人藏书特点及杭州藏书家对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

顾志兴先生本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史学研究观,立足杭州藏书史的同时,对大量史料进行考证,揭示出诸多文献细节。例如,其考证出缉熙殿乃南宋宋理宗与臣子研究理学以及藏书、读书的处所,然而却并未有书目传世。他在得知国家图书馆藏有缉熙殿旧藏之后,将两种文献始末进行详述,并且对其传世原因进行了探析。其自言,“我据书上钤印大致考出宋元明清以来之传承关系,自谓这部《杭州藏书史》关于缉熙殿藏书的研究是中国宫廷藏书的一个突破。”^[2]对于杭州源远流长的私人藏书,作者不仅在第二章中依次介绍了自晋代到民国各时代的藏书特色,还在第五章专门对杭州私人藏书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对于各时期著名藏书家的藏书活动,作者也进行了诸多考证,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2.2 《嘉兴藏书史》

《嘉兴藏书史》由嘉兴学院图书馆陈心蓉女士所著。陈心蓉主持过多项省部级以上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主要从事地方文献的研究与开发,出版著作还有《嘉兴刻书史》《嘉兴历代进士研究》《嘉兴历代进士藏书与刻书》等。著名图书馆学家谢灼华先生为此书作序,“这不仅是地区藏书研究的新收获,而且也是嘉兴地方史志研究的补充和发展”^[3]。全书分为五章,以时代为主线,对于各朝代的藏书活动,从时代背景下分析其社会原因,并且以地域为区分,具体到嘉兴市各主要县镇的藏书家和藏书情况。

该书对于嘉兴藏书家中两个较为特殊的群体进行了专门研究,即进士藏书家和女性藏书家。据作者研究统计,进士藏书家约占嘉兴藏书家的20%左右,而该群体的藏书活动不仅是单纯的“藏书”,他们往往还热衷于著书、刻书等活动,这是由进士群体普遍具有较高的人文学识水平所决定的。在此基础上,陈心蓉后续对嘉兴进士群体进行了进一步的深入研究,有《嘉兴历代进士藏书与刻书》(与丁辉合著,黄山

书社2014年版)问世。女性藏书家也是十分特殊的一个群体。清代嘉兴以藏书伉俪闻名全国,作者考证了清代嘉兴的6位女藏书家的藏书,有柳如是惠香阁藏书、查惜道古楼藏书、沈彩春雨楼藏书、潘佩芳藏书、高金鞠藏书和陆锡贞藏书。同属嘉兴学院图书馆的凌冬梅女士受此启发,对浙江女性藏书家进行了专门研究,遂成《浙江女性藏书史》(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

可见,该书在论述上有其侧重点,也挖掘出了嘉兴藏书史上的众多鲜明特色。当然,对于嘉兴藏书史还有众多可供深入挖掘的课题和方向,这也正是该书所作的开创性贡献。

2.3 《台州藏书史》

《台州藏书史》由台州学院椒江学区图书馆张明君女士所著。全书共五章,正文前后另有绪论和结语两部分。全书将重心置于台州的私人藏书上,前三章按照时间主线分论各时期的台州私人藏书发展史,第四章讨论官府、书院、佛寺、道观等其他类型的藏书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台州东濒东海,与日本和朝鲜半岛邻近,自古以来便和两国有着诸多交流。因而作者单列第五章,讨论了台州与日本、朝鲜半岛的书籍交流活动,将自隋唐而始的各时期书籍交流活动以及其中重要的藏书家、重要文献等进行详述,是本书的一大亮点。

另外,该书“绪论”和“结语”两部分贯穿全书,呈现出了台州藏书的传承性和人文意义。“绪论”部分从浙东文化谈及浙东藏书派的特点,分析了台州藏书关注乡邦文献和乡贤著述、讲究藏以致用、兼藏金石书画的三大特点。“结语”部分则将视野转向当代倡导“全民阅读”的社会现实,对“书香台州”的建设提出了3点建议:①促进“全民阅读”,倡导“书香家庭”;②发挥本地公共图书馆的知识中心引领与导航作用;③重视“文学好书”和“文学疗愈”在阅读推广中的价值。这3点建议实际上正是发扬台州藏书家“藏以致用”的良好传统。然而,该书重点论及台州私人藏书,对于其他类型的藏书活动研究稍显薄弱,且缺乏对台州藏书史全面纵向的梳理,还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

3 浙江藏书家“藏以致用”的藏书理念

清乾隆年间,为编纂《四库全书》面向民间征集图书,进献最多的前四位藏书家分别是,扬州马曰琯(1688—1755年)以及马曰璐(1695—1769年)兄弟的丛书楼、杭州鲍廷博(1728—1814年)知不足斋藏书楼、宁波范懋柱(1721—1780年)天一阁、杭州汪启淑(1728—1799年)开万楼。浙江一省占据三家,浙江藏书事业的繁盛可见一斑。

中山大学程焕文教授将私人藏书家分为“开放派”和“保守派”:开放派乃为用而藏,保守派则是为藏而藏。“开放派私人藏书是我国古代私人藏书的本质和主流,而保守派私人藏书则是我国古代私人藏书的现象和支流。”^[4]

纵观《杭州藏书史》《嘉兴藏书史》《台州藏书史》所述三地藏书史,各地藏书家们在历代藏书活动中,开放派一直占据主流,他们或著书立说,或校雠刊刻,或开放借阅,用各种方式践行着“藏以致用”的藏书理念,推动浙江藏书文化的繁盛。

3.1 为用而藏的学者型藏书家众多

清代学者洪亮吉将藏书家分为考订家、校雠家、收藏家、赏鉴家和掠贩家5类,“学者型藏书家”并无定论,从广义上而言,洪亮吉所言之前四类均可归属于学者型藏书家。

虽然三书对学者型藏书家并未作具体统计,但从顾志兴、陈心蓉均引用到的民国初年支伟成撰《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海奉东图书局民国14年初版)一书作为参考,可见一斑。其实,据范凤书先生对中国藏书家群体的剖析,其对5 045名中国历代藏书家按出身、职业和社会地位进行分类统计,其中学者专家型有1 687位,占33.44%;一般知识分子有1 172位,占23.25%^{[1]660—661}。以上两类皆可归属为学者型藏书家,这一点在作为藏书大省的浙江地区,表现尤为突出。以下试列举几例三地颇具代表性的学者型藏书家。

杭州余杭章炳麟(1869—1936年,号太炎),师从俞樾研习经学古文,藏书百余篋,因其作为思想家、民主革命家的突出成就,其“藏书家”的身份世人所知甚少;仁和(今杭州)龚自珍(1792—1841年,字璉人,号定庵),思想家、诗人、文学家和改良主义的先驱者,著有《定庵文集》,留存大量著作。著名诗作《己亥杂诗》至今传诵不衰。其藏书800余种,嗜金石文字,藏书处有宝燕阁、礼树斋。

嘉兴钱泰吉(1791—1863年,字辅宜,号警石),

清代文学家,与其兄钱仪吉被称为“嘉兴二石”,藏书处有冷斋、可读书斋等,著述甚丰,著有《甘泉乡人诗文稿》《甘泉乡人述言》《清芬世守录》《颐合室合稿》《海昌学职禾人考》等。“泰吉亦工书法,精鉴赏,精校雠之学,为清代著名校勘家,经其手校的书,多称善本。”^{[5]95}

临海洪颐煊(1765—1837年,字旌贤,号筠轩),藏书楼曰小停云山馆,是台州古代最大的藏书楼。洪颐煊藏书目的之一为著述,其著有《筠轩诗文钞》十二卷、《台州札记》十二卷、《倦庵书目》九卷、《经典集林》三十二卷、《读书丛录》二十四卷、《管子义证》八卷、《诸史考异》十八卷、《汉志水道疏证》四卷等。此外,他还选刻多种文献,编制多种书目,以保存和传播文献。对此,张明君女士在是书中有详细的记载。

学者型藏书家可归入程焕文教授所述之“开放派”,他们为用而藏,普遍倡导“藏以致用”的理念,通过著书立说等方式,将藏书传播开来,以惠及更多民众。

3.2 重视乡邦文献的收集和保存

重视乡邦文献的收集和传播保存,是杭州、嘉兴、台州三地藏书家的另一特色。顾志兴先生总结杭州私人藏书的特点,其中有“关注地方文献和其他专题典籍收藏”,尤以仁和赵昱小山堂藏书、仁和杭世骏补史亭藏书和钱塘丁丙八千卷楼所藏最富,其直言“有清一代浙江藏书家收藏地方文献为一时尚”^{[2]233}。

嘉兴海盐涵芬楼主人张元济(1867—1959年,字菊生,号筱斋),以出版家、校勘家、藏书家的独特眼光,知晓地方志文献的重要性,一直致力于地方志的收藏。据《嘉兴藏书史》的研究,“至1931年收藏地方志共计2 641部、25 682册,其中元明刊本141种,所记的地域则遍及22个行省和边远地区,是当时国内收藏地方志最多最全的藏书楼。”^{[3]17}

台州藏书的特点,据张明君总结,首先便是“关注乡邦文献和乡贤著述”,尤其是清朝一代表现尤为明显。例如清中期临海郭协寅(1767—?,字沧州,别字石斋),“凡遇乡邦文献,即录副以藏因此抄本甚多”^{[6]121}。他还据其收藏整理、编著多部著作。清晚期黄瑞(1836—1889年,字玉润,号子珍),专门辟一室用以收藏乡邦掌故丛书。

纵观中国古代藏书史,有明一代藏书家热衷于收

集小说戏曲、崇尚抄本,有清一代藏书家则追求宋刻明抄,均成为一时之风尚。相较于此,乡贤文献的收集仍是践行“藏以致用”的理念,诸如以上所介绍的众多藏书家们,不以珍稀异本为追求,开发和保存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其贡献惠及当代后世。

3.3 以藏为主,刻、印、抄、校、编并重

古代因印刷业的不发达,文献流通范围极小,复本有限,藏书家们为扩展藏书和提升藏书质量,还大量从事刻书、印书、抄书、校书、编书等文献活动。上述所提及之“学者型藏书家”,实则在此方面有诸多贡献。

陈心蓉在论及“嘉兴藏书家对纸本文化传承的杰出贡献”时,对于嘉兴藏书家在校书、刻书、著书三方面的突出成果进行了专门的阐述。例如嘉兴秀水藏书家朱彝尊(1629—1709年,字锡鬯,号竹垞),著述等身,刻书校书,为后世保存了大量的书籍;海宁吴騄(1733—1813年,字槎客,一字葵里),穷毕生精力于藏书、校书、读书、著述,有大量著作传世……还有钱泰吉、陈鱣、查慎行、王国维等,皆以藏为主,刻、印、抄、校、编并重,为保存和传播文献作出极大贡献,是以有《嘉兴刻书史》一书问世。

杭州则有以校勘群经有名于世的卢文弨(1717—1796年,字召弓),“时人称其自经传子史,以及说部诗文集,凡经文弨披览之书无不丹黄校勘。有时读书,即使无别本可堪异同,亦必改正字画而后快。”^{[2][81]}以刻书闻名的则有杭州知不足斋斋

主鲍廷博(1728—1814年,字以文,号渌饮),刊刻《知不足斋丛书》三十集,促成浙江严州知府赵起杲刊刻蒲松龄《聊斋志异》一书,为中国文学史作出巨大贡献。

台州藏书家因收藏乡邦文献突出,在地方志的编修上有着重要成果。“其中最为人称道的是南宋陈耆卿所纂的《(嘉定)赤城志》。此志可称之处甚多,《四库全书总目》称它‘文笔法度,具有师承,叙述咸中体裁’。”^{[6][15]}另有诸如宋代贾似道、明代陶宗仪、清代洪颐煊等,皆利用所藏,著书立说,广为流布。

4 结语

《杭州藏书史》《嘉兴藏书史》《台州藏书史》三书在编撰体例和撰述内容上各有侧重,均在于全面梳理和总结三地的藏书概况,而其中所涉及到的众多藏书家、藏书楼或藏书史实,还有待后来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史料挖掘。早在1986年,徐雁先生便撰文《我国古代藏书实践和藏书思想的历史总结——中国古代藏书学述略》倡导建立“古代藏书学”,认为“研究中国古代藏书历史发达、地域兴盛的事实,将为文化学的研究提供强有力的实证”^[7]。有关浙江藏书史的研究,从概述性到区域性再至专题性,正逐渐趋于精细选题和深耕作业,《杭州藏书史》《嘉兴藏书史》《台州藏书史》三书必将助推杭州、嘉兴、台州乃至浙江文化的研究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 范凤书.中国私家藏书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 [2] 顾志兴.杭州藏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 [3] 谢灼华.《嘉兴藏书史》序[M]//陈心蓉.嘉兴藏书史.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1.
- [4] 程焕文.藏而致用 流通开放:中国古代私人藏书的本质和主流[J].图书馆学研究,1987(4):66-73.
- [5] 陈心蓉.嘉兴藏书史[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 [6] 张明君.台州藏书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
- [7] 徐雁.我国古代藏书实践和藏书思想的历史总结:中国古代藏书学述略[J].四川图书馆学报,1986(1):55-60.

作者简介:蔡思明(1989—),女,南京邮电大学图书馆馆员,研究方向为阅读文化。

收稿日期:2017-08-25